



中俄茶叶贸易史

郭蕴深 著

ZHECHYMYSH



2.95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96
F752.95
5
2

中俄茶叶贸易史

郭蕴深 著

XAKEDU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哈尔滨



C

027676

中俄茶叶贸易史
Zhonger Chayie Maoyi Shi

郭蕴深 著

责任编辑：于海涛

封面设计：回增荣

校 对：于晓咏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区九站街1号）

东北林业大学印刷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9·字数 18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 册

ISBN 7-5316-2916-x/k·61 定价：9.00 元（平装）

12.00 元（精装）

序 言

我国是茶的故乡，茶叶是我国的传统出口商品，随着历史的发展，它逐渐行销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中俄贸易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茶叶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十九世纪中叶，茶叶对俄出口进入鼎盛时期，茶叶一项曾占我国对俄出口货物总值的90%以上，茶叶成了中国对俄贸易的重要支柱。

茶叶的对俄出口，同时又起到了对外输出中国文明的作用。俄国原本无茶，不知茶为何物。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俄国人才逐步掌握了关于茶的知识，后来随着中俄贸易的发展，茶叶才作为一种深受欢迎的饮料开始进入俄国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对外贸易，中国不仅把茶叶输往国外，茶籽及茶的栽培技术也逐渐流传到国外。许多国家开始栽培茶树，后来俄国也成了产茶国家。俄语中的茶(ЧАЙ)，就源于中国的茶字。可见，中国茶叶的对俄输出，在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根据上述情况，郭蕴深同志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俄茶叶贸易史的研究，并最终完成一部专题著作，应该说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郭蕴深同志对中俄茶叶贸易发生兴趣，由来已久。早在十多年前的八十年代初，他就注意广泛蒐集资料，并埋头做探索研究，首先发表了关于中俄茶叶贸易的论文。后来，他又参加了《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苏经济贸易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编著工作。在此期间，他的资料有了更多的积累，对中俄茶叶贸易的研究又更上了一层楼，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此后又花费了几年的心血，才推

出这部《中俄茶叶贸易史》专题著作交付出版。这部书从酝酿准备、蒐集资料、逐项地做探索研究到最终完成脱手，前后历时十余年，算得上是一部力作。据我所知，如此全面系统的中俄茶叶贸易史，国内外还是第一部。

郭蕴深同志的这部《中俄茶叶贸易史》，在资料的蒐集整理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除了广泛地查阅了有关的中外文图书资料以外，他还尽力地查阅了我国的海关统计资料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清代有关历史档案。总的说这部书的资料是比较丰富的。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正因为他在资料上真正下了一番功夫，才理清了中俄茶叶贸易史的脉络，才有根有据地对各个阶段与茶叶贸易有关的各类问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部专题著作，虽然名曰茶叶贸易史，实际上，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中俄两国贸易的历史发展状况，对深入研究中俄贸易史，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孟宪章

1995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	(1)
第一节 中国茶叶传入俄国	(1)
一、俄国人与中国茶	(1)
二、最早进入俄国市场的中国茶	(4)
第二节 《尼布楚条约》签订前的中俄茶叶 贸易	(8)
一、俄国使团与商队在北京的贸易	(8)
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俄贸易的 影响	(13)
第三节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中俄茶叶 贸易	(18)
一、“京师互市”与茶叶贸易	(18)
二、库伦互市	(22)
三、嫩江、齐齐哈尔市场上的小额茶叶交易	(24)
第二章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茶叶贸易的初步 发展	(26)
第一节 《恰克图条约》的缔结与恰克图市场 的出现	(26)
一、《恰克图条约》的缔结	(26)
二、恰克图市场的缓慢发展和祖鲁海图市场的 萎缩	(28)
三、《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进京官方商队经营	

的中国茶	(33)
第二节 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恰克图茶叶贸易	(36)
一、恰克图市场的兴旺及茶叶贸易的初步 发展	(36)
二、三次闭关对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影响	(40)
第三章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茶叶贸易	(44)
第一节 恰克图茶叶贸易的黄金时期	(44)
一、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	(44)
二、恰克图茶叶贸易促进了中俄两国经济的 发展	(52)
第二节 西北和东北边疆的茶叶贸易	(60)
一、新疆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60)
二、东北地区与俄国零星的茶叶贸易	(68)
第三节 俄美公司与中俄茶叶贸易	(72)
第四章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茶叶贸易	(77)
第一节 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化对中俄茶叶贸易的 影响	(77)
一、中俄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缔结	(77)
二、海路茶叶贸易的出现及发展	(85)
第二节 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衰落	(92)
一、买卖城中国商号的倒闭	(92)
二、恰克图转口茶叶贸易的增长	(98)
第三节 俄国茶商在中国内地产茶区的商业 活动	(102)
一、俄国茶商对汉口茶市的经营和垄断	(102)
二、俄商对福州、九江茶市的经营	(112)
三、天津开埠与俄国人经天津转口的中国	

茶叶	(117)
四、张家口开埠之争及中俄张家口茶叶贸易	(122)
第四节 中国边疆地区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124)
一、《伊塔通商章程》签订后新疆对俄国出口茶叶之 激增	(124)
二、阿古柏入侵对中俄西部地区茶叶贸易的 影响	(130)
三、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西部地区与俄国的茶叶 贸易	(133)
四、十九世纪下半叶黑龙江运茶路线的兴衰	(137)
第五章 十九世纪末至十月革命茶叶贸易的消长	(142)
第一节 中国茶叶出口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142)
一、印度、锡兰等地茶叶对中国茶叶市场的 冲击	(142)
二、俄国对中国茶市的全面控制	(150)
三、俄国引种中国茶籽及其对中俄茶叶贸易的 影响	(158)
第二节 恰克图边关互市的全面萎缩	(161)
一、俄国单方面陡起增税对买卖城华商的 打击	(161)
二、天津—恰克图转口陆路茶叶贸易的继续 增长	(165)
第三节 西北与东北边疆省份与俄国的茶叶 贸易	(169)
一、新疆出口茶叶的减少	(169)
二、俄商在西部地区沿途洒卖和倒灌中国 茶叶	(173)

三、东北地区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178)
第四节 危机四伏的中国内地产茶区对俄国的茶叶 贸易	(180)
一、福州茶市的衰落	(180)
二、九江砖茶贸易的继续发展	(182)
三、俄国商人对汉口茶叶市场的全面控制	(185)
四、上海港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195)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200)

第一章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

第一节 中国茶叶传入俄国

一、俄国人与中国茶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自从公元前二世纪茶叶传入朝鲜、日本起，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茶叶先后传播到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非酒精饮料之首。

从语音学上说，在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中，茶字的发音几乎只有两个系统。其一与汉语普通话“茶”字的发音相似。如东亚和南亚的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印度、尼泊尔、锡金，西亚的土耳其、波斯，欧洲的俄国、罗马尼亚、葡萄牙等国。这些国家的茶叶除少数如日语茶的发音与浙、赣一带语音相近，可能经海路传播外，大部分是经陆路传播过去的。其二与福建闽南话“替”的发音相近。如印度尼西亚、锡兰，以及欧洲的英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法国、瑞典等国家。这些国家的茶叶大部分是经海路传播过去的。明朝初年（十五世纪初），郑和七次率领船队出使亚非各国，不仅加强了中国与南洋各国之间的联系，而且促进了茶叶贸易的发展。整个明朝时期福建有着较发达的海上贸易。

俄国人的茶叶是经过中国北方陆路传播过去当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中国茶叶何时传入到俄国的呢？目前虽然没有确切年代可考，但最迟在 1237-1240 年间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攻占了梁赞、莫斯科和基辅等地后，嗜茶如命的蒙古人便把茶叶

带到了俄罗斯国家形成前的罗斯诸公国。但蒙古人是征服者，当然饮茶习惯不会短时期内在被征服的民族中形成。

据有关俄文资料记载，1567年俄国哥萨克头目伊万·彼特罗夫和布尔纳什·亚雷切夫奉沙皇伊万四世之命，经西伯利亚到明朝首都北京。他们在《见闻记》中描述了中国茶叶的特征，把茶叶的最初知识带到了俄国。^①但目前国内外史学界对1567年彼特罗夫和亚雷切夫的中国之行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有人认为伊万·彼特罗夫1567年的《见闻记》是1619年彼特林所书。为此，这也就不能作为中国茶叶传入俄国的有力证据了。

1581年，当叶尔马克率领的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大举征服辽阔的西伯利亚时，他们发现当地土著民族，特别是游牧的蒙古人都有饮茶习惯。茶叶传入西伯利亚的时间要大大早于莫斯科公国。这一次俄国人是征服者，当然有条件品尝中国茶叶的芬芳，只是疲于奔命的侵略者无暇顾及此事罢了。

俄国真正得知中国茶叶的知识当是1638-1640年。是时，由瓦西里·斯达尔科夫和斯杰潘·涅维洛夫率领的俄国使团来到了中国西北地区阿勒坦汗处（即硕垒乌巴什珲台吉），阿勒坦汗用中国内地产的茶叶招待俄国客人。他们在那里不仅喝到了茶，而且得到了阿勒坦汗送给俄国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200袋白毫茶，每袋重3/4磅，总共约4普特^②，价值为60卢布。起初，这个俄国使团甚至不想接受这些闻所未

① 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1821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9卷，第235-241页。

② 1普特为16.38公斤

闻的礼物，但他们还是收下了，并把这些茶叶带回了莫斯科^①，受到了俄国宫廷贵族的喜爱。1654年沙皇阿·米哈伊洛维奇指派费·巴依科夫出使中国。1656年巴依科夫回国时，清顺治帝赠给沙皇的礼物有“各色花缎25块、银子1普特12俄磅45佐洛特尼克、虎皮3张、雪豹皮3张、丝绒3块、海豹皮3张、茶叶10普特。”^②遗憾的是这个俄国使团将10普特茶叶在北京售出，得银子3俄磅59佐洛特尼克。^③这说明俄国人对中国茶叶还缺乏认识。1657年费·巴依科夫回国后在记述中国之行的报告里提到“中国人怎样用煮熟的茶加奶酪、奶油招待他”。1660年，一个由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谢·阿勃林率领的俄国商务代表团来到北京，这个代表团献上了沙皇阿·米哈伊洛维奇和伊凡·佩尔菲利耶夫本人给顺治帝的礼物，而顺治帝在回赠的礼物中有送给沙皇的5竹篓茶叶，送给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勃林的各1竹篓茶叶。^④1675年受沙皇派遣来到中国的俄籍希腊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米列斯库（斯帕法里）在他的出使报告中有关于中国茶叶的详细记载。他赞许道，这“不是树，又不是草，它生长着许多细细的枝条，花略带黄色。夏天，先开花，香味不大，花落之后长出绿色的小豆，而后变成黑色。那些叶子长时间保存在干燥的地方，当再

-
- ①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年5-7期。
- ②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978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1卷第2册第370页。
- ③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978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1卷第2册第370页。
-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20页。

放到沸水中时，那些叶子重又呈现绿色，依然舒展开来，充满了浓郁的芬芳。当你习惯时，你会感到它更芬芳了。中国人很赞赏这种饮料。茶叶常常能起到药物的作用，因此不论白天，或者晚上他们都喝，并且用来款待自己的客人”。^①尽管这种认识还是初步的，但毕竟有了进步。

中国茶叶在俄国的流传，有相当一个过程。开始由于数量少，极为珍贵，只在贵族中间饮用，后来才逐渐扩大到小贵族和其他富裕的人们中间。到了十八世纪末，中国茶叶便开始在普通的俄国人中传播，并形成了全民族的饮茶习惯。

二、最早进入俄国市场的中国茶

什么时候中国茶叶作为商品进入俄国市场的？又是谁首先将中国茶叶推向俄国市场的？这也是历来颇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茶叶作为商品首先传入亚洲国家，进入西欧的时间也要早于俄国。据清朝学者赵翼记载：“自前明设茶马御史，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船来，所需中国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共用且极西洋以外”。^②葡萄牙人从1517年开始与中国通商，是最早直接把中国茶叶运往西欧的国家。然而，葡萄牙人的好景不长。1595年，后起之秀的荷兰远航商队绕过好望角进入亚洲，并继续向东推进，到达爪哇与摩鹿加群岛，排挤了葡萄牙人的殖民势力。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专门从事对东方的掠夺性贸易。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来到澳门，运载中国绿茶于1610年运回到欧洲。从此，中国

①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年5-7期。

② 赵翼：《檐曝杂记》。

茶叶便源源不断地通过荷兰商船队运往欧洲。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是当时世界最著名的贸易中心。荷兰商人再从这里将中国茶叶销往欧洲各国，其中包括沿欧洲北部海岸线和波罗的海进入欧俄市场。所以有人说最早把中国茶叶运入俄国市场的是荷兰商人。

其实比荷兰商人更早一些中国茶叶已通过中亚各国商人之手进入了俄国市场。1587年，俄国人在额尔齐斯河和托博尔河口汇流处建立了托博尔斯克城；1604年又在托木河畔建立了托木斯克城。由于交通方便，这些地方很快成了俄国商人与中亚各国商人交易中国货的场所。素有经商传统与经验的布哈拉商人在长途贩运中从事中俄中介贸易，他们把大量的中国商品，其中包括中国茶叶转售给俄国商人，双方均获满意的利润。商队往来频繁，仅1639-1674年间就有38支布哈拉商队到达托博尔斯克。^①俄国其他城市也都留下了布哈拉商人的足迹。如“1684年11月，……一支由90峰骆驼组成的大型布哈拉商队首次抵达伊尔库茨克，运来各种各样的中国货——花缎、缎子、粗布、棉花、茶叶、烟草。1685年10月到达伊尔库茨克的业已是一支由130峰骆驼组成的商队，而在1686年11月，一支由172峰骆驼组成的更大的商队也象以往一样受到了俄国当局的殷勤接待。”^②

俄国商人直接得到的中国商品茶来自中国蒙古人。十七世纪初，漠北蒙古分成东、西两大部。东部为喀尔喀蒙古，辖境

① O·H·维尔科夫：《十七世纪托博尔斯克市场上的中国货》，载《苏联历史》1958年第1期第107页。

② B·A·亚历山德罗夫：《1689年涅尔琴斯克和约前的俄中经济关系史一页》，载《苏联历史》1957年第5期第206-207页。

南起大漠，北至贝加尔湖。喀尔喀蒙古又分为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三部。从1638年起喀尔喀蒙古开始向清朝进贡，1655年全境内属。西部为厄鲁特蒙古，由和硕特部（治乌鲁木齐一带）、土尔扈特部（治塔尔巴哈台一带）、杜尔伯特部（治额尔齐斯河一带）、准噶尔部（治伊犁一带）组成。十七世纪初，土尔扈特部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原附于杜尔伯特部的辉特部独立，仍称厄鲁特四部。清入主中原后，四部中最强大的和硕特部首先向清纳贡。1653年清政府正式册封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为四部总管。从此，漠西蒙古也成为中华大家庭之一员。据《朔方备乘》记载：“崇德三年（即1638年），喀尔喀土谢图汗贡物有俄罗斯乌枪，车臣汗贡物亦有俄罗斯乌枪。盖此二部地居岑北，因以市易所购献诸天府也。可知谦河菊海之间，早有通商之事”。^①谦河即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菊海即贝加尔湖。俄国势力进抵这一地区后，便开始了与喀尔喀蒙古的贸易往来。所易之物虽已无从考查，但从贸易的一般规律来看，俄国哥萨克占领这一地区后，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生活资料。俄国人所购之物除了牲畜、肉食和粮食之外，主要的便是生活日用品，而此类物品大多是喀尔喀蒙古从内地运来，其中包括蒙古人不可一日或缺的茶叶。在很大程度上以肉食为主的哥萨克自然也离不开饮用茶叶了。

俄国与西部蒙古的贸易要早于同东部蒙古，一是因为俄国势力到达这一地区的时间要早于东部，另一原因是当时俄国在西部地区的人口较东部稠密，局势也较为平静。十七世纪初，位于额尔齐斯河南岸5公里处的雅梅什湖由于采盐业的兴起，形成了定期的集市。俄国人带着皮革、呢绒、金属制品、毛皮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7。

换取中国内地产的棉布、丝绸、茶叶和八角茴香等。^①十七世纪中叶托木斯克已成了俄国商人与中国厄鲁特蒙古进行交易的主要地点之一。仅 1653 年一年，就有 5 支厄鲁特蒙古商队赴托木斯克贸易。据托木斯克海关统计，1654-1658 年间有中国大黄、丝绸、茶叶等商品经厄鲁特蒙古商队运入托木斯克。

曾把中国茶叶作为礼物赠送给沙皇的阿勒坦汗在十七世纪上半期也与俄国商人有较为密切的贸易交往。据原苏联学者奇米特多尔日耶夫证实，阿勒坦商人经常用中国内地出产的“业已牢固进入蒙古人日常生活的绿茶来进行贸易。……后来，茶叶得到如此普及，以至于在货物统计中，它仅次于金、银和宝石”。^②

此外，俄国人也曾在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沿岸从中国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即索伦各部）等少数民族处交换到了中国茶叶。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俄国势力扩张到了额尔古纳河流域。1658 年，俄国哥萨克在喀尔喀蒙古辖地尼布楚修筑了涅尔琴斯克堡。“莫斯科大商人费拉提耶夫和尼基金在涅尔琴斯克的代理人经由伊尔库茨克和涅尔琴斯克等城堡进货，经营中国布匹、金属制品、各种器皿及药材等”。^③另一个中俄商品交易中心在库楞湖（达赉诺尔湖），这里也有定期的集市贸易。额

① 维尔科夫：《十七世纪托博尔斯克市场上的中国货》，载《苏联历史》1958 年 1 期第 109 页。

② Б·奇米特多尔日耶夫：《17-18 世纪的蒙俄关系》，莫斯科 1978 年，第 46 页。

③ Б·奇米特多尔日耶夫：《17-18 世纪的蒙俄关系》，莫斯科 1978 年，第 36 页。

④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1983 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 13 页。

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流域亦有贸易交往。1650年俄国哥萨克强占了黑龙江上游的雅克萨，并改名为阿尔巴津，建立了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第一个据点。随之，“出现了商人，莫斯科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这里找到了广泛的用武之地”。^①1668年雅克萨俄商的贸易额已达3万卢布以上。^②七十年代，先后有乌沙科夫家族、波谢尔斯基家族和穆尔萨托夫家族曾“大规模地买卖从俄中两国运来的商品”。^③

上述资料虽没有关于中国茶叶的详细报道，但无论是中国少数民族，还是俄国哥萨克皆在很大程度上以肉食为主，茶叶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中俄在这一地区的交往中茶叶作为商品或药材卖给俄国人是极为正常的事。随着俄国在黑龙江流域军事扩张的升级，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影响了该地区贸易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俄间的茶叶贸易尚属少量的、偶然性的。

第二节 《尼布楚条约》签订前的 中俄茶叶贸易

一、俄国使团与商队在北京的贸易

俄国人在与中国蒙古各部贸易的同时，俄国使团和官私商队也开始到北京进行贸易。一些西方学者（包括部分俄国学

①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第13页。

② 特鲁谢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十九世纪之前）》，莫斯科1882年，第159页。

③ 雅科伏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1973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116页。

者) 错误地认为, 1656年巴依科夫抵京, 标志着中俄直接贸易的开始。他们忽略了一个实质性问题, 即清朝初年, 广大漠北蒙古已经是中国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所以, 巴依科夫使团抵京, 只能是俄国同中国内地直接贸易的开始, 中俄贸易由边疆向中国内地发展了。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中俄贸易没有条约依据, 也未获得清政府的正式认可。西方学者也承认: “这一贸易直到1689年一直未获合法依据”^①。

《尼布楚条约》签订前, 来北京贸易的俄国人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正式的外交使团。据统计, 1689年前俄国派赴北京的外交使团有3支, 即1656年费·巴伊科夫使团、1670年伊·米洛瓦诺夫使团和1676年尼果赖(斯帕法里)使团。

巴依科夫使团出发前, “在莫斯科接受了5万卢布的款项, 他用其中一部分钱在当地采购各种俄国货。……使团在大量私商的伴随之下踏上了遥远的征途, 在于1656年顺利抵达北京的商队之中总共有100人”。^②对于巴依科夫使团在莫斯科接受5万卢布款项的用法有两种记载。一说“用于送礼、旅途支出和采购货物。”^③另一说法是巴依科夫仅仅“从他带到中国去作生意的那笔款项中留下5000卢布作购货之用, 其余的全部现款在托博尔斯克交给你们作为朕大君主的西伯利亚事务的开支”。^④他们在顺利地销售了俄国毛皮、皮革和金刚石等产品

① R·H·费舍:《俄国的毛皮贸易》, 1943年英文版, 第222页。

② E·П·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 伊尔库茨克, 1947年版, 第10页。

③ 特鲁谢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十九世纪之前)》, 莫斯科, 1882年版, 第19页。

④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1978年中译本, 第1卷第2册第339页。

后，“采购了3万卢布的中国货。”^①毫无疑问，作为沙皇诏书的记载应更为可靠。这就是说，巴依科夫使团以5000卢布的俄国商品，在北京换回了3万卢布的中国商品，利润达6倍之多。在采购的中国商品中有金银、大黄、丝绸、宝石、茶叶、药材等。尽管这个使团在北京将顺治帝赏赐给他们的10普特茶叶卖掉了，回国时还是采购了一些中国茶叶，并顺利地带回了莫斯科。巴依科夫使团开辟了西路进京的商路。使团从托博尔斯克出发，溯额尔齐斯河至斋桑湖，然后经蒙古等地，穿越戈壁大沙漠到达北京。回去的时候则“走的是另一条路——穿越南蒙古地区，然后经哈密和吐鲁番至阿勃莱乌鲁斯种田的布哈拉人地区。从这里出发，循旧路到达额尔齐斯河，然后乘船而行，于1657年7月31日到达托博尔斯克”。^②

1670年4月18日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十人长伊·米洛瓦诺夫带领4个同伙，在清朝使者沙拉岱及其13名随行的官员、商人陪同下由尼布楚出发前往北京。“他们走的是一条新的，从前俄国所不知道的路线——穿越满洲地区，即经海拉尔、脑温（齐齐哈尔），然后越过内蒙东南部地区前往长城要塞赤峰口”后到达北京^③，即所谓东部路线。这条线路要比西部路线更为便捷、有利。米洛瓦诺夫商队在北京受到盛情接待。他们将在西伯利亚各城市每1卢布的貂皮在北京卖3两银子（合3卢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莫斯科，1974年版，第81页。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88页。

③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97页。

布)，然后在北京买了上等花缎、丝绒。^①毋庸置疑，还有少量的中国茶叶。米洛瓦诺夫使团“开辟了经涅尔琴斯克去北京的道路之后，相当数量的俄国商人利用了这条道路。例如，据叶尼塞斯克海关统计，1672年东西伯利亚向中国输出了13000多张貂皮。……1678年，客商卢津的代理人伊凡·马克西莫夫将大批货物运往北京。1680—1689年间，在距阿尔巴津和璦琿城不远的阿穆尔河畔俄中两国臣民经常进行交易。”^②

1675年3月，受沙皇指派，尼古赖（斯帕法里）率一行160人的大型使团由莫斯科出发，于1676年2月抵达嫩江，经松辽平原西部、热河等地，于5月下旬到达北京。这个使团共带有1600卢布的俄国商品。当时由于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军事活动加剧，并收纳我叛人根特木尔，清政府一再提出交涉，不得要领，故此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俄国使团在京的商业活动受到一定影响。尽管如此，俄方还是获利的。而且“它对于使俄国的政界和商界了解中国的局势，了解中国社会的高低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来说，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尼·斯帕法里所搜集的特别重要和最为详尽的情报，是有关中国的贸易，其中包括中国同外国的贸易联系的情况”。^③

第二类来北京贸易的人员是俄国官方商队，官方商队是与俄国使团同时在北京活动的。第一支抵达北京的官方商队是由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中译本，第2卷第2册第426页。

② 雅科伏列娃：《1689年涅尔琴斯克条约签订前后经涅尔琴斯克的俄中贸易》，载《十七——十八世纪俄国的国际联系》，1966年莫斯科，第133页。

③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莫斯科1974年版，第102页。

彼·亚雷日金和谢·阿勃林率领的。这是一支为尼·巴依科夫使团打先锋的小型官方商队。在北京，这支商队顺利地卖掉了俄国商品后采购了中国的丝绸、茶叶和银器等。谢·阿勃林通过托博尔斯克城的俄籍布哈拉商人，对中国商情略有所知。这支获利的商队回到俄国后，俄国政府立即组织新的商队来京。新组织的商队由军役贵族伊·佩尔菲利耶夫和谢·阿勃林率领，1658年由俄国出发，带着750卢布的俄国商品，其中“带有送给中国皇帝的价值200卢布的礼品，还带有送给卡尔梅克阿勃莱台吉的价值50卢布的礼品”。^①而用于作买卖的商品只有500卢布，属于小型官方商队。“1662年，伊·佩尔菲利耶夫和谢·阿勃林率领的商队回到莫斯科，并随身带回了价值1057卢布的各种中国货。也就是使国库获得了大约300卢布的盈利”。^②在带回去的各种中国商品中也有少量的中国茶叶。

第三类是私人商队。俄国私人商队来京贸易比官方商队次数多，获利也更可观。但因是私人商队，官方材料记载甚微。其中较为著名的是1674年到达北京的加·罗·尼基京商队。这支由43人组成的私人商队开辟了一条以色楞格斯克经外蒙古到库伦，再经张家口进入北京的新商路，即中部路线。这个商队被允许在北京自由贸易7个星期。1675年，尼果赖（斯帕法里）使团在来北京的路上，遇到几名中路从中国回到俄国的商人。他们说“在中国作买卖对于他们不是什么新鲜事”。^③这说明，经常有不见经传的私商往返于这条商路与中国进行贸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中译本，第1卷第2册第340页。

② E·П·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伊尔库茨克，1947年版，第10页。

③ 亚历山德罗夫：《1689年涅尔琴斯克和约签订前俄中经济关系之一页》，载《苏联历史》，1957年第2期第206页。

易。七十年代是俄国私人商队来北京贸易比较活跃的时期。1678年，色楞格斯克总管斯特罗甘诺夫一次签发9名商人和1名实业人员到中国经商。这一年俄国巨商安·卢津的代理人伊万·马克西莫夫率领商队从莫斯科前往中国。

上述三条商业路线，各个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每一路线上的贸易活动都很繁盛。在涅尔琴斯克条约（即尼布楚条约——引者）签订之前，西部路线既是中俄直接贸易的主要路线，也是间接贸易的主要路线。……自1689年后，商业活动中心向东移至涅尔琴斯克”。^①这主要是由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东部边境比较安定。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中国茶叶作为商品，在中俄贸易中不占主要地位。但是正是由于通过此间间接与直接的贸易，才使俄国人对中国茶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逐渐产生了兴趣，这就为日后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作了应有的准备。

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俄贸易的影响

1676年9月，尼果赖使团离开北京时清政府明确要求俄方停止侵扰中国边疆，保持边境安宁。但在尼果赖使团返回俄国后的五、六年间，俄国不但没有停止侵略活动，而且将其势力扩大到黑龙江中、下游和额尔古纳河东岸。1680年，俄国政府建立了尼布楚督军辖区，御前侍臣费·沃耶伊科夫出任首任督军。随即安·沃耶伊科夫被任命为雅克萨总管。翌年，在额尔古纳河左岸建立额尔古纳堡。1682年，驻雅克萨俄军一股窜入黑龙江下游恒滚河一带，建立了杜吉根斯克堡；又一支

^① 马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前的外交关系》，1971年，英文版，第164页。

俄军则窜入恒滚河上游，建立涅米连斯克堡。盘踞在雅克萨的俄国侵略军不断“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①“诱索伦、达呼尔、鄂伦春之打貂人额提儿等二十人人室，尽行焚死”^②，激起东北边疆各族人民的愤慨。为此，1683年10月28日清朝理藩院照会雅克萨俄人头目云：“朕统一寰区，无分中外，凡尔民人，咸吾赤子，惻然怜悯，皆欲使各乐其居，各安其业。俄罗斯国罗刹等，无端犯我索伦边疆，扰害虞人，肆行抢掠，屡匿根特木尔等逃入，过恶日甚。朕不忍即遣大兵剿灭，屡行晓谕，令其自释过愆，速归本地，送还隐匿逃人。……今雅克萨、尼布楚罗刹等，若改前过，将根特木尔等逃人送来，速回本地，则两相无事，于彼有益不浅。倘犹执迷不悟，留我边疆，彼时必致天讨，难免诛罚。如路远难归，倾心投诚者，朕亦纳之，必加恩恤，使各得其所”。^③然而，雅克萨的俄国侵略者不听劝阻，我行我素。1685年2月，康熙帝下令由都统公彭春、副都统郎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兵，收复雅克萨。6月底我方向俄方雅克萨统领阿·托尔布津发出通牒说：“前屡经遣人移文，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逋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晏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④俄军置若罔闻，继续顽抗。6月25日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2。

② 《清圣祖实录》，第112卷第6页。

③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49-50页。

④ 《清圣祖实录》，第115卷第7页。

夜清军开始攻城，经一夜激战，6月26日雅克萨收复。清军将俄国所建堡垒烧毁后，返回瑷珲，俄军乘机又再度占领雅克萨，修城固守。1689年7月18日，两千清军进抵雅克萨城下。俄军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中国多次提出的和平建议。俄国派出以御前大臣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中国则派出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鼐、佟国纲及尚书阿喇尼等人为首的代表团进行谈判。1689年8月22日双方代表团到达尼布楚，经过半个月谈判，于1689年9月7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共6条，主要内容是划定中俄东部边境线，并确立了两国的贸易关系。其中第五条规定：“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①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与当时两国的形势分不开的。是时，俄国在南方正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争夺克里米亚和黑海出海口，在西方则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财源枯竭，根本无力再派遣大批军队到遥远的黑龙江流域与强大的中国作战。此外，俄国政府又为中国富庶的传说所吸引。他们认为“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银子，商人熔炼银子，而且炼出没有杂质的纯银”。^②此时，一方面中国商品已在俄国市场上颇为畅销，“俄国无论直接同中国换货贸易，还是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经营转口贸易，都可获得巨利。”^③另一方面，从十七世纪中叶起俄国每年可以从西伯利亚获取大量毛皮，销往欧洲和欧俄市场。但自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后欧洲市场由于北美毛皮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页。

② 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中译本第298页。

③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中译本第20页。

的竞争及国内市场皮货的饱和，毛皮十分滞销。因此，俄国急欲打开巨大的中国毛皮市场。这一切都是导致俄方签约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方面看，清政府并不看重对俄国贸易的经济利益，而仍然把边境的安宁作为第一要务。这一点在谈判之初康熙帝给中国谈判代表团的谕旨中可以清楚看出。康熙帝说：“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刺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划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①康熙帝甚至想到了如果收回尼布楚，俄国“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②为此谕令中国使团，“彼使若恳求尼布潮（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③由于清政府做出了很大让步，不仅解决了中俄两国东部边疆的划界问题，而且贸易条款也正式写进了条约。

双方互换条约文本后，俄国使团首席代表御前大臣戈洛夫异常高兴，频频举起香槟酒祝贺条约的缔结。翌日，戈洛夫又派人向清朝使臣赠送礼物，“以纪念两国使臣之间在过去一些日子中的真挚友谊”。^④戈洛夫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受到沙皇彼得一世的嘉奖。外交事务衙门御前大臣乌克兰因采夫讲话说：“陛下谕令告诉你：你在达斡尔地区色楞格斯克（应为涅尔琴斯克之

① 《清圣祖实录》，第135卷，第15页。

② 《清圣祖实录》，第140卷，第30页。

③ 《清圣祖实录》，第140卷，第30页。

④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600页。

误——引者）城下为陛下效力期间，同中国使臣举行了会议。赖上帝保佑，并托陛下洪福，经过同中国使臣的多次谈判，缔结了和约，划定了边界，互换了约文。……陛下赐恩，对其勤勉效忠予以表彰”。^①为此，戈洛夫及其副代表弗拉索夫获得了沙皇颁发的金质奖章。

《尼布楚条约》是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正式缔结的第一个平等的国际条约，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明确同俄国的贸易关系。它“为俄国打开了去中国的贸易大门”。^②因此成为“莫斯科商人和政府本身都极为关心的事情”。^③从此以后俄国官私商队得以频繁来华，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茶叶贸易的数量增加，地位提高。

然而，有些西方学者，特别是一些俄国学者在论及《尼布楚条约》时，一味强调“俄罗斯力求与中国缔结和约首先是为了建立彼此的贸易关系”。^④甚至说什么《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强加”给俄国的。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不过是为其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扩张大造舆论宣传而已。

中俄《尼布楚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俄北部和东部边境地区基本保持平静，为两国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至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第795页。

② 谢宾科夫：《十七世纪的俄中关系》，莫斯科1960年版，第42页。

③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本，第75页。

④ 雅科伏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1973年中译本，第164页。

订前，东线成了俄商来华贸易的主要路线。

第三节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 中俄茶叶贸易

一、“京师互市”与茶叶贸易

《尼布楚条约》甫经签订，俄国商人和政府就依据条约规定纷纷组织私、官商队来北京贸易，中国史籍称之为“京师互市”。

1. 私人商队

1689~1697年间为俄国私商来京的活跃期。他们单独或合伙组织商队，有时也与官方使团同行。所谓私人商队，其实他们大多数“既是商人，又是外交代表。就是俄国的中央政府和这些代表本人，也并不是总能分清这两种职务的性质和作用的：携带政府文书的使者从事贸易，或者由商人作伴一同前来；而给予商务代理人的使命也常与他们的正业无关。”^①据不完全统计，此间共有7支较大的私人商队来北京，商队的规模有逐年扩大的趋势。前5支商队的人员组成如下^②：

① 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中译本，第64页。

② 亚历山德罗夫：《十七世纪的俄中贸易与涅尔琴斯克市场》，载《十七—十八世纪俄国原始积累论文集》，莫斯科，1958年版，第427页。

年份 人数 身份	1689	1691	1692	1693	1695
巨商代办人	9	23	1	26	5
中小商人	4	12	-	2	13
实业人员、 流浪人、役夫	35	42	17	158	98
军役人员	40	19	37	23	41
总计	88	96	55	209	157

1696年来北京的第6支私人商队有“尼布楚连长阿弗纳希·索弗隆诺夫等与以卡萨里诺夫为首的28名莫斯科商人，及其属下214人，共计247人”。^①1699年派出的最后一支私人商队是由阿·别伊托诺夫率领的，总共167人。不过这支商队已进入了以官方商队为主的第二时期。私人商队带来的主要货物是俄国毛皮，此外有呢绒、金属制品等。俄国私人商队带回的中国商品种类繁多，棉布、丝绸、珠宝、金银器皿、茶叶、药材，应有尽有。茶叶作为商队在中国采购的商品，地位提高了。据统计，仅1692年返回尼布楚的商队就带回中国茶叶300箱，是前所未有的。1694年和1697年的两支商队分别带回中国红、绿茶叶21普特14俄磅和25普特5箱。^②私人商队的利润十分可观。第5支商队按尼布楚价值计算，运来

①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179页。

② 亚历山德罗夫：《十七世纪的俄中贸易与涅尔琴斯克市场》，载《十七——十八世纪俄国原始积累论文集》，莫斯科，1958年版，第450-451页。

16909 卢布的俄国货，运回 57000 卢布的中国货；第 6 支商队按莫斯科价格计算，运来 49300 卢布的俄国货，运回 240000 卢布的中国货，利润平均在 300—400% 之间。^①10 年之间，俄国私人商队在北京的交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字，“以至可以与有着久远历史的俄国同中亚贸易的交易额相匹敌”^②，并超过了同西方的贸易额。

2. 官方商队

官方商队，也叫国家商队。私人商队的高额利润，使急需资金为战争输血的俄国统治者十分眼热。俄国政府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弥补巨大的战争开支，开始由国家垄断对华贸易。1698 年政府颁布了《关于对华贸易的一般规定》，宣布获利极大的黑貂皮、玄狐皮及中国的大黄、烟草由国家专营，禁止私人贸易。私商只能按要求随同国家商队参加“京师互市”。进而从 1706 年起，俄国政府取消了私商参加国家商队来北京贸易的权利，任何未经允许携货去中国贸易的私商判处死刑。

据统计，从 1698 年第一支国家商队经尼布楚来北京，到 1724 年最后一支国家商队为止，26 年间总共有 12 支商队到北京。国家商队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资金上都大大超过私人商队。如，1698 年由梁古索夫率领的第一支国家商队人数为 478 人，官货价值 31000 卢布；1703 年由萨瓦季耶夫率领的第 3 支国家商队人数竟多达 830 人，官货价值为 47000 卢布，私货

① 亚历山德罗夫：《十七世纪的俄中贸易与涅尔琴斯克市场》，载《十七—十八世纪俄国原始积累论文集》，莫斯科，1958 年版，第 450—451 页。

② 亚历山德罗夫：《十七世纪的俄中贸易与涅尔琴斯克市场》，载《十七—十八世纪俄国原始积累论文集》，莫斯科，1958 年版，第 423 页。

价值为 566400 卢布。^①从 1707 年胡佳科夫率领的第 5 支国家商队起，不再允许私商参加国家商队和国家商队携带私人货物，但官货的价值大大超过了前期，每支均在 140000-200000 卢布之间。1722 年和 1724 年最后来北京的两支商队，携来俄国货物的价值均为 285403 卢布。^②国家商队的获利率虽不及私人商队高，但因所携货物远远超过私商。如，1707 年来京的胡佳科夫商队，携带 18 万卢布的俄国货，获利达 27 万卢布。^③国家商队的利润率在 80-150% 之间。国家商队时期总获利率还是大大超过私人商队时期。

毛皮仍然是俄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约占 80% 以上。进口的中国货有“中国土布、花缎、黄金、白银、丝绸、茶叶、八角茴香、壁毯、幔帐及各种器皿”。^④茶叶出口在缓慢发展着。

十八世纪初，俄国政府策动我国西北地区准葛尔部头目策妄阿拉布坦“臣服”俄国，并时时侵扰我国北部边境，收纳我逃犯，从而恶化了两国的关系。为此，1717 年和 1719 年清政府两次拒绝俄国国家商队入境，俄国不以为然，于是清政府于 1722 年 4 月宣布驱逐库伦俄商，暂停中俄贸易，7 月下令伊兹玛依洛夫使团留在北京的代理人郎克及伊斯托普尼科夫商队离开北京。1724 年再次拒绝以特列季亚托夫为首的国家商队来北京的要求。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初，兴旺了近 30 年的“京师互市”衰落了。

① 特鲁谢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19世纪之前）》，第95-96页。

② 特鲁谢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19世纪之前）》，第96页。

③ E·П·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17页。

④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译本，第505页。

二、库伦互市

库伦（今乌兰巴托）地处中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境内的土拉河畔，北距恰克图 460 公里，是俄国中路商队来北京的必由之路。十七世纪中叶后，这里逐渐成为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政治、经济中心。俄国来北京商队途经该地时，常常留下一部分人员调养牲畜并就地贸易，待俄国商队返回时再跟随一同离境。中国政府虽未正式批准库伦贸易，但亦不加禁止。久而久之，这里就逐渐形成了中俄间的另一个互市场所。

1706 年俄国政府下令禁止私商随国家商队来北京贸易。为利所趋的俄国商人不得不另寻出路，纷纷到库伦贸易。他们之所以选中库伦是因为这里离俄国近。俄商从色楞格河一带到库伦行程只有 10-12 天，而到北京则需 70 天，运费大大低于去北京，资金周转也快。另一方面这里人口较为稠密，已具备了市场的雏形。随着俄国官私商队的频繁到来，华商也带着金银、棉布、丝绸、茶叶、瓷器、烟草等内地商品来此交易，市场日益繁荣。起初，俄国政府只允许私商向库伦贩运皮革、亚麻布、呢绒等商品，但这些商品不为中国商人青睐。为获取更大利润，俄国私商便偷偷走私运来大量毛皮。由于数量多，价格又较北京低，华商纷纷来此采购，贩运到北京或中国内地销售，使俄国国家商队高价运到北京的毛皮愈加滞销。尽管俄国政府采取了种种严厉措施查禁走私，但收效甚微。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初，每年到库伦经商的俄国私商达 200 人次左右。西伯利亚的巨商每年要在这里做 20-30 万卢布的买卖。^①

^①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喀山 1857 年版，第 24 页。

为了加强对库伦互市的管理，从1720年起清政府开始在这里设官。1719年和1722年土谢图汗曾两次致函俄国伊尔库茨克督军，要求每批来库伦的贸易人员不得超过30人。第一批走了之后，第二批方可以再来。由于俄国商人在库伦互市中获取了极大利益，“当时成为国库收入最大来源之一的同中国的贸易是在库伦进行的”。^①因此并未严格遵守中国的规定。在库伦，茶叶作为俄商采购的商品之一逐渐有所增加。参加“京师互市”的俄国国家商队在北京采购的中国商品主要供应欧俄及莫斯科市场，而参加库伦互市的俄商采购的中国商品则大部分是在西伯利亚地区销售，因此对茶叶颇感兴趣。库伦贸易是免税的，因此中国政府未在该地设关抽税，中国茶叶出口的具体数量亦无从考究。库伦互市持续的时间并不很长。如前所述，此间由于俄国政府诱使中国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臣服”，加紧对我国西北边境的侵略活动，从而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俄方肆意破坏双方已达成的协议。为此，1722年8月2日土谢图汗致函俄国伊尔库茨克督军指出：“贵方人员破坏了我们与伊尔库茨克前任督军和色楞格斯克总管伊万·萨维奇缔结的条约。…今请阁下亲自前来色楞格斯克，同到达色楞格斯克的我方人员会晤、谈判。如果阁下不能前来色楞格斯克，则请阁下派遣1名干练人员前来库伦”。^②然而，俄方对我方提出的合理要求置若罔闻，对我方一再提出的严正警告不予理睬，致使边境的形势日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1722

① A·Г·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中译本第2卷第29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八世纪俄中关系》，莫斯科，1978年版。第1卷第348-349页。

年4月清政府宣布驱逐库伦俄商，停止该地区的贸易，从此库伦互市衰落下去了。

三、嫩江、齐齐哈尔市场上的小额茶叶交易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随着中俄贸易的发展，齐齐哈尔在中俄东部边境地区的贸易地位日益提高，特别是1699年黑龙江将军衙门移至齐齐哈尔，该地遂成了黑龙江地区的重镇。十八世纪二十年代，齐齐哈尔的互市贸易曾兴盛一时。

当时，嫩江、齐齐哈尔与俄国的贸易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东路俄国官私商队由尼布楚出发，经嫩江、齐齐哈尔赴北京途中在嫩江、齐齐哈尔等地进行的捎带贸易。如，1704年由萨瓦季耶夫率领的大型国家商队就曾留下一批人在齐齐哈尔就地贸易。二是由尼布楚当局直接派商队到嫩江和齐齐哈尔贸易。1705年后，俄国国家商队不再经过齐齐哈尔，而改由经库伦的中路来京，尼布楚地方当局便自派一些小型商队来嫩江、齐齐哈尔等地贸易。1706年6月，尼布楚督军派遣库·查布林率领的一支33人商队赴嫩江地区贸易。此后，来嫩江、齐齐哈尔的俄国商队逐年增加。清政府不但未加禁止，反而采取鼓励政策。1717年（康熙五十七年）清理藩院致函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玛·加加林，提出“凡递送公文及因公零星前来之人，应皆由尔方原先所走之尼布楚路前往齐齐哈尔地方贸易，如此则边民不至劳苦，而齐齐哈尔等地亦有购买之人，尔方之货物亦可不至延搁”。^①1722年，京师和库伦互市中断后，齐齐哈尔几乎成了中俄贸易的唯一市场。此时，茶叶已经成了西伯利亚市场极为畅销的商品，不仅当地游牧的少数民族

^①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388—389页。

离不开它，俄国哥萨克也逐渐养成了饮茶的习惯。俄商便在此采购茶叶供应俄国市场，贸易额迅速扩大。仅1723-1727年的5年间就有12支俄国商队到达齐齐哈尔。但是，这些商队与参加京师和库伦互市的商队相比，规模小多了。如，1727年由米哈伊罗夫率领的商队只有3人，1726年由温多里率领的最大的商队也只有32人；一般均在20人左右。所携货物主要是牲畜和毛皮。温多里商队携带的货物有“马三百匹，银鼠皮一千三百张，狐皮一百四十张，狼皮六十张，灰鼠皮九千张，獾皮四千五百张，染牛皮一百张，猩猩毡一百，佛特希皮六百张，镜子五十面”^①，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商队的贸易水平。三是当地两国边民相互过界往来的小额贸易。据《筹鄂龟鉴》记载：“岁五月，……在卜魁（即齐齐哈尔-引者）城北十余里画沙为界，各部落人驻其北，商贾、官吏、游人驻其南，中设兵禁。俄罗斯人则秋尽始来，百十为群，一官统之，秃袖方领，冠高尺许，顶方而约其下”。^②

此外，在边境的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还有中俄两国巡边官兵之间的小额贸易，所易之物“无远省之货，无难得之货，亦未尝专派大员督理”。^③

总之，嫩江、齐齐哈尔等黑龙江地区的贸易完全是以货易货，俄国人主要的商品是毛皮和牲畜、少量玻璃及金属制品；中国货主要是布匹、粮食、药材、烟草、食糖及茶叶（主要是砖茶和红绿粗茶）。

①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459页。

② 陈侠君：《筹鄂龟鉴》，第2卷第274-275页。

③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7第3页。

第二章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 茶叶贸易的初步发展

第一节 《恰克图条约》的缔结与 恰克图市场的出现

一、《恰克图条约》的缔结

从 1689 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日起，清政府就多次向俄国政府建议举行划分北部边境的谈判，均未得到俄方的赞同。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中俄“京师互市”和“库伦互市”中断后，视“金钱是战争的动脉”^①的俄国政府感到了局势的严重性。1724 年 3 月，俄国首先作出一个姿态，准备遣返 84 名越境的蒙古边民。1725 年 8 月 22 日，俄国政府宣布派遣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为全权大臣来华就贸易和划界问题举行谈判。1725 年 9 月 25 日，俄国外交委员会向萨瓦发出 45 条训令，商务委员会也同时发出了 20 条训令。训令明确指出：“恢复并巩固俄国在中国的贸易，是他最主要的使命”。^②但对于划界问题则“应用一切有效方法，力求延迟划定国界，拖延愈久愈

① 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 年以前的外交关系》，哈佛，1971 年版，第 169 页。

②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中译本，第 131 页。

好，尽可能赢得时间”。^①

一向视贸易为可有可无，却十分注重北疆安全的清政府对俄国使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为了尽早平定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乱，清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向俄方做出让步。雍正帝派出了以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为首的高级代表团。谈判从1726年11月开始在北京举行，持续了半年之久，先后会议30多次。清政府作出了重大让步，即没有坚持先谈边境问题的一贯立场，而是同意了俄方先谈贸易问题的主张。1727年4月1日双方达成10条协约。其中规定允许俄国商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同意在紧靠边境的地方开辟两处贸易点，代替库伦和齐齐哈尔。^②7月3日，谈判移至边境布尔河畔，经过两个月的激烈辩驳，8月31日签署了《布连斯奇界约》。双方根据原来议定办法，将《布连斯奇界约》与在北京议结的10条协约合并形成一个总条约，即《恰克图条约》。1728年6月25日双方代表正式在恰克图签字换文。

《恰克图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包括边界、贸易、宗教和越界人犯的处理四个方面。其中第4条对两国的贸易问题规定如下：

“今两国定界，不得容留逃人。既已新定和好之道，即照萨瓦所议，允准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按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隔三年，通商一次。既然伊等均系商人，则其食物盘费等项，照旧停止供给。商贾人员，均不征税，商人抵达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中译本，第454页。

② 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中译本第115-116页。

边界，预先呈明来意，而后委派官员接入贸易。沿途应用之驼马人夫，自行雇备。责成管理商队官员，严管属下人等。倘有争端，秉公处理。其随同商队前来之官员，如为较大官员，则照大员礼节优加款待。凡准贸易物品，均不禁止。两国违禁之物，不准贸易。如欲私自留居者，若未经其头人准许，即不收留。其病故者，将所有财物各交本国人员。上述各节均照萨瓦所议办理。

除两国通商外，两国边境地区之零星贸易，应于尼布楚、色楞格两处，选择妥地，建盖房屋，以准自愿前往贸易者贸易。其周围房屋、墙垣、木栅亦准酌量修建，亦不征税。商人均照指定大道行走，如有绕道或往别处贸易者，将其货物入官。所有两国一体酌派官兵，令其同心照看办事之处，均照萨瓦所请施行”。^①

通过该款，俄国得以恢复已被中国政府停止的商队贸易，并且开辟了两国边境上的恰克图市场。《恰克图条约》是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条约签订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俄中段和东段边界基本上保持了长期的稳定，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两国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恰克图市场的缓慢发展和祖鲁海图市场的萎缩

恰克图位于色楞格河东岸，原属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辖境。康熙年间已经“稍成聚落”。《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这里成了两国的边界。条约签订的第二天，中俄两国便决定在恰克图建立跨国境的边关互市之地。到1728年8月底，俄国人已在恰克图搭有6个帐篷和一座有12个粮仓的大院，32座供商

^①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518页。

人住的小木房以及一个拥有 24 个铺面的商栈。^①与此同时，在俄国市圈以南约 400 米处的中国境内，中方“建立木城，起盖房屋，费力无多，颇为坚固”。^②另据俄人记载：“这个城市的建筑样式，街道的设置和城内的生活都很别具一格。……是按纯粹的中国风格建立的。它的街道沿直线伸展，并盖有一个个不大的住房，在其庭院里有各种商摊和货栈，以及粮仓”。^③对于恰克图的中国一侧，华商常称为买卖城。为了维护市场的秩序，中俄双方各在本国市圈“派驻 30 名军人，由两国同级军官管理”。^④

1728 年 9 月 5 日，4 名中国商人和 10 名俄国商人参加了恰克图贸易史上的首次交易，从此驰名中外的恰克图贸易正式开始了。然而，恰克图贸易之初并没有显示出它的优势，几乎长达 30 年时间里在步履维艰中求得发展，这主要是由当时两国的政策决定的。《恰克图条约》恢复了中俄两国已停止的“京师互市”，俄国政府为了保护去北京的官方商队利益，1726-1752 年间曾先后 6 次训令严厉禁止私商进行毛皮贸易。私商既不允许进京，又不允许在恰克图进行毛皮贸易，结果使恰克里俄商可供华商交换的商品极少。在以货易货的年代里，俄商失去了偿付手段，交易自然不会活跃。此外，清政府对赴恰克图贸易的华商管制异常严格。商人到恰克图贸易必须按章支领部票，无部票或绕道别处贸易者，受到了严厉惩罚。据清朝档案记载，雍正十二年五月（1734 年）山西华商朱成龙绕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中译文，第 2 卷第 42 页。

② 松筠：《绥服纪略》。

③ E·II·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 51-52 页。

④ 班什蒂-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文文献汇编》，中译本第 183 页。

道至贝子颜楚布多尔济旗贸易，以 20 大车茶、烟、布匹等物，换取俄人“驼十二峰，马一百二十匹，牛十六头”^①等物，被清政府查获，所换货物入官。朱成龙感到走头无路，自刎身死。必须指出，自《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北方一部分原属中国的蒙古人成了俄属蒙古人。他们或从恰克图，或从绕道走私的华商手中用牲畜换取中国茶叶，虽然无法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但当不在少数。

尽管俄方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措施，为利所趋的俄国商人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将毛皮走私运入恰克图，华商也纷纷到恰克图采购比俄国官商运到北京的毛皮便宜得多的俄国毛皮。据俄国人推测：“中国人从恰克图运往北京的毛皮比国家运往北京的毛皮多 1-2 倍，即 20-30 万卢布；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时，恰克图贸易额应达 40-60 万卢布；1744 年中国人换去了 292800 卢布的货物，而他们购买来的货物为 287560 卢布；1746 年 8 月份，买来中国货 177106 卢布”。^②五十年代以后，随着俄国官方商队进京贸易的进一步衰落，恰克图贸易额明显增长了。1755-1761 年间恰克图的交易额如下（卢布）：

年份	俄国货价值	中国货价值	贸易总额
1755	606084	230981	837065
1756	450768	241252	692020
1757	421878	418810	840689
1758	525999	511072	1037070
1759	718144	698875	1417130

①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 1 编下册第 612 页。

② 特鲁谢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十九世纪之前）》，第 162-163 页。

1760	699940	658331	1358271
1761	391469	610597	1011067 ^①

显然，前几年俄方处于出超地位，逐渐双方持平。中国进口货主要是皮革和粗呢绒。毛皮因是禁运之物，官方统计的数字中不会有毛皮。中国的出口货仍以中国布和丝绸为主。但到五十年代中期，茶叶在恰克图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了。1755-1762年间，俄国进口了6000普特的茶叶（主要是白毫茶、珠兰茶和绿茶），5000-7000普特的砖茶^②，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根据1727年4月1日中俄双方在北京达成的10条协约，1728年5月17日俄国额尔古纳银矿总管布尔佐夫和清政府御前侍卫瑚毕图签订了建立另一处贸易点的换文，“确定根河和额尔古纳河的汇合处，库克多博南面的一块地方作为中俄商人修建贸易圈之处；确立额尔古纳河右岸，祖鲁海图下游的三角洲上作为俄国商人修建贸易圈之处”。^③但由于这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离俄属尼布楚300俄里，离中国嫩江及齐齐哈尔距离更远，贸易始终不振。开始时每年春秋两季交易，后来因自愿前往的两国商人与日俱减，清政府“官员兵丁之官差有限，又秋草干枯，于马畜不利”。^④而俄国“祖鲁海图镇内没有非军事人员居住，甚至海关公职人员也只是在夏季进行交易的时候才

① 特鲁谢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十九世纪之前）》，第162-163页

②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68页。

③ 班什蒂-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中译本第388-389页。

④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590页。

来到这里。最近的村落距离贸易圈 100 俄里”。^①自 1732 年清政府决定结合巡边每年进行一次贸易。每年交易额最多只有 1 万卢布。据不完全统计，1732-1770 年间的交易额为（卢布）：

1732 年	4170	1766 年	1699
1733 年	1508	1768 年	10427
1734 年	4679	1769 年	3463
1735 年	7748	1770 年	2166 ^②

七十年代后，经常无商人专门来此从事贸易，交易变得日趋冷清。茶叶在这个交易额不大的市场上占有主要地位，对此中外学者多有记载。刘选民在《中俄早期贸易考》中写道：“中国商人所售者为次等之茶、烟叶、粗糙棉布及丝绸”。^③米勒和帕拉斯则有同样的记载，即祖鲁海图市场“供给尼布楚地区质量低劣的茶叶、烟草、丝绸和质量一般的棉布”。^④特鲁谢维奇也认为由中国输入的商品为“烟草、茶叶、大布、……”。^⑤尽管茶叶占有重要位置，但因总的交易量极小，茶叶数量自然也有限。除官方统计的数字外，两国所属边民日用生活品交易中茶叶亦是不可缺的商品，并且在缓慢发展。

① E·П·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65页。

② 特鲁谢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十九世纪之前）》，第161-162页。

③ 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载《燕京学报》第25期第185页。

④ 米勒和帕拉斯：《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中译本第35页。

⑤ 特鲁谢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十九世纪之前）》，第158页。

三、《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进京官方商队经营的中国茶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立即恢复了来京的官方商队贸易。1728-1756年的26年间，先后派遣了6支国家商队来京，详情如下①：

出发年份	返回年份	商队头目	携货值(卢布)
1728	1729	莫洛科夫	100 000
1731	1733	莫洛科夫	104 390
1735	1736	费尔索夫	175 919
1740	1742	费尔索夫	100 000
1745	1746	卡尔塔舍夫	100 000
1754	1756	费拉迪金	100 000

不言而喻，俄国国家商队的规模都比较大，这一点从其携货的价值中可以清楚看出。任何一支商队带来的货物都在10万卢布以上。1728年，商队贸易恢复后由莫洛科夫率领的第一支商队仅毛皮就携带210多万张。②此外，还有少量的皮革、呢绒、镜子等。他们在北京“卖出了100多万张松鼠皮，20万张银鼠皮，15万张狐皮，10万张貂皮和其他货物”。③

毋庸讳言，京师互市对于促进中俄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有一定作用。俄国商人不

① 特鲁谢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十九世纪之前）》，第96页。

② 福斯特：《莫斯科人与清朝官员》，1969年英文版，第111页。

③ 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中译本第244页。

远万里，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来到北京，其开拓进取精神并不亚于著名于世的阿拉伯商人。然而，由于商队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诸如俄国商队来京次数过频，携毛皮过多，价格昂贵等因素，造成了北京毛皮过剩，大量积压无法销售，从而引起许多纠纷。每次俄国商队来华，中国政府沿途接送，早期甚至免费安置食宿，清政府逐渐感到不堪其累。为此，乾隆二年（1737年）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曾奏称：“俄罗斯互市止，宜在于边境，其住居京师者，请禁贸易”。^①从俄国方面来说，每派遣一支商队，往返需要3年时间，资金的周转期长。国家商队从色楞格斯克至北京一次，相当于私商从该地到恰克图5次，为了弥补损失，获取更大利润，每支商队来北京都尽量携带高档商品。如名贵毛皮等。而这类商品价格过高，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根本无条件问津；而从恰克图边境走私运进北京的此类毛皮价格又大大低于俄国商队运来的毛皮，这就更加影响了销路。1728年进京的第一支商队就有40余万张毛皮无法销售，只好带回。俄国商队采购的中国商品也只有丝绸、珠宝、大黄等数种，多为俄国宫廷和上层阶级所用。而由于利润低，在俄国普通居民中颇有销路的中国棉布、茶叶、烟叶等却很少采购。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后，商队贸易更是每况愈下。俄政府三令五申地在1731年、1734年、1739年和1752年连续公布法令，重申禁止私商经营毛皮，甚至以死刑相加，终于无法扭转国家商队贸易日趋衰落的趋势。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她亲眼看到国家商队垄断毛皮贸易的弊端，决心顺应历史潮流，上台伊始就公开宣布“不禁止任何人买卖这些皮货，也不禁止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300。

按税率纳税后把这些皮货运往国外”。^①1763年俄国又组织了一个小型官方商队，携货8923卢布，1763年8月离京，获利5800卢布。^②至此，俄国单方面惨淡经营了70余年的赴北京的商队贸易完全停止了。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曾对官方商队寄予厚望，梦想恢复早期有过的辉煌。然而，时过境迁。来京的俄国商队因毛皮滞销，获利转少，使其采购中国商品的数量亦受影响。这时期中国茶叶已经在俄国广大西伯利亚地区和黑海沿岸十分畅销，最受欢迎的是中国砖茶和廉价的叶茶，利润相对不高。而此时中国茶叶在欧俄尚未普及，只有贵族和富裕的家庭中有少量饮用，需求量不大。因此，来北京的国家商队不注重采购茶叶。每支商队虽均有采购，但数量有限。1728年到达北京的第一支国家商队在采购了中国100万公尺的丝绸、棉布后，买入了大约3万磅茶叶，^③算是较多的一次了。这说明，商队贸易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中俄两国经济的发展，更不能适应俄国人日益增长的对中国茶叶的需求，从而抑制了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寻求新的出路，这便是恰克图茶叶贸易发展的前提。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345页。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158页。

③ 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中译本第244页。

第二节 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恰克图茶叶贸易

一、恰克图市场的兴旺及茶叶贸易的初步发展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俄国赴北京商队贸易的停止和祖鲁海图边关互市贸易的衰落，恰克图几乎成了中俄贸易的唯一市场，并且迅速地发展起来。

恰克图边关互市的兴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当时中俄两国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

从俄国方面来看，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六十年代手工工场已由 1725 年的 200 多家增至 700 家，九十年代再增至 1000 多家。手工工场的发展促进了工业产品的增长，而工业产品的增长又推动了商业的活跃。叶卡捷琳娜政府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采取种种措施鼓励商人从事对外贸易。对外贸易额由 1725 年的 630 万卢布，增至九十年代的 1 亿卢布，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增长了 15 倍，商人成了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又由于广大西伯利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同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也极大地增长了。这一时期俄国仍推行其传统的对外扩张政策，三次参与瓜分波兰。为夺取黑海出海口，又先后两次（1768-1774）、（1789-1791 年）对土耳其发动战争，西线战事频仍，国库空虚，无力再与强大的清政府对峙。因此，漫长的中俄中段和东段边界长时间保持一个比较和平安定的环境。这在客观上十分有利于恰克图贸易发展。

以中国方面来看，1757 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政府军

全部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叛乱；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又将回疆大小和卓之乱肃清。天下统一，政权巩固，农业、手工业全面恢复，并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较明朝更加明显。手工业的发展使可供交换的商品日渐增多，商品经济的进步又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就为十八世纪下半叶恰克图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八世纪的最后40年，恰克图贸易额增加了6倍多。据统计，1758年的交易额为1037070卢布，1800年则增加到838万卢布。^①下面的统计数字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恰克图贸易的增长趋势(卢布)^②：

年 份	贸易总额	年均贸易额
1756-1760	5345180	1069036
1770-1774	11601970	2320392
1780-1784	30416744	6083348
1796-1800	31163406	6233681

如果说十八世纪上半叶是恰克图贸易的缓慢发展阶段，茶叶作为商品还没有引起俄商之充分注意的话，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茶叶在恰克图贸易中的地位就大大不同了。1762—1785年间每年从恰克图输出的茶叶近3万普特，占中国全部出口商品的15%左右，茶叶已成为棉布之后居第二位的出口商品了。^③十八世纪最后三年增加的速度更加迅猛。1798年为46997普

①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67页。

② 特鲁谢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十九世纪之前）》，第163—164页。

③ E·П·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146页。

特，1799年为52343普特，1800年再增加到69580普特。^①

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给两个相邻大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首先受益的是俄国商人。茶叶贸易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俄国西伯利亚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之成为西伯利亚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西伯利亚商人向来被俄国政府所轻视，称之为“贫乏的人”。1699年10月27日沙皇在一个训令里声称：“在某些城市中（指西伯利亚地区的城市——引者）有些商人，在征收钱款及实物税方面，无论什么税都没有人对他们抱有信心，因为他们是‘贫乏的人’”。然而，就是这些“贫乏的人”到了十八世纪末“许多人已如此富裕起来，以致成了在西伯利亚许多城市中占统治地位的高贵市民”。^②茶叶不仅成了西伯利亚每个家庭的必需品，也成了恰克图俄国商人财富的重要象征。原苏联学者西林在《十八世纪的恰克图》一书中这样写道：“每个商人都只用茶叶来炫耀，他们把来客没有见过的各种类的茶叶一种接一种地拿出来给他喝”。^③

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发展，使这座“名初不著”的北方小镇声望“大显”。买卖城生意兴隆，商铺林立，有华商60余家，常驻人口400余人。而俄方在恰克图的常驻人口更多，1774年“有商人488名，行会人员908名”。^④早在六十年代，俄国就在恰克图组织了6个贸易公司，即：莫斯科公司、图里耶公司、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公司、喀山公司、托博尔斯克公司和伊尔库茨克公司。^⑤九十年代初，俄国政府对上述公司

① E·П·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68页。

② 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154页。

③ 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90页。

④ 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91页。

⑤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94—95页。

进行了整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公司仍为6个。他们是：莫斯科公司、沃洛格达公司、图里耶公司、托博尔斯克公司、伊尔库斯克公司和上乌金斯克公司。^①

毫无疑问，恰克图茶叶贸易是中俄两个相邻大国之间的平等交易，没有任何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显而易见，受益是双方的。恰克图贸易使俄国政府和俄国商人获取了巨额利润。1800年，俄国政府从恰克图贸易中征收了715364卢布的关税^②，这笔为数不小的收入，加速了俄国的原始资本积累，也为俄国在西方的战争输了血。这时期，恰克图的关税收入占俄国全部关税收入的20%以上。无怪乎俄国人称：“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财富的宝贵而富有生机的汁液输送到整个西伯利亚”。^③恰克图贸易促进了俄国毛皮的销售。以往西伯利亚的大量毛皮都是运往欧俄。上等毛皮常常因为价格昂贵而无人问津，下等毛皮则又因运费过高而无利可图。恰克图边关互市发展起来后，中国成了西伯利亚毛皮最大的销售市场。用滞销的毛皮换取俄国市场日益畅销的中国茶叶，常常使俄国商人获得一倍乃至几倍的利润。

清政府是以地租收入为主的封建国家，恰克图免税贸易对于增加国库收入作用不大。主要是希望借助恰克图贸易换取北部边境的安宁。乾隆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④这虽然是对英国人说的，也完

① 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85—98页。

②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97页。

③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译本，第136页。

④ 《熙朝纪政》，卷6《记英夷人贡》。

全适用于俄国。尽管这样，清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运销过程中征收中国茶商的税收，增加国库的收入。至于中国商人，应该说同俄国商人一样也是十分获利的。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也促进了中国植茶业的发展。

二、三次闭关对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影响

十八世纪下半叶是恰克图互市贸易的大发展时期，茶叶作为中国的出口商品，日益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及无与伦比的优势。然而，由于各种矛盾纠葛，导致了清政府对恰克图的三次闭关，即1762—1768年，1778—1780年和1785—1792年，使双方贸易中断了15年。

闭关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清政府最关心的是北部边境安宁。所以，闭关是清政府制裁俄国破坏边境安宁的一种手段。以第一次闭关为例，乾隆帝在谈及闭关的原因时指出：“自本朝与俄罗斯定约十一条以来，近几年俄罗斯等屡背原定条款，纳我逋逃；于我界内立栅；向伊等商人增加税收，以高价扰害我商人；又不派干员妥结边界纠纷事宜”。^①清楚表明此次闭关是由俄罗斯纳我逋逃、立栅、增税和边界纠纷。又如第三次闭关，松筠在其《绥服纪略》中详细记载道：“乾隆四十九年，库伦有商民靳明者，贩卖附近卡伦之乌梁海游牧贸易，被俄罗斯所属之布里雅特等数人劫去货物，是应明法示惩办理者。时库伦办事大臣勒保同喀尔喀副将军郡主蕴端多尔济、盟长贝于逊都布多尔济三人共理其事，设法访知盗首其名，奏请檄行俄罗斯驻扎额尔口城之固毕纳托尔名拉木巴者，飭令捕盗会审。旋即弋获乌拉勒斋数犯，遣其咭那刺尔送赴恰克图同该处驻扎司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

员申明，遂将按照例罚赔之十倍货物呈缴。正宜将贼犯明法示众，乃其咭那刺尔人本糊涂，意以呈出罚赔货物，事已完结。遂将数犯鞭苔钳其鼻耳，发遣伊境东北无人处所，并未详细会知恰克图司员，办理殊属率谬。库伦大臣发檄询之，固毕纳托尔拉木巴者愚顽无知，一如咭那刺尔推诿，竟以结案为辞。因奉谕旨著典属行文与萨那特，飭令换回其固毕纳托尔等秉公治罪，乃萨那特于五十年春申文，亦仅希冀了事。理藩院奉旨发檄夷飭，旋撤恰克图贸易”。^①事情很清楚，俄属蒙古人入境持械抢劫中国商人，库伦办事大臣照会俄国伊尔库茨克总督拉木巴，要求按 1768 年中俄《恰克图补充条款》办理，不得要挟。接着清政府又致函俄国枢密院，仍得不到满意答复。在此情况下，清政府断然决定关闭恰克图贸易。

毋庸讳言，闭关影响了中俄双方的经济交往和双方商人的利益，也给两边相关人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贸易中断期间，清政府为了解决边境中国一侧居民及卡伦官兵的日常生活必须之茶、糖、烟、布等商品，作了认真安排。训令库伦办事大臣“查其人户多寡，拟定章程，凡卡伦官兵所需者，行令各该旗两月一送，卡伦官兵各有打牲所获皮张，随时发给该旗归还商民；沿边蒙古所需者，令商民领票前往发卖，不致乏用”。^②但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恰克图互市的俄方一侧的商民来说，情况要更糟一些。闭关不仅使俄国国库丧失了巨额的关税收入，在总共 15 年闭关其间，俄国国库至少损失掉了 500 万卢布，大小商贾亦深受其害，同时使漫漫商路沿线的西伯利亚居民也颇感困乏。一向靠为过往俄国商队提供粮秣和运输为生

① 松筠：《绥服纪略》。

② 松筠：《绥服纪略》。

的农户，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以致使“许多家庭因茶叶而贫困下来，乃至乞讨为生”。^①十八世纪末，茶叶已成为广大俄国居民的生活必需品，1785-1792年第三次闭关期间，迫使俄国人不得不“购买和饮用从英国、荷兰和丹麦运来的茶叶，付出三倍或四倍的价钱。因为1普特中国茶叶八十年代在俄国值11卢布，而从西欧运来的则要52卢布以上”。^②如此昂贵的价格使大多数贫穷的俄国人无法承受，不得不缩减消费量，从而也影响了中国茶叶的出口量和中国内地茶区的茶叶生产。

几次闭关使俄国政府大为恼火，两国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但由于俄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再对中国用兵，大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原苏联学者纳罗尼茨基说，俄国政府“在欧洲碰到一些困难，并且不愿失去恰克图贸易，大臣们一致认为不宜同中国打仗”。^③终于迫使俄国和平地与中国解决了矛盾。1788年，俄方撤换了伊尔库茨克总督拉木巴；1789年，俄方迅速合理地处理了俄属蒙古人击毙中国卡伦巡兵案；1791年，俄方再次要求“复准开市”。清政府鉴于双方关系明显缓和，诸多矛盾已基本解决，同意开放恰克图市场。为使以后互市顺利进行，开市前乾隆帝降旨库伦办事大臣松筠“详查情况，妥为定拟章程，明白晓谕，俾俄罗斯永远遵奉。”^④1792年初，松筠遵旨与俄国新任伊尔库茨克总督纳格尔举行会谈，气氛较为融洽。2月19日双方缔结《恰克图市约》五款，内容如下：

1. 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

① 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166页。

② 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183页。

③ 纳罗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译本，第1册第56页。

④ 松筠：《绥服纪略》。

国小民困窘，又因尔萨那特衙门吁请，是以允行，若复失和，罔再希冀开市。

2. 中国与尔国货物，原系两边商人自相定价。尔国商人应由尔国严加管束。彼此货物交易后，各令不爽约期，即时归结，勿令负欠，致起争端。

3. 今尔国守边官皆恭顺知礼，我游牧官群相称善。尔从前守边官皆能视此，又何致两次妄行失和，以致绝市乎。嗣后尔守边官当慎选贤能，与我游牧官逊顺相接。

4. 恰克图以西十数卡伦之布里雅特哈里雅特不法，致有乌拉勒斋之争，今尔国宜严加管束，杜其盗窃。

5. 此次通市，一切仍照旧章，已颁行尔萨那特衙门矣。两边人民交涉事件，如盗贼、人命，各就近查验缉获罪犯，会同边界官员审讯明确后，本处属下人，由本处治罪，尔处所下人，由尔处治罪，各行文知照示众。其盗窃之物，或一倍，或几倍罚赔，一切皆照旧例办理。”^①

《恰克图市约》的签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恰克图第三次闭关，而且为后来恰克图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它是中俄之间第一个以边境贸易为内容的条约。1792年5月初，恰克图重新开市，至此，中俄恰克图贸易进入了一个长达60多年的稳定发展期，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也进入了黄金时期。

^①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9-30页。

第三章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 茶叶贸易

第一节 恰克图茶叶贸易的黄金时期

一、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

1792年2月19日《恰克图市约》签订后，互市贸易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茶叶贸易进入了黄金时期。恰克图成了驰名世界的商业都会，被西方商人赞誉为“沙漠威尼斯”。

恰克图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营已有相当规模。中国市圈买卖城长190丈，宽110丈。据十九世纪中叶到过恰克图的俄国旅行者米奇记载：“整个城市呈四边形，三条主要街道横贯城中。城中设有富丽堂皇的八角塔楼，楼上按有玻璃铃铛和小金属棒，风一吹动便发出悦耳的响声。没有窗户而结构坚固的平房盖有塔楼，上面用金字绘着房主的名字。……必不可少的纸灯悬挂在街道中心的绳子上，不时来回摆动。……官府位于城市的一头。前赴那里需经三道门，其中之一写着一个含有许多意思的题词：‘福’”。^①买卖城大约有华商1500-2900人左右，大部分是山西籍商人。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买卖城专门与俄商做生意的店铺“有正式部票者32家，无部票者34家，小商贩30家，共

^① 阿·米奇：《阿穆尔和东西伯利亚旅行记》，圣彼得堡1868年俄文版，第68页。

有 96 家店铺。还有往乌里雅苏台、库伦行商者，并无定数，此内除小商贩外，其大铺之商民，每年人数不等，皆照例由察哈尔都统衙门领票往恰克图贸易”。^①到十九世纪中叶增至“150 多家商号，其中有 70 家在恰克图的买卖城里有自己的商店，而其余各家则是将其茶叶托付给定居买卖城的商人代售或者干脆在张家口出售给他们”。^②

与此同时，恰克图的俄国市圈“有 20 所带仓库的属于做买卖的商人的私人用房、一个带边境办公室的大黄场、一所边境长官住房、一座警卫室、一个旧商场，另一个新商场是由商人们资助兴建的，还有一座旧教堂。……恰克图除有两家带有 83 个铺面的商场而外，还有一处带有两家店铺的同中国人进行零星贸易的市场”。^③瓦西里·帕尔申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也记叙道：“恰克图是个边境贸易城镇，它位于一个漫坡上，距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四俄里，紧靠边界，以矮木墙与边界隔开。镇上盖满了很美观的木房，教堂也是木造的，但已经破旧，其近旁有一座石砌教堂正在修建之中。属于官家的房屋有：边防长官公署，大黄货栈和由可敬的公民 H·M·伊古姆诺夫出资兴建的华文馆。在这所非常漂亮的学校里，我见到约有 25 名学生，都是市民的子弟。最有趣的是，当时有一名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嘉庆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② 霍赫洛夫：《恰克图贸易及其在俄中政治中的地位（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载《文件在驳斥—反对伪造俄中关系史》，1982 年俄文版，第 115 页。

③ 霍赫洛夫：《恰克图贸易及其在俄中政治中的地位（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载《文件在驳斥—反对伪造俄中关系史》，第 132—133 页。

年轻的中国人经常来听课，在这里学俄文。”^①另据统计，恰克图有 58 家每年交易额均在 5 万卢布以上的俄国商号，其中 37 家是西伯利亚商人开设的，21 家是欧俄商人开设的。^②常驻俄国商人 400 人左右。

进入十九世纪，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迅速超过棉布和丝绸，牢固地占据了第一位，茶叶成了任何商品无法比拟的硬头货，并在以后的全部岁月中尽领风骚。1820 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斯彼兰斯基直言不讳地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③

从茶叶所占的比重看，“1812-1817 年间，白毫茶平均输入额占中国货总额的 60%（按价值计算），1818-1824 年间为 75%，1825-1831 年间为 86%，1832-1838 年间为 89%，1839-1845 年间为 91%”。^④四十年代后半期更高达 95% 以上。从茶叶输出的数量看，1801-1810 年间平均 75076 普特，1811-1820 年间平均 96645 普特，1821-1830 年间平均 143196 普特，1831-1840 年间平均 190228 普特，1841-1850 年间平均 270591 普特^⑤，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四十年代是恰克图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这从下表的统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普

①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 年中译本，第 46 页。

② 如利佩林：《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中贸易》，载〔苏〕《东方学问题》，1959 年第 5 期，第 225 页。

③ E·П·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 189 页。

④ 霍赫洛夫：《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载《中国的国家与社会》，1978 年俄文版，第 93 页。

⑤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 293 页。

特)①:

年 份	白 毫 茶	砖 茶	合 计
1841 年	168218	74390	242608
1842 年	193413	64382	257795
1843 年	135413	87834	223247
1844 年	175254	82402	257656
1845 年	196523	124396	320919
1846 年	227452	109695	337147
1847 年	224006	125646	349652
1848 年	253746	116249	369995
1849 年	165087	119464	284551
1850 年	212178	85440	297618

从上述的统计中不难看出，整个四十年代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有 2/3 是白毫茶。白毫茶是质量较好、价格较高的叶茶，主要的销售地点是欧俄，即马克思所说的“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②也有一部分在西伯利亚各大城市出售。另外 1/3 是在广大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消费的廉价的砖茶。这部分砖茶增加的速度极快，但到四十年代末出口额略有下降，这是由于俄商非法在新疆进口砖茶造成的。随着茶叶出口的增加，恰克图市场上的中国糖销售势头见好。如，1848 年出口的糖几乎占了除茶叶而外恰克图其他出口商品的一半。当然，除茶叶而外，全部出口商品的总和尚不到 5%，

① 根据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 293—294 页表格整理。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66 年版，第 2 卷 122 页。

每种商品所占的比重是十分有限的。

1847-1850年恰克图输出商品（茶叶除外）名细表（卢布）①：

品名 \ 年份	1847年	1848年	1849年	1850年
各种糖	62004	84250	125324	93334
药材	6500	11352	276632	194974
其它生活用品	1691	4157	4600	6121
丝线 棉花	15249	13799	36986	11482
各种织物	74588	54613	111953	85665
零星物品	12456	9762	11815	6664
总计	172487	177933	567310	389250
恰克图输出总额	6800566	5349918	5165334	6916071

自恰克图开市以来，进口的俄国商品中最大宗的是毛皮。即何秋涛所说的“彼以皮来，我以茶往”。②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俄国产的棉布增加了，而三十年代后俄国的呢绒后来居上。“1825年，毛皮占全部出口数的半数，1854年毛皮的比重大为下降（仅占5%）；而1825年只占出口35%的毛制品（呢料），上升为41%；1825年占6%的棉制品，如今已上升为30%”。③

俄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所以发生巨大变化，是与其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的。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虽然还是个封建农奴制

①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278-279页。

② 何秋涛：《朔方备案》，卷37。

③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69页。

国家，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三十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纺织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二十年代时俄国经恰克图输往中国的呢料中大部分是转口的西欧或波兰生产的，但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已全部为俄国自己生产的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在恰克图贸易的商品结构中的出口情况可从下表中清楚地看出（千卢布）^①：

年 份	1825 年	1847 年	1848 年	1849 年	1850 年
俄国经恰克图出口额	5501	6800	5350	5165	6924
其中：					
毛织品和棉织品	1756	4167	3330	3515	4515
毛皮	2945	1840	1342	1047	1640
皮革	891	455	345	379	706
粮食	78	45	51	29	48
牲畜	52	15	12	14	15

此外，俄国商品中还有少量的金属制品和玻璃制品。随着俄国商人茶叶采购量的激增，俄商日益感到可供用来交换中国茶叶的俄国商品十分匮乏。主要是因为中国茶叶在俄国的销路大开，经营茶叶的商人获利颇丰，致使俄商在恰克图采购茶叶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俄国纺织业的增长速度及其中中国人对俄国纺织品的需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关税协议”等特权，大批西方商品，特别是廉价的英国纺织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俄国纺织品面临着西方纺织品的强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06页。

力竞争，这又给了原不很发达的俄国纺织业以沉重打击。俄商既已逐渐丧失了偿付手段，又被有利可图的中国茶叶所吸引，有时只好压低俄国商品的价格，刺激华商的兴趣。压价使俄国商人感到吃亏，便偷偷地将贵重金属（金银）当成商品卖给中国商人，或者干脆支付硬货币或用金银结算。为了与西方殖民者一样在中国享有特权，为了与西方竞争中国市场，俄国极力试图深入中国内地和沿海口岸，这就为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衰落埋下了种子。

整个四十年代是恰克图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不仅茶叶贸易额激增，而且使俄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844年俄国占中国输出额3300万美元的16%，占输入额2800万美元的19%。

如前所述，恰克图茶叶贸易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平等交易，因此两国商人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友好的、融洽的。每年9月至来年4月是交易的繁忙季节，特别是中国春节期间，不仅商务活跃，而且节日气氛相当浓厚。买卖城“彩灯成行，辉映如昼”。^①大批俄国人涌入买卖城观看中国的彩灯和焰火，观赏中国艺人的精彩表演。“游人虽冻得发抖，却乐不可支”。^②好客的中国商人“非常殷勤地招待客人，不厌其烦地请客人吃各种甜食及马德拉酒、香槟酒。他们接待普通的客人也同样亲切、殷勤。妇女们往往带着孩子及慈祥的双亲成群地拥进商铺，毫不客气地大嚼糖果，痛饮给他们这般不拘礼节的客人端来的绍兴醇酒和中国草浸酒”。^③元宵节时依然是彩灯高照，热闹异常。

①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译本第51页。

②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译本第51页。

③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译本第52页。

一位到过买卖城的美国商人写道：“城市建筑得很好，实际上，他们的许多房屋和家俱设备是相当精美和奢侈的。我参观过很大的堆满茶叶的栈房，这些茶叶是准备用来同俄国商人交换皮货、呢绒或黄金、白银的，因为据说现在根据《恰克图条约》议定，不是以白银支付货款的三分之一，而是以白银和黄金支付货款的三分之二，白银和黄金都跑到中国商人的大钱柜里去了，所以白银和黄金在这个地区有很高的贴水”。①

双方礼尚往来，在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帮助。据《满文月折档》记载：“自乾隆五十九年以来，恰克图我方栅栏两次失火，皆俄罗斯派人一同扑灭，前往恰克图章京恩赏俄罗斯一包冰糖、二篓茶叶。俄罗斯栅栏失火一次，我方亦派人协助扑灭，伊等赏我金牛”。②

恰克图的交易办法是约定俗成的。大批交易通常是中国商人先到俄国市圈，看好样品后，双方商人一边喝茶，一边讨价还价。价格谈妥后当面将成交的货物封存，然后俄国商人随同中国商人一起到中国市圈，选好中国茶叶，亦是一边喝茶，一边讨价还价，价格商定后即可互换货物。有时为使气氛更加融洽，中国商人宴请俄国商人。但毕竟是贱买贵卖的商业法则起着支配作用，有时中国商人“坚持要价，分文不让，……俄国人对他们也同样强硬，毫不相让。不过，一旦他们当中有一方决定作成这笔生意，这时买卖就象大水溃堤一样奔腾向前，市面也随即沸沸扬扬，活跃异常”。③一、二月份是交易的最佳季

① [美]查尔斯·佛维尔编：《西伯利亚之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中译本第103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佛尔卿额奏恰克图俄栅失火我方派人扑灭俄省长赏赐物品折》（满文月折档）。

③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译本第50页。

节，许多笔生意是在节日的餐桌上达成的，双方商人都认为融洽的气氛有利于交易。交易过程中不用翻译，中国商人用俄语会话，虽然生硬得象汉语，但俄商都能够听懂。有时，俄商为便于华商理解，也有意将俄语说成中国腔。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买卖城方言。十九世纪初，几乎所有买卖城的华商都会讲俄语，而俄商懂汉语的却一个也没有。这表明了华商的聪明智慧和开拓进取精神。

二、恰克图茶叶贸易促进了中俄两国经济的发展

毋庸讳言，恰克图茶叶贸易适应了两国人民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对双方都有益处。

对于俄国方面来说：首先，恰克图茶叶贸易是俄国国库的一项可观收入。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在恰克图的关税收入占其全部关税收入的15-20%。^①就是说俄国关税收入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于恰克图茶叶贸易。这笔收入不仅支持了俄国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也加速了俄国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

1802年，俄国经恰克图输往中国的商品额为201.6万卢布，占同亚洲贸易总额的63%；18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加到251.3万卢布和70%；而1825年的贸易额比1802年翻了一番还多，达416.3万卢布。^②“一个恰克图抵上三个省”^③，这是当时对恰克图的最好写照。

恰克图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俄国棉毛织业、茶叶加工

① 索勃列夫：《十九世纪前半叶俄国的关税政策》，彼得堡俄文版，第3页。

② 罗日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25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俄文版第37页。

③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第136页。

业、狩猎业、畜牧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①俄国人自己也承认，恰克图贸易可以出口其“无法进入欧洲市场的纺织工业产品，俄国纺织工业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贸易的状况”。^②由于地缘优势，恰克图贸易对西伯利亚工业的发展有特别的促进作用。在上乌丁斯克、色楞格斯克、伊尔库茨克等较大城镇都开办了皮革和丝缎加工工厂。同样对于欧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莫斯科省长谢尼亚温曾强调指出：“西伯利亚地区的繁荣和我国纺织工业，特别是莫斯科纺织工业的兴盛，主要依靠它，它通过向恰克图市场往返运输各种商品，活跃了从莫斯科到中国边境的遥远之路”。^③俄国到处有为恰克图市场生产商品的工厂，“1857年仅莫斯科就有96家为恰克图生产的工厂，其中37家生产呢绒，45家生产棉织品，14家生产亚麻和大麻织品”。^④苏联研究恰克图贸易的著名学者西林在论及恰克图贸易给俄国带来的巨大好处时指出：“第一，中国是推销毛皮的最主要市场之一。第二，从中国输入了许多，特别是西伯利亚所需要的种种货物。第三，对华贸易，对于我国的某些生产部门，首先是纺织业发生一定影响，向中国出口粗毛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呢绒生产的发展。牲畜和皮革的对华贸易，影响到西伯利亚畜牧业的扩大和耕作业的提高。由于恰克图贸易，西伯利亚发展起来了渔猎业、造船业和运载业。第四，促进了同中亚和西欧贸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66年版，第2卷第123页。

②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70页。

③ 霍赫洛夫：《恰克图贸易及其在俄中政治中的地位》，载《文件在驳斥—反对伪造俄中关系史》，第140页。

④ 叶季纳尔霍娃：《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恰克图贸易及其对俄国、蒙古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第11页。

的扩大”。^①西林的总结应该说是相对客观和公正的。

其次，俄国商人从恰克图茶叶贸易中也获取了巨大好处。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商以 700 万元在恰克图购买的中国茶叶，可在下诺夫哥罗德集市上卖得 1800 万元，获利在一倍以上。^②巨额利润使俄国各地的商人云集恰克图。1806-1807 年度，在恰克图从事贸易的俄商就来自 17 个城市和地区，其中包括莫斯科这样的中心城市。商人们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往往大批批发商垄断市场，使中小商人受到排挤。尽管如此，绝大部分商人还是获取了可观的收益。在恰克图“百万富翁不是稀罕事”。^③发了财的俄国商人用各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富有。“这里到处盛行的最平常的宴会，其豪华奢侈，除伊尔库茨克外，任何西伯利亚的城市无与伦比”。^④无怪 1841 年《莫斯科人》杂志这样写道：“恰克图贸易是俄国获利最大的贸易，大概俄国人所从事的任何一种贸易都无法同它相比”。^⑤

恰克图贸易也给普通的俄国居民带来很大的实惠。如上所述，恰克图贸易促进了俄国工农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为广大居民提供了众多就业的机会。例如，贝加尔湖附近的俄国居民，“单只把货物由恰克图运至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税关去检查，以及包装货物等，即可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可靠的收入。至于经营各种生产事业，小额买卖以及很多其它活计，那就更不用

① 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 83-84 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 1 册第 664-665 页。

③ 米奇：《阿穆尔和东西伯利亚旅行记》，第 71 页。

④ 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第 90 页。

⑤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 70 页。

说了”。^①卡巴诺夫说得更为清楚：“莫斯科到恰克图有 6000 多俄里，每年花费在往返运输上的费用达 350—400 万卢布，这些钱大部分流入了西伯利亚和大俄罗斯一些省份的农村居民手中。这不仅使他们过上了温饱的生活，还有利于这一广大地区的耕作业和畜牧业，即农业的发展。这一点对于工业薄弱的西伯利亚尤为重要，因为那里的大部分居民只能从事畜力运输和捕鱼猎兽之类的工作。说到猎兽，西伯利亚每年运到恰克图上市的皮货价值可达 90 万银卢布，这笔收入大多进入了西伯利亚最贫穷的居民——猎民的腰包”。^②

俄国政府也承认恰克图贸易对俄国更为有利。1792 年订立的《恰克图市约》开宗明义第一条就公开声明：“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是以允行”。^③在两个平等的大国之间用这种口气，无疑充分地反映了恰克图贸易对俄国更为有利的真实情况。

当然，恰克图贸易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同样也有很大好处。首先，它保持了北部边境一个半世纪的安宁。前已述及，清朝的对外贸易不是为了增加商业资本和国库的收入，主要是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以及为了满足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奢侈的需要。只要俄方破坏了边境的和平，清政府就打出停止恰克图贸易这张王牌。十八世纪下半叶恰克图的三次闭关正是这样出现的。俄国人十分清楚，他们不可能一面蚕食中国北方领土，一面保持着对其十分有利的恰克图贸易。俄国人需要大量的金钱，他们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因此，要维持恰克图贸易的

①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第 44 页。

②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 70 页。

③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29 页。

巨大利益，就不得不暂时“放弃对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引者）的图谋”。^①对于清政府来说，这是最大的利益所在了。当然，一旦恰克图失去了吸引俄国人的力量，边境的安全也就不存在了。

恰克图贸易也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随着茶叶出口量的增加，恰克图的华商常年派人驻守在内地产茶区收购、贩运茶叶，通过传统的陆路，即茶商们将福建、江西、湖南、湖北产的茶叶通过长江水运集中到汉口，再溯长江而上运至湖北的樊城，经河南赊旗镇至山西，再经过山西的路安府、沁州和太原运到张家口，最后运往恰克图。恰克图茶叶贸易的繁荣期，仅张家口一地就有山西客商百余家。茶叶运到张家口后专门有一批匠人进行加工、制造、包装，然后装在骆驼或牛、马车上运往恰克图。为此，张家口一带出现了一批运输专业户。有的大户一家就有骆驼400-500峰。据察哈尔都统统计载：“由口赴恰道路，除军台外，商贾之路有三，分东西中：东路自乌兰坎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扎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坎、河洛土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一西路也。中路由大镜门外西沟之增济图坝，经大红沟、黑白城子银黄旗牛群大马群，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呢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

^①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成功》，中译本，第52页。





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一中路也。”^①

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发展，对于我国内地许多城市，诸如汉口、樊城、太原、张家口、库伦等地商业的发展，以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茶叶生产的发展均起到了推动作用。仅张家口一地就有茶商 100 多家，专门从事茶叶加工的就高达 500-600 人。每年有 20-40 万担的茶叶由产茶区运到恰克图，这笔为数可观的运费除一部分为运输大户占有外，大部分还是流入了沿途贫苦农民和蒙古居民之手，不仅有利于沿线百姓的生计，也推动了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

茶叶由张家口北上运往恰克图，经过广袤的蒙古高原，且有 800 里浩瀚的戈壁滩，风餐露宿，异常艰苦。陈篆在《蒙古随笔》中写道：“绵绵斯道，几不蓬人。自米盐薪水，无不咸备。百里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水味则苦碱外，腥且臭，浊且涩，犹宝如玉液”。^②数以万计的运茶大军使罕为人至的蒙古高原充满了勃勃生机。中国商人正是以这种坚韧不拔的奋进精神，开拓了我国历史上继丝绸之路之后的第二条通往西方的商业大道。

① 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载《历史研究》1982年6期，第21页。

② 陈篆：《蒙古随笔》。

第二节 西北和东北边疆的 茶叶贸易

一、新疆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清军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之乱，统一了中国西北地区。清政府为了满足一向与我国西北地区各族人民有密切联系的中亚安集延人（乌兹别克人）、布鲁特人（柯尔克孜人）和哈萨克人的贸易要求，相继在伊犁、塔城等地开展了各民族间的通商互市活动。斯时，俄国尚不与我国西北地区接壤，中俄间又有恰克图互市，因此，清政府严禁俄商来新疆贸易。俄国与新疆的贸易是通过上述中亚商人进行的。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俄国叶卡捷琳娜政府鼓励其商人从事对华贸易，给予种种优惠。因此，在中国伊犁、塔城、阿克苏等地市场上到处都有俄国的呢绒、毛皮等商品，而在俄国奥伦堡等地的市场上中国的布匹、丝绸及茶叶亦极有销路。为获取更大利润，越来越多的俄商装扮成中亚商人直接来新疆贸易。清朝地方官员明知是俄国商人，亦不严禁，以至这种违约贸易达到“已难掩人耳目”^①的程度。为利所趋的俄国商人并不满足这种间接贸易和伪装中亚商人来华进行的贸易，多次要求直接与新疆贸易。1797年，俄方提出在中方的霍尼迈拉卡伦贸易，被清政府以“所请与例不符”加以拒绝。同年，俄国政府

^① 《清宣宗实录》，第475卷。

颁布《布赫塔尔明斯克通商条例》；1803年，又在布赫塔尔明斯克设立了海关，该地遂成为对华贸易的前哨。但因清政府一直未正式认可新疆与俄国的直接贸易，俄国仍然只能冒充中亚商人来华。第一支来自布赫塔尔明斯克的俄国商队是塔拉商人涅尔平率领的。商队携带5000卢布的俄国货，于1809年到达塔城。翌年，涅尔平又率商队携10000卢布俄国货到达塔城和伊犁。由于获利甚丰，俄商纷纷效尤，交易的货物也日渐增多。1811年经布赫塔尔明斯克输入到新疆的俄国货价值达15万卢布。^①此间，俄国又先后开辟了经塞米巴拉金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特洛伊茨克和奥伦堡等地来新疆的商路。早在1807年俄商穆尔塔尔就率领一支500匹驼马的大商队由塞米巴拉金斯克来到塔城。^②1811年在尼亚佐夫等人率领下的另一支商队携带11万卢布的俄国货到达阿克苏。^③1813年，一支拥有32.1万卢布俄国货的商队前往阿克苏，翌年带回总值100万卢布的中国货，其中大部分是茶叶。^④随着俄国对哈萨克控制的加紧和对达吉斯坦等地的吞并，塞米巴拉金斯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作用增强了，并逐渐取代了布赫塔尔明斯克，其中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地位更重要一些。

十九世纪初的十几年中，俄商输往伊犁、塔城和阿克苏的商品价值增长了一倍多。1803年为6.96万银卢布，1812年增

① 霍赫洛夫：《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载《中国的国家与社会》，1978年俄文版，第99-100页。

② 札瓦利申：《西西伯利亚纪述》，1867年俄文版，第3卷第83页。

③ 霍赫洛夫：《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载《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第100-101页。

④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册，第354页。

至 12.3 万银卢布，1821 年再增至 14.2 万银卢布。^①俄国商队运往新疆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毛皮、皮革和金属制品，其结构与恰克图相似。但俄国商队在新疆采购的中国商品却有别与恰克图。十九世纪前二十年，丝绸和棉布在恰克图华商出口商品中还占有一定地位，在新疆却不占主要地位，只有茶叶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这是因为新疆距离茶叶需求量很大的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和人口相对稠密的俄属中亚地区近的缘故。由新疆进口的中国茶不仅比恰克图进口的茶略微便宜，而且可以大大缩短俄商资金周转的期限。1825 年，出口到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中国茶叶为 60 普特 22 俄磅，到 1835 年增至 909 普特 51 俄磅，十年间增长了 15 倍。^②十九世纪初，俄商采购的茶叶大多是廉价的砖茶，随着茶叶在欧俄的普及，白毫茶的销量猛增。1850 年首次超过砖茶占据了首位。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新疆输往俄国的茶叶数量如下（普特）^③：

年份	白毫茶	砖茶	合计
1836	9	1411	1420
1837	19	1008	1027
1838	10	1136	1146
1839	152	1727	1879
1840	1221	1558	2779
1841	1362	1714	3076
1842	477	3255	3732

① 霍赫洛夫：《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载《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第 101 页。

②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第 357 页。

③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 440 页。

1843	755	4555	5310
1844	1222	3383	4605
1845	2532	5515	8047
1846	2686	8208	10894
1847	2404	5050	7454
1848	892	5439	6331
1849	5160	8528	13688
1850	11456	7614	19070

如果从价值上看，四十年代以后茶叶所占比重猛增，到四十年代末与恰克图贸易一样均占有90%以上（卢布）^①；

年份	白毫茶	砖茶	棉布	丝绸	毛织品	皮货	其它商品
1842	21209	38379	18869	42074	66	-	30760
1843	36916	54523	10540	43529	-	-	16204
1844	59189	37283	7305	39865	50	28	4620
1845	109806	62916	14349	47525	1005	211	5458
1846	127908	89448	15668	50446	496	74	20879
1847	114311	57061	14607	47734	450	-	15008
1848	39696	65667	6476	17452	279	-	4912
1849	190517	99993	4464	18759	-	-	3976
1850	413480	88602	6583	14332	564	-	6977

以上表可以看出，十年间白毫茶输出额增长了20倍，砖茶仅增长1倍多，而棉布和丝绸则减少了2/3。新疆贸易的发展引起了俄国政府及商人的极大兴趣。这是因为该地区不仅可以采购大量廉价的中国茶叶，而且可以大量推销俄国呢绒、

^①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438页。

棉布及皮革等商品。毫无疑问，新疆是俄国最为有利可图的市场之一。遗憾的是，由于俄国未取得在该地区被清政府认可的合法地位，贸易额虽有很大增长，但仍大大低于恰克图。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凭借不平等的“关税协议”条款，大量在中国倾销其呢绒，并逐渐垄断了海路的茶叶贸易，排斥了欧洲大陆市场上的俄国茶商。俄国自知无力在海路上与西方列强竞争，但又不甘心利益被夺。在这种情况下，一面以“俄美公司”的名义试探对华海路贸易的可能性，一面压迫清朝政府对俄开放新疆的陆路贸易，以便凭借地缘优势占领新疆市场，打击英国势力。

1844年4月，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修士大司祭佟正笏（波里卡尔普）向俄国政府建议在新疆开辟新的市场，受到重视。1847年7月，佟正笏奉俄国政府之命，正式要求清政府开放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三处为商埠，被拒绝。1848年，佟正笏再次受命提出同样要求，仍遭拒绝。清政府警告说“该佟正笏本系住京达喇嘛，为两国公事，再不可干渎呈请矣”。^①然而，俄方并不甘心。1850年初，科瓦列夫斯基以护送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换班之机，第三次提出在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三处添设贸易口岸的要求，再次被拒绝。清政府理藩院在给俄国枢密院的照会中明确指出：“恰克图一处通商，百年来商货云集，获利甚丰，实为吉祥顺利，今若贪多鹜广，不惟该处距中国系万里沙漠，人烟稀少，内地商人断不肯跋涉前往，并恐有因各该处通商之请，面向之在恰克图贸易者转或观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

望不前。”^①然而，俄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开放西北口岸，终于迫使腐败的清朝政府屈服了。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1850年1月）道光帝谕旨指出：“惟该国咨文此次居然坚请于伊犁等处添设贸易，似不便径行拒绝，致激事端”。^②至此，清政府被迫同意了俄国提出的部分要求，开放伊犁和塔城。美国学者约瑟夫·弗莱彻认为：“假如清政府拒绝批准俄国在伊犁和塔城贸易，这个贸易无论如何仍将继续下去。对清朝法律的公开蔑视，将加速帝国在北疆统治的崩溃，就会引起其他国家注意到清帝国在其亚洲腹地边境的虚弱；反之，如果清政府批准这个贸易，当局就可以限制它，并重申朝廷的权威。所以，清政府答应了俄国的要求”。^③尽管这种评论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起码说明清帝国的衰落已是千真万确的了。1850年5月，清政府照会俄国政府，通知同意开放伊犁和塔城，并请派人于第二年春天来伊犁，具体会商开埠事宜，并授权伊犁将军奕山与俄国代表会商此事。

1851年8月，中俄双方签订了《伊塔通商章程》，俄国正式取得了在中国新疆之伊犁、塔城免税贸易的权利，从而打破了中俄只在恰克图一处平等边关互市的局面。

《伊塔通商章程》总计17款，内容如下：

1. 两国议定通商之后，各谕属下人等，安静交易，以敦和好。
2. 两边商人互相交易，虽系自定价值，不能不为之设官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理藩院为俄要求在伊塔三处通商事致俄罗斯馆监督文》。

② 《清宣宗实录》，第475页。

③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第10卷第7章。

照管。中国由伊犁营务处派员，俄罗斯专派管贸易之匡苏勒（即领事-引者）官照管。遇有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

3. 通商原为两国和好，彼此两不抽税。

4. 俄罗斯商人前来贸易，由该头人带领到中国伊犁博罗霍吉尔卡伦、塔尔巴哈台乌占卡伦，必须有俄罗斯国执照，呈坐卡官照验。由坐卡官将人数及货物数目声明转报，派拨官兵沿卡照料护送，彼此不得互相刁难。

5. 俄罗斯商人往来，均由议定卡伦按站行走，以便沿卡官兵照护。

6. 俄罗斯商人，在中国伊犁博罗霍吉尔卡伦外，塔尔巴哈台乌占卡伦外行走，倘有夷匪抢夺等事，中国概不经管。自人卡伦及在贸易亭居住，所有带来货物，系在该商人房内收存，各自小心看管，其驼马牲畜在滩牧放，尤宜各自留心看守。倘有丢失，立即报知中国官员。两边官员公同查看来去踪迹，如在中国所属民人庄院，或将行窃之人立即拿获，尽〔数〕搜出实在原窃赃物给还外，并将行窃之人严行惩办。

7. 两边商人遇有争斗小事，即著两边管贸易官员究办。倘遇人命重案，即照恰克图现办之例办理。

8. 俄罗斯商人每年前来贸易，定于清明后人卡，冬至即停止。倘于定限之内其货物倘来卖完，听该商人在此居住，售卖完竣时，由俄罗斯管贸易官飭令旋回。其往来货物驼驮，如不敷二十匹头，不准其往来行走。至匡苏勒官员或商人遇有事故，派专人出卡，每月只准两次，以免沿卡官兵照护之累。

9. 俄罗斯商人前来在贸易亭居住，自有俄罗斯管贸易官管束。两国商人交易之事，自行往来贸易。如俄罗斯商人前往街市，必由俄罗斯管贸易官给予执照，方准前往，不得任意出

外。如无执照者，即送俄罗斯管贸易官究办。

10. 两边为匪逃逸人犯，彼此均不准容留，务须严行查拿，互相送交各自究办。

11. 俄罗斯商人前来，必有骑驮牲畜，即在指定伊犁河沿一带，自行看牧。其塔尔巴哈台亦在指定有草地方牧放，不得践踏田苗、坟墓。倘有违犯者，即交俄罗斯管贸易官究办。

12. 两国商人交易，不准互相除欠。倘有不遵定议致有施欠者，虽经告官，不为准理。

13. 俄罗斯商人前来贸易，存货住人，必需房屋，即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贸易亭就近，由中国指定一区，令俄罗斯商人自行盖造，以便住人存货。

14. 俄罗斯商人依俄罗斯馆之教，在自住房内礼拜天主，听其自便。至俄罗斯商人有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病故者，即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城外指给旷地一区，令其埋葬。

15. 俄罗斯商人带来羊只，每十只内官买二只，每羊一只，给布一匹。其余一切货物，均在贸易亭听两国商人自行定价交易，概不由官经营。

16. 两国彼此遇有往来寻常事件行文时，中国用伊犁将军所属营务处图记，俄罗斯国用管西边大臣所属营务处图记。

17. 此次议定一切章程，互相给与凭文，中国缮写清字四张，钤用伊犁将军印信；俄罗斯国缮写俄罗斯字四张，用使臣图记。^①

《伊塔通商章程》与1728年6月签订的《恰克图条约》有本质不同。《恰克图条约》第4条“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

^①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上册，第15-17页。

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①是指中俄双方在边境城市恰克图进行贸易。恰克图由中国的买卖城和俄国的恰克图两部分组成，中间仅一道之隔。俄国货运到买卖城中方不抽税，中国货运到恰克图俄方亦不抽税，机会对等，完全是平等的易货贸易。而《伊塔通商章程》第3条“通商原为两国和好，彼此两不抽税”^②则只片面规定中国对俄国开放伊犁、塔城，俄国商品可以免税进入中国城市，而俄方并未在其境内对等开放两个城市，亦只字未提华商可以携货免税进入俄国境内。因此，这里所谓的免税贸易是俄商独享的特权。不仅如此，俄商还通过该章程第2、9、13等条款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和在伊犁、塔城建立俄国贸易圈之特权。不言而喻，《伊塔通商章程》是俄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大气候下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俄贸易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二、东北地区与俄国零星的茶叶贸易

黑龙江地区的中俄贸易是随着俄国人十七世纪中叶的东渐开始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据条约第5条“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③的规定，双方边民的互市成为合法。但是因为当时俄国人极少，双方贸易只是一些零星的小额物物交换。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规定中俄两国除在恰克图互市外，另有黑龙江地区的祖鲁海图。前已述及，因该地人

① 北洋外交部条约司：《中外约章汇编·中俄部分》，1927年版。

②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上册第15页。

③ 北洋外交部条约司：《中外约章汇编·中俄部分》，第8页。

烟稀少，地理条件极为不便，又与传统的商路和城镇相距遥远，贸易状况始终不佳。即使如此，中俄双方在黑龙江地区的贸易始终未停止过。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黑龙江地区的贸易主要有中国巡边人员、驻卡伦人员同俄国商人、哥萨克之间的易货贸易以及双方沿边居民间的小额贸易等三种形式。

1689年9月7日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大体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线。为保持黑龙江地区边境的安宁，清政府开始实行一种定期的巡边制度。即每年初夏，由齐齐哈尔、墨尔根、瑗珲三城副都统各派“协领1员，佐领、骁骑校各2员，共兵240员，分三路至格尔必齐、额尔古纳、墨里勒克、楚尔海图巡视”。^①巡边官兵带去中国布匹、丝绸、茶叶、糖、烟叶和烧酒等中国货，交换俄国的玻璃、五金器皿、毛皮及鹿茸等。

1728年《恰克图条约》之后，清政府为保证边境不受侵犯，在黑龙江沿边地带设立了许多军事哨所，即满语所说的卡伦。驻守卡伦的官兵长期生活在边境地区，比巡边官兵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边境贸易。和对待巡边官兵一样，一般情况下清政府对卡伦官员参与交易零星货物的政策也是比较宽容的。即便是在恰克图第一次闭关期间，此种贸易仍未停止，以便使两边人员生活日用品不致匮乏。乾隆帝曾谕令黑龙江将军富僧阿“卡座人等，照旧与俄罗斯交易零星物件，不必禁止”。^②但恰克图第二次闭关时，为了达到制裁俄国的目的，乾隆帝曾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训令：“凡齐齐哈尔，与俄罗斯接壤地

①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5。

② 《清高宗实录》，第797卷。

方，一体停止”^①贸易。

十八世纪末，西方列强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断破坏清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制定的政策。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为特使到达北京，公然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口岸，允许英国派官员驻北京，把舟山附近小岛和州省附近的一地划给英国人作居留地等无理要求，被清政府断然拒绝。1805年，俄国政府也派遣“俄美公司”的《希望号》和《涅瓦号》船只进入广州，进行海路贸易的试探。为此，清朝理藩院向俄国枢密院提出抗议。指出：“查条约之中既已明白规定，贵国一切商业应在恰克图地方集中贸易，不得向其他地方进行买卖，……贵院应当布告晓谕贵国一切人等，严禁前来我国其他边界地方进行贸易。今后如有违反条约在其他地方贸易情事，则贵国即系意欲禁止恰克图之通商，我院自当奏请将约定之恰克图通商停止”。^②广州事件造成之影响使清政府加紧了对黑龙江边界地区贸易的管理，开始在很大程度上禁止驻卡人员与俄国的贸易。由于这里的贸易给双方带来方便，获利较丰，一时禁止，十分棘手。于是双方便暗地进行非法的走私贸易，屡被清政府查禁。此类事件在嘉庆道光年间的档案中时有记载。如道光六年（1826年），“披甲布彦达赖等，贪图小利，携带布匹茶叶等物至卡伦，换得俄罗斯之牛30余头”被“革去披甲，从重枷号两月，期满鞭笞100以为众戒。其所得大小牛

① 《清高宗实录》，第1079卷。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大清理藩院致俄国枢密院函》（嘉庆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39头，亦将照例入官”。^①道光十六年（1836年），额尔古纳河畔乌雨勒赫齐卡伦披甲王勤、车登等人“将许多布匹、茶叶等物带到卡伦，以之换取俄罗斯20余匹马”而被“罢其披甲，重枷三月，待满期后各笞百鞭，以示惩戒。将伊等所有换取马匹，……例旧充公”。^②虽然漫长的边境线很难彻底禁绝走私贸易，但毕竟还是极大限制了驻卡伦人员的易货贸易，给双方驻卡人员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俄方更是苦不堪言。道光十七年（1837年），俄罗斯卡伦头目派人来中国卡伦，“请以友好之道接济我150块茶砖，以利生计”^③，正是反映了俄方的困难状况。

茶叶在驻卡人员的易货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因属免税，又屡被禁止，无法统计数量。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俄东部两侧的居民人数都很稀少。俄国一侧除俄属当地少数民族外，几乎没有俄罗斯人；中国一侧，大批满族人入主中原，也是地广人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变迁，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两侧的人口已明显增加，沿边两侧居民的贸易关系也日趋活跃起来。中国一侧黑龙江沿边一带主要居住着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和赫哲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都与内地保持着密切联系。辽阔的黑龙江两岸不仅按《尼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禄诚奏为治罪自俄罗斯地方换取牛畜之卡伦兵丁并参奏放回卡座兵丁之官员事折》，（道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满文月折档）。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黑龙江将军哈丰阿等奏审拟私换俄罗斯马匹之坐卡兵丁缘由折》，（道光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满文月折档）。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丰阿等奏为参奏接受俄罗斯牛畜之官员事折》，（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满文月折档）。

布楚条约》的规定属中国领土，实际上清政府也一直在这里行使主权。曾到过该地的旅行家马克在其《游记》中写道：“满洲官员每年都从松花江来到阿穆尔河，向边区居民征收赋税，直至基里亚克（即黑龙江下流居住的费雅喀族——引者）居住的地区”。^①常有内地商人来边区经商，他们运来棉布、丝绸、茶叶、烟叶、酒及粮食等，换取当地少数民族的毛皮等商品。

鄂温克人主要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上游一带；达斡尔人和鄂伦春人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一带；赫哲人及费雅喀人主要生活在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一带。他们用自己的毛皮、鹿茸等物交换俄国哥萨克的面粉、金属器皿及其他日用生活品。有时也用从汉族人手中得到的内地茶叶与俄国人交易，但数量不大。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俄国人同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人的交易有明显发展，主要是因为“俄美公司”的介入。他们从当地少数民族手中廉价收购名贵毛皮，运往俄国，再通过恰克图输入到中国，牟取暴利。五十年代后“俄美公司”将从海路进口的中国茶叶，经过黑龙江河口运往俄国。其中有一小部分倒灌入境，在黑龙江沿岸一带洒卖。这是继新疆之后又一个倒灌中国茶叶的地方，只是数量有限而未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

第三节 “俄美公司”与中俄茶叶贸易

自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俄国探险家白令率领的俄国《圣彼得堡号》海船到达北美后，“被一本万利的毛皮业的传闻所吸

^①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1977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194-195页。

引”^①的俄国人纷纷来到北美。十八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下的俄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俄国商人开辟通往美洲的航路。此时，正值恰克图贸易稳步发展之际。商人试图利用北美的毛皮，特别是数量极大的海狗皮换取俄国市场极为畅销的中国丝绸、棉布和茶叶等。从1779年开始，美英商人将北美毛皮运入广州市场，给长期以来经陆路向中国推销毛皮，几乎是独占中国毛皮市场的俄国商人以极大威胁。为此，俄国美洲殖民地总管巴兰诺夫在给政府的报告里惊呼：“大量皮货经多种渠道流入广州，并由广州运销全中国，由于这些皮货价格低廉，而使我们在恰克图的贸易遭受严重损害，最后很可能关税枯竭”。^②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一方面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管理，于1797年7月8日成立了“受皇上庇护的俄美公司”^③，明确规定公司享有在北美狩猎、贸易及航海的种种特权；另一方面利用“俄美公司”充当俄国开辟对华海路贸易的急先锋。1805年底，由船长克鲁逊什特恩和里相斯基率领的《希望号》和《涅瓦号》先后到达广州。在英国商人汤姆士·毕尔的“帮助”之下，非法在广州售出了11万张毛皮，并采购了茶叶、磁器等中国商品。这是俄国商人等一次直接经海路非法贩运的中国茶叶。当清政府得知俄国商船擅自来广州贸易后十分震惊，立即下令扣留俄船，但为时已晚，两艘船已满载中国货物扬长出海。为此，粤海关监督延丰、阿克留阿及总督那彦成、吴熊光等人受到严厉查办。旋即清政府理藩院行文俄国枢

① C·B·奥孔：《俄美公司》，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译本，第4页。

② 奥孔：《俄美公司》，中译本第263页。

③ 奥孔：《俄美公司》，中译本第38页。

密院，明确指出：“贵院应当布告晓谕贵国一切人等，严禁前来我国其他边界地方进行贸易。今后如有违反条约在其他地方贸易情事，则贵国即系意欲禁止恰克图之通商，我院自当奏请将约定之恰克图通商停止”。^①俄国政府有中国三次闭关的教训，害怕失去恰克图贸易的巨额利润，不得不有所收敛。此后的40余年间，未再派船直接来华贸易，而是采取了“托外国船只带货到广贸易”^②的办法进行对华间接的海路贸易。

“俄美公司”成立后的前20年中共获得“80271只海獭和1493626只海狗”，同一时期，公司还“获得价值16376695.95卢布的毛皮、海象牙等，即平均每年818835卢布”^③。这些货的大部分由俄商经黑龙江河口运回俄国，再从那里经由恰克图运往中国销售。由于无计划的滥捕滥杀，毛皮资源的枯竭已相当严重了。1841-1861年的20年间，“俄美公司”捕获的海獭只有25602只，海狗皮338604张，不足1797-1818年间的1/3。^④毛皮货源的减少，迫使俄国政府不得不放松了禁止“俄美公司”从国外进口海獭、水獭和海狗皮的禁令。“俄美公司”用本身在北美洲捕获的、进口的及从当地土著居民手中廉价收购的皮货到恰克图换取中国茶叶。此时，恰克图的贸易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向畅销的毛皮被呢绒和其他纺织品所取代。尽管如此，“俄美公司”还是将毛皮运往恰克图，以换取更多的茶叶。“到五十年代，公司的主要收入已不靠毛皮，而是靠茶叶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大清国理藩院致俄国枢密院函》（嘉庆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② 魏源：《海国图志》，第83卷。

③ 奥孔：《俄美公司》，第52页。

④ 奥孔：《俄美公司》，第215页。

贸易”。^①

对“俄美公司”说来，经营恰克图贸易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有利可图的茶叶贸易使恰克图的俄国茶商的商业资本极大地扩充，茶叶采购量也急剧增长。“俄美公司”因为运费较高，又不十分熟悉恰克图情况，无力与俄国陆路茶商竞争。为了利用茶叶贸易保持“俄美公司”的收入，便再次试图从海路进口中国的茶叶。1848年和1850年“俄美公司”的《缅希科夫公爵号》两次携货进入上海港，虽未能正式打开对华海路贸易的渠道，但已造成了事实上的海路茶叶贸易，如同此时期新疆与俄国的直接贸易一样，处在明禁暗通的状态之中。致使“俄美公司”经营的海路茶逐年增加，已达可观程度。“从五十年代起，‘俄美公司’平均每年从海路运进8000普特茶叶，相当于俄国进口中国茶叶总量的30%。”（原文如此，疑为3%之误）^②获取了可观的利润。“1857年至1861年间，公司平均每年总收入为952275年银卢布，其中421912卢布来自茶叶贸易”，占公司总收入的44%以上。“俄美公司”每年向国库上缴的茶叶进口关税就高达210658卢布。^③然而，由于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俄国政府只好将这些税款作为新贷款提供给公司。“俄美公司”的运输能力有限，为了获取中国更多的茶叶，有时不得不租用外国的商船。毋庸讳言，十九世纪中叶，“俄美公司”在整个中俄茶叶贸易中已占有了相当地位。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政府利用“俄美公司”作为试探对华海路贸易的急先锋，不仅与“俄美公司”所处的地位有关，也与

① 奥孔：《俄美公司》，第219页。

② 奥孔：《俄美公司》，第221页。

③ 奥孔：《俄美公司》，第221页。

俄国整个对华政策相吻合。正如苏联学者奥孔所说：“俄美公司进行海路茶叶贸易，其目的有两个：其一是利用公司为沙俄扩张进行伪装，另一是为了完成政府的这些任务，而使公司处于优于其竞争者的地位”。^①

然而，由于“俄美公司”在经营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毛皮货源逐渐枯竭，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强有力竞争，船队运输力量之薄弱，以及管理不善等原因，“到 1867 年，公司所欠税款已超过 70 万卢布”。^②俄国政府逐渐丧失了对“俄美公司”的兴趣，认为他的存在已无任何用处。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俄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出卖北美领地，前前后后经过十余年，终于在 1867 年以 720 万美无的价格将“俄美公司”及其所属北美领地一并卖给了美国。至此，俄国惨淡经营了 68 年的“俄美公司”便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① 奥孔：《俄美公司》，第 221 页。

② 奥孔：《俄美公司》，第 221 页。

第四章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 茶叶贸易

第一节 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 化对中俄茶叶贸易的影响

一、中俄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缔结

十九世纪初，清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腐败，封建官僚地主奢侈腐化，土地兼并剧烈，剥削加重，社会危机日益加重。1840年，蓄谋已久的英国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积弱的清政府在“船坚炮利”的洋人面前吃了败仗。1842年8月29日被迫与之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接着，在英国侵略者的压力下，1843年7月和10月又被迫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与此同时，美国和法国乘火打劫，分别于1844年7月和10月逼签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这些条约的签定使古老的封建的中国开始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此时的俄国，虽然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但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也开始了工业革命，蒸汽发动机逐渐代替了手工操作。1815年，俄国第一艘汽船出现在涅瓦河上，三十年代开始建设铁路。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的工人数增长了2倍以上，达60—70万人；对外贸易额增长了3倍

多。商品生产的初步发展，使其产生了开辟更多国外市场的欲望。出于经济的、历史的、地缘的考虑，俄国人首选的目标自然是中国。鸦片战争后，英国棉毛织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大量倾销，以及海路垄断中国的茶叶贸易，排挤俄国由恰克图陆路贩运到欧洲大陆的中国商队茶，也进一步刺激了俄国开辟中国市场的欲望。从四十年代后半期起，俄国政府一面派遣“俄美公司”的船只闯入上海港，进行海路贸易的再试探，一面采取外交手段，迫使中国政府正式开放我国西北地区对俄的陆路贸易。

1847年7月至1850年1月期间，俄国政府先后3次向清政府提出在新疆之伊犁、塔尔巴哈尔和喀什喀尔三处通商的要求，均被清政府以“所请与例不符”，加以拒绝。此间，清政府理藩院在给俄国枢密院的照会里明确说明了一百多年来恰克图贸易对两国的好处，并指出如果在西北地区再开辟贸易点，不仅那里人烟稀少，交易量不会大，而且还将影响恰克图贸易。当然，更主要的是清政府出于对边境安宁的考虑。但在俄国政府的一再压力之下，清政府害怕“径行拒绝，致激事端”，被迫同意了俄国提出的部分要求，开放了伊犁和塔城两处为通商口岸。1851年8月，中俄签订了《伊塔通商章程》，西北边境的大门被打开了，从而结束了以往只在恰克图一处互市贸易的局面，中俄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开始了质的变化。

俄国政府在加紧压迫中国政府开放西北边境的同时，亦在极力迫使清政府准其海路贸易。前已述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均已依据《南京条约》等的有关条款规定进入上海、广州、厦门、宁波、福州贸易，致使俄国经由恰克图陆路进行的对华呢绒出口和茶叶进口贸易受到打击。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和1850年（道光三十年）“俄美公司”的《緬

希科夫公爵号》两次进入上海，试探开辟对华海路贸易的可能性，均被清政府地方官以“事关通商大局，必应率由旧章”加以制止。1853年（咸丰三年），俄国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乘《巴拉达号》驶入广州和上海，企图取得海路贸易特权。为此，俄国枢密院在致清政府理藩院的咨文里提出：“伏思今之西洋各国贸易，尚可许进海口。况敝国亦系和好有年，诚意相交，自应较西洋各国更使有益。是以敝国业经口许普提雅廷等，如有事件，即可进贵国海口。更有请者，日后如敝国人等，因贸易欲进海口时，贵国官员亦必允从”。^①再次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同年7月，清政府理藩院在致俄国枢密院的咨文里明白指出：“今贵国通商处所，已于恰克图外，添设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货物已极流通。若再添设海口，不但内地商贩势难分售，即贵国费用益多，获利转少。此事既无裨益，何必徒劳跋涉，转令贵国船只行道往来也。总之，通商一事，惟期彼此两便。”^②

1856年爆发了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预感到时机到来，遂以中立、调停为名，多次派战舰闯入天津、上海。随着中国在战争中的节节失利，清政府害怕美、俄两国与英法沆瀣一气，于己不利。1858年4月8日（咸丰八年）咸丰帝颁发谕旨：“如先解散，俄、美两酋不助逆，则英法之势已孤，再观其要求何事，从长计议。”^③此时太平天国已定都南京5年，并已克服天京内讧造成的不良影响，太平天国革命再次进入高潮，全国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国外的巨大压

①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上册，第76页。

②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上册，第77页。

③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中册，第423页。

力之下，清政府权衡利弊，决定改变其初衷，表示待俄国帮助“了结广州之事”，证明“是尔此来，实于中国有益，彼此奏请海口通商，大皇帝必能欢喜允准”^①1858年5月20日大沽炮台失陷，清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直隶总督谭廷襄多次出面请求普提雅廷居间“调停”。5月30日，普提雅廷与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等人会谈，6月13日俄国捷足先登，抢在英法之前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第三条规定：“此后除两国由旱路于从前所定边疆通商外，今议准由海路之上海、宁波、福州府、厦门、广州府、台湾府、琼州府等七处海口通商。若别国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②至此，俄国终于取得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对华海路贸易权。这样，俄国不仅垄断着一条令西方羡慕不已的陆路商道，而且可以与西方殖民者同享海路贸易的一切特权。

在打开了中国西部边疆大门以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等人加紧了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他通过武装移民等手段，实际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大片中国土地。在既成事实面前，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京师震动。穆拉维约夫赶紧利用这个机会会晤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从5月23日开始，5月28日奕山在事先未请示清政府的情况下，擅自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不平等的《璦琿和约》。通过该约，俄国不仅割占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还取得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航行权及沿两江的贸易权。条约第二条规定“两国所属之人互相取和，乌苏里、黑

① 《清文宗实录》，第248卷第26—27页。

②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中册第531页。

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换，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①穆拉维约夫鉴于俄国移民的增加，该地区贸易的发展，要求援伊犁、塔城两处之例，免税贸易。奕山害怕“若不应允，诚恐因此不睦，致启衅端，是以勉从其议。”^②翌年奕山根据《璦琿和约》第2条规定，拟定了《黑龙江通商条规十四条》，内容如下：

1. 通商后两国卖货俱不征税。
2. 彼此通商总须以货换货，一秉至公，毋许赊欠。。如有赊欠，官不经理。
3. 行使钱票，无论真假，官不经理。
4. 江东各屯，彼此不得骚扰，一切交换货物，必须官为照料，不得私行交换，以免争端。
5. 货物如有遗失，各国严密寻访，拿获时治罪，不赔货物。
6. 两国贸易彼此不准携带违禁货物，违者各国自行照例办理，所有交换货物，务须公平交易，毋得以少换多，致启争竞。
7. 俄国往来人等，务由江东行走，即冬令亦须由江路行走，不可越过西岸，免致滋生事端。
8. 贸易诸色人等，开市时齐至市场贸易，散市时即各回本处住宿。违者处治。
9. 贸易市场有争斗事故，系本土之人，弹压官立即鞭责惩办；系夷人交夷官约束。如有斗殴受伤等事，各国之人交各国自行照例定罪完结。倘有致毙人命者，将行凶之犯，立时拿

①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6。

②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中册第659页。

解衙门，各按国例定罪办理，勿令疏纵。

10. 在贸易市场，各货物均凭两相愿意对讲价值易换，散市后不准反复增减更换以免狡赖。

11. 两国和好一百数十余年，现在江之左岸，准俄国安设屯堡，居住人户，仅有一江之隔，所有马匹牲畜易于逸失，如有逸失据报时，务各饬属一体寻找，获时报官，给还原主。如有不报隐藏者，查出罚马一匹完结。毋庸交踪寻找，以免施累。其余砍伐木植柴薪细故，应随时两相酌中办理。

12. 来往船只务须在卡伦报明，设有遗失，以便查照。

13. 本国设有官员，专司通商事务，俄国亦须设官，以便稽查弹压。

14. 两国一切闲杂人等除开市买卖易换货物外，不准私自往各屯易换物件及往来游玩。严饬各卡伦不时查禁，免生事端。^①

该条约虽未经两国政府批准而成为正式条约，但它确定了中俄黑龙江边境贸易的具体原则。这样，东北边疆也对俄国开放了。

1860年11月14日签订的中俄《北京续增条约》不仅重申了《璦琿和约》第二条之规定，载明中俄东部边境交界各处“准许两国所属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②而且又增开了西部地区喀什噶尔为通商口岸，从而了却了自四十年代以来俄国一再提出的增开西北三处为通商口岸的心愿。以此，南疆也对俄开放了。必须指出，早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来北京的

①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中册，第750-751页。

② 步平、郭蕴深等：《东北国际约章汇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商队贸易已经停止，中俄贸易几乎全部集中在恰克图。但是，《北京续增条约》第五条却规定：“俄国商人，除照旧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到京，经过之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①这又为俄商深入中国内地张家口作了铺垫。《北京续增条约》“是俄国的一次重大外交收获”^②，它极大地“扩大了商业交易范围，开辟了在中国内地产茶地区组织茶叶市场的道路”^③

1861年，俄国驻京公使巴留捷克依据《北京续增条约》第五条，提出在“张家口设立行栈”的要求，被清政府拒绝。恭亲王奕訢指出：“张家口为五方杂处之地，距京不及四百里，若准俄商在彼设立行栈，势必致俄人日聚日众，历久恐或酿成心腹之患”。^④经过十数次商议，清政府作出让步，1862年3月14日订立《陆路通商章程》21款，其中第4款同意“俄商路经张家口，按照运津之货总数，酌留十分之二于口销售。……该口不得设立行栈”。^⑤1865年俄国借口改订条约，再次要求张家口开埠，经过4年反复交涉，清政府再次作出让步，1869年4月27日订立《改订陆路通商章程》22款。主要内容如下：

第二款 俄商准许前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及该官所

① 步平、郭蕴深等：《东北国际约章汇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② 奎斯特德：《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中译本第268页。

③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7-1875年）》，第84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33-36页。

⑤ 《中外约章汇编·中俄部分》。

属之各盟贸易，亦不纳税。

第四款 俄商由恰运俄国货物，路经张家口，按照运津之货总数，任听酌留若干於口销售。……惟该口无庸设立领事官以及行栈。

第十款 俄商在他口贩买土货，经津回国，不留在彼销售，如在他口全税交完，有单可凭，至此不再纳税，以免重征。

第十二款 俄商在津贩买复进口土货，由陆路回国，如在原口完清全税，於一年限内出津运往俄国，一切与章程相符，不再重征，并将暂存天津复进口半税给还存票，沿途不得销售。领取执照，一切按照第十款办理。^①

显而易见，《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与7年前的《陆路通商章程》相比较，俄国又取得了新的特权。最明显的是第四款，将“酌留十分之二於口销售”改为“任听酌留若干於口销售”。这就是说，俄国经恰克图运往中国开放的商埠天津的货物可以在张家口等地随商情的变化任意销售。清政府在商务上作出重大让步的同时，对于边界的安宁仍然十分注重，始终不允许俄国人在张家口设立领事和开设行栈。恭亲王奕訢为此曾上奏折陈述道：“俄患不在商务而在边界，商务所在尚可通融，边界所关尤应杜绝。必有益於该国者，可允则允，庶有益於中国者，可争则争。如张家口开设行栈，势必屯聚货物，麇集多人，隐患须防，不可不慎。臣等因该使臣再三辩论，不惟不准其删去此款内‘不得设立行栈’六字，并于其上添写‘不得设立领事官’，比较旧章加密者也。至张家口前已准其销售货物，多寡似不可

^① 《同治条约》，卷14，第5-7页。

拘，故旧章‘酌留十分之二，今改为‘酌留若干，以便商情。”^①恭亲王奕訢的言论正表明了清政府的一贯立场。

在前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俄国先后迫使清政府订立的如上条约不仅使东起黑龙江，西到新疆的万里北部边疆全部对俄国开放了，而且俄商可以在沿海口岸和内地一些城市，特别是产茶区活动，贸易范围大大扩充了，茶叶贸易额直线上升。此后，中俄之间的贸易关系也与中国和西方列强的贸易关系一样，体现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对外经贸交往中的一切特点，即竞争的不平等性。

二、海路茶叶贸易的出现及发展

俄国通过 1858 年 6 月 13 日的中俄《天津条约》取得海路贸易权后，曾幻想海路进口中国大量茶叶，从而分享英国的一部分利益。然而，一旦实现了这种宿愿，俄国政府才发现力不从心。首先，俄国的航海业极不发达，没有自己的商船队，无力开辟中俄间，特别是欧俄与中国间的直达海路贸易。1858 年，“这一年共有 1440 艘外国商船到过上海，其中英国船 696 艘，美国船 236 艘，德国船 180 艘，荷兰船 117 艘，而俄国船一艘也没有”。^②最初 10 年，海路贸易曾借助“俄美公司”的船只，无论商船数还是贸易额均极其有限。1867 年俄国的北美殖民地出售给美国后，“俄美公司”解体，海路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868--1870 年间只有俄属太平洋各港口租用外国船只与中国进行少量的贸易，从中国港口运出的多是茶叶，据中国学者何炳贤统计，中国输出到俄国的商品价值为（海关两）：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67，第 23—24 页。

②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 287 页。

1868年6000, 1869年7000, 1870年7000。^①不足中俄全部贸易额的1%。

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 商船不必再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 可直接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 直达俄国黑海地区的重镇敖得萨和巴统, 时间也由原来的4个月, 减少到1个半月左右。更主要的是, 海路运费低廉, 经此路运往俄国的茶叶运费要比陆路便宜7-8倍。^②此线开辟成功, 俄国可以不必再高价由伦敦市场购买中国茶叶。美好的前景使俄国对华海路贸易的兴趣再度高涨起来。1871年“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乞哈耶夫号》首先经吴淞口驶进汉口, 满载俄商由汉口地区采购的茶叶经地中海返回敖得萨, 从而开辟了中国与欧俄间的直接海路茶叶贸易。第二年, 该船再度驶达汉口, 同来的还有该公司的《俄罗斯号》。^③

由于俄国海运公司的船只有限, 运力严重不足, 再加上俄国可供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不多, 该公司经营的直接海路茶叶贸易在整个中俄茶叶贸易中所占比例仍然不大。欧俄所需的中国茶叶, 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雇用西方商船, 或者照旧在伦敦市场购买英国贩运的中国茶叶。整个七十年代, 俄国一直与土耳其争夺黑海出海口, 形势异常紧张, 亦影响了欧俄与中国间的海路茶叶贸易。1877年, 俄土战争爆发。土耳其在英、法等国支持下封锁了黑海出海口, 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经营的对华茶叶

① 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 商务印书馆, 民国26年版, 第397页。

② 安·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 中译本第8页。

③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 圣彼得堡1882年俄文版。

贸易被迫停止。是年，黑海口岸没有进口中国茶叶；翌年，俄国租用外国商船也只进口了 400 多担华茶。1871—1880 年经放得萨海路输往俄国的华茶总数如下（担）：

1871 年	14880
1872 年	35125
1873 年	33204
1874 年	32823
1875 年	53099
1876 年	38428
1877 年	—
1878 年	479
1879 年	13648
1880 年	41218 ^①

俄属太平洋各港口与中国的海路贸易早期主要是通过“俄美分司”。1867 年“俄美公司”停办后，有限的海路贸易是通过租用外国商船进行的。1873 年，俄国远东“成立了一个拥有 2 艘海轮和 20 艘行驶于黑龙江的内河轮船的俄国公司”。^②当年 8 月，该公司的《尼古拉号》海轮驶进汉口港，12 月满载茶叶由汉口出发，沿长江而下，出吴淞口，由海路运回到黑龙江口。不久，该公司的另一艘海轮也开进汉口载运茶叶。这个俄国公司的经营者们曾乐观地认为：“每年 80000 箱茶叶要靠驼商队运往‘东部俄国’，也就是西伯利亚和阿穆尔地区，运输的时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 2 册第 1283—1284 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 2 册第 1286 页。

间平均超过 12 个月，如果使用轮船，即可缩减为 70 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一箱茶叶省出 6 个卢布（3 两或 18 先令）的运费”。^①公司开业的前两年，经黑龙江向俄国远东转运的茶叶每年大约 15 万普特；到七十年代中叶，每年运茶数便减至 1.5 万普特左右。^②以后略有增加，但数额不大。主要原因是黑龙江的航行期过短，每年只有 6 个月，再加经营不善，该线路的海路贸易日渐萎缩。

1874—1880 年经海路输往俄国远东地区的茶叶数为（担）^③：

1874 年	3659
1875 年	6053
1876 年	7193
1877 年	4385
1878 年	5440
1879 年	10964
1880 年	19238

1879 年，在西方的干预之下，俄土缔结了《君士坦丁堡条约》，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从而为俄国对华海路贸易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是时，俄国的航海业也较战前有所发展。但是，当年由于受俄土战争影响，由巴统和敖得萨进

① 姚贤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 2 册第 1285 页。

② 安·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 年）》，第 7 页。

③ 姚贤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 2 册第 1283—1284 页。

入中国沿海港口的船只也只有 12 艘，总吨位数为 12228 吨。^① 1880 年，俄国的“志愿船队”取代了战前的“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开始定期航行于巴统一敖得萨—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几年以后，开始“定期前往广州和上海，并从这些港口带走输往欧俄的茶叶和其它货物”。^② 1891-1895 年间俄国商船数及总吨位数均较八十年代初有明显增长，每年可达 10 万吨以上，为八十年代初的十倍。统计如下^③：

年份	船只数	总吨位数
1891	76	98221
1892	84	111570
1893	101	132613
1894	92	138472
1895	90	130218

这一时期与海路贸易的最初阶段一样，茶叶是输往欧俄的主要商品。据中国海关统计，1881-1895 年间经敖得萨海路输往俄国的华茶数为(担)^④：

1881 年	56257	1882 年	79729
1883 年	85418	1884 年	88679

① 杨端六、侯培厚：《六十五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统计》，1935年上海版，第 137 页。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 282 页。

③ 杨端六、侯培厚：《六十五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统计》，第 282 页。

④ 姚贤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 2 册第 1284 页。

1885年	47969	1886年	90426
1887年	93467	1888年	132826
1889年	137486	1890年	174130
1891年	189026	1892年	117255
1893年	164029	1894年	169209
1895年	206903		

到九十年代初，由中国输往放得萨(包括巴统)的中国商品总值每年可达 1300-1400 万卢布。^①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俄国每年经恰克图的 1500 万卢布的进口额。1891 年，海路贸易额首次超过了陆路贸易额，这还不包括俄属太平洋各口岸。如果换算成海关两，每年大约在 400-500 万之间，从下列比较统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海关两）^②：

年 份	海 路	陆 路
1890 年	4328734	4527848
1891 年	6695251	4433807
1892 年	2980621	4062629
1893 年	4288405	5095508
1894 年	4765732	6257452
1895 年	7233100	8369541

经海路输入到俄国的中国茶叶来自产茶区汉口、九江和福州，也有经天津和上海关转出口的中国茶，其中以汉口为最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82页。

② 根据杨端六、侯培厚：《六十五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统计》整理。

多，其次是福州。上海关 1882-1895 年间转口出口到敖得萨的茶叶不多，价值也有限（海关两）^①：

1882 年	66983	1887 年	103812
1891 年	85978	1894 年	28236
1895 年	191847		

同一时期，福州输往敖得萨的茶叶价值为（海关两）^②：

1882 年	39973	1887 年	38931
1891 年	31008	1894 年	13820
1895 年	13345		

不难看出，福州关直接输往俄国的中国商品较上海关为少。当然，最多的还是汉口输往敖得萨的中国茶叶（海关两）^③：

1882 年	839368	1887 年	1170771
1891 年	5660547	1894 年	3291089
1895 年	4143650		

与此同时，海路输往俄属太平洋各口岸的商品有明显增加。1885-1895 年间的价值如下（海关两）^④：

1885 年	467568	1890 年	616774
1891 年	919690	1892 年	1025161
1893 年	1250729	1894 年	1369041
1895 年	2761260		

① 根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整理。

② 根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整理。

③ 根据中国海关总税公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整理。

④ 根据杨端六、候培厚：《六十五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统计》，第 103 页整理。

上表不难看出，10年间输往俄属太平洋各口岸的商品增长了5倍多，输出品中除茶叶外，还有丝织品和各种棉织品，但比重很小，占大宗的还是茶叶。就数量而言，15年间增长了3倍。1881-1894年间中国输往俄属太平洋各口岸的茶叶数为（担）①：

1881年	29472	1882年	32585
1883年	28857	1884年	45050
1885年	38955	1886年	63603
1887年	69272	1888年	79026
1889年	38300	1890年	40168
1891年	67480	1892年	50855
1893年	73115	1894年	87518

八十年代以后，中俄海路茶叶贸易进入了发展时期。

第二节 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衰落

一、买卖城中国商号的倒闭

1851年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签订后，恰克图市场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从1853年开始，茶叶交易额急剧下降。七十年代末与五十年代初相比，减少了3/4。

1851-1885年间恰克图贸易日趋衰落状况如下（卢布）：

1851-1855年间每年平均	9272000
1856-1860年间每年平均	8306000
1861-1865年间每年平均	5585000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84页。

1866-1870 年间每年平均	4635000
1871-1875 年间每年平均	3984000
1876-1880 年间每年平均	2487000
1881-1885 年间每年平均	2126000 ^①

茶叶贸易的衰落使中国商号纷纷倒闭。1863年前买卖城有100多家山西茶庄，到1868年就仅存4家了。^②足已看出其衰落速度之快，程度之大。恰克图茶叶贸易衰落之时，恰克图的华商曾试图向西部分流，即到新疆一带与俄商交易。但自六十年代初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农奴主叛乱和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人侵后，“商民四散奔逃，无所归依。”同治六年（1867年）绥远城将军裕瑞、归化城副都统桂成曾联名上奏，请求允许“由恰克图假俄国之道通商”。同治七年（1868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允许“西商领票运茶前往，先行试办”。^③只因其地叛乱日甚一日及其它原因种种，亦未成功。

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衰落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是由中国社会内部及外部世界诸多原因决定的。就其内部原因而论：

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度长期延续的国家。明清时期虽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极其微弱，发展缓慢。到清朝中叶，传统的“以农为本”的思想仍占支配地位。雍正帝曾一再强调：“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④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清政府

① 根据刘逸民：《中俄早期贸易考》第211-212页整理，载《燕京学报》25期，1939年。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300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恭亲王奕訢等奏为归化城商民赴恰克图贸易呈交票规银拟酌减折》（夷务清本）

④ 《清世宗实录》，卷57。

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官僚地主阶级统治着整个社会，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微。在这种氛围之下，即使很富有的山西票商的资本，也始终没有超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范围。获利的商人不愿将利润继续用于商业活动，更不想投资于生产部门，转化为最初的工业资本，而多半是用于购买土地，即所谓“以末致财，以本守之”。^①他们集商人、高利贷者、地主于一身。这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严重束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商人的竞争力。

清政府不把恰克图贸易视为发展商品经济，增加国库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只是看作对外国的一种恩赐。乾隆帝曾对英国使臣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②当然这也同样适用于俄国，即开放恰克图贸易是因为“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③所以，只要俄国破坏了边境的安宁，或出现其他对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不利的纠纷，清政府便以闭关相加，以示惩罚，根本不考虑给自己带来经济损失。

清政府虽然不在恰克图设关抽税，但中国茶商都要负担沉重的赋税。“茶叶每一移动皆须纳捐，不仅出省有捐，即在同一省内亦处处有捐，……自产地运至汉口，一担茶叶须纳二两半以上”。^④清政府明文规定每担茶叶的出口税银为二两半，除此之外商人还要交纳部票税和厘金等。据《俄罗斯互市本末》记

① 司马迁：《史记》，卷129页《货殖列传》。

② 《熙朝纪政》，卷60《记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③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9页。

④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中译本下册第12页。

载，嘉庆“四年（1799年）奏定贸易商人支领部票章程，嗣后察哈尔都统、归化城将军、多伦诺尔同知衙门给票后，即知照所往地方大臣官员衙门，不准听其指称。未及支领部票，由别衙门支领路引为凭贸易，一经查出，照无部票例治罪”。^①清政府规定：“每茶三百箱，作票一张，收规银五十两”。^②无票进行贸易者，则要“枷号两个月，期满笞四十，逐回原省，将货物一半入官”。^③随着清朝统治危急的加深，又对茶商征收很重的厘金。“咸丰十年（1860年）因军饷支绌，奏准每商票一张，在察哈尔都统衙门，指输厘金六十两，湊拨察哈尔驻防常年兵响。”^④经过层层沉重税金的盘剥，大大增加了商人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成本。十分熟悉中国情况的俄商被内地产茶区廉价的茶叶所吸引，又可以依据不平等条约获取的特权直接深入到中国内地，自然使俄商逐渐失去了对在恰克图采购茶叶的兴趣。当俄国与西方殖民势力一起伸入到中国内地时，清政府明明知道。“利为俄人所夺”，亦无力挽回局面。

再从外部原因分析：

《伊塔通商章程》签订后，俄国商品可以免税进入伊犁和塔尔巴哈等地，这里又离俄国人口密度大、经济较发展的中亚和俄国欧洲部分近，有利于获取更大的利润。俄商在觊觎中国内地的同时，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中国西部地区。七十年代末，俄国政府又迫使清政府开放了嘉峪关通往俄国西伯利亚的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7第11页。

② 托津等撰：《大清会典事例》，第746卷。

③ 托津等撰：《大清会典事例》第983卷。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恭亲王奕訢等奏拟请在恰克图经营商务鼓励西北万商云集则俄之耽视张家口贸易即可釜底抽薪折》（夷务清本）

新商路。这些都对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起了分流作用。

恰克图互市的早期和中期，双方以货易货，贸易额基本相等。由于俄国需要的中国茶叶与日剧增，而又没有更多受中国商人欢迎的硬头俄国货拿来交换。斯拉德科夫斯基写道：“1854年恰克图的58家商号中，只有7家莫斯科商号和14家来自其它各中央俄罗斯城市的商号，其余37家的商号代表着西伯利亚各城市：恰克图11家、伊尔库茨克10家、秋明14家、色楞格斯克3家等。……这种情况使得基本上是在俄国中部各省生产的工业品向恰克图的输出量缩减。结果，俄方开始感到货物不足，按其价值难以同中国商人结算，这就使易货贸易的基础发生了动摇”。^①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俄国的工业品难于同西方国家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再加上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低下，自然使俄国商品难以在中国畅销。在这种情况下，俄商只好偷偷地用黄金、白银结算，或是将贵重金属制成腊台等简单商品，混于俄国其它商品中作为偿付手段。俄国政府虽然三令五申地严加禁止，但收效甚微。1854年起俄国政府开始部分允许使用货币和贵金属结算。1861年完全取消了限制，正式允许俄国商人使用金银和各种硬货币购买中国的茶叶。俄商有了偿付手段，又为中国内地廉价的茶叶以及西方列强在中国享受的种种特权所吸引，纷纷离开恰克图，直接深入到中国内地产茶区采购、制造、贩运茶叶。一旦他们在内地尝到了甜头，自然就义无反顾了。

再次，俄国对华海路贸易的发生和发展，也对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起了分流作用。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67-268页。

以根本上说，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衰落是由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所决定的。它的衰落对中俄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产生巨大影响。不言而喻，以往的繁荣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尽管是俄国获利更大，毕竟还是双方受益。而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衰落首先遭受损失的是中国老百姓和华人茶商。俄商在恰克图的采购量骤减，使华商商号纷纷倒闭，张家口一带的商业也损失惨重。不仅如此，贩运途中的商人及以运输茶叶为业者、产茶区的中国茶商、茶农均受到沉重打击。湖北著名的产茶区羊楼洞曾有几十家工厂生产砖茶，销往恰克图。俄商离开恰克图来到汉口等地自行设立茶厂后，华人开设的小手工作坊纷纷倒闭了。

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衰落给清政府的税收也带来了巨大损失。清政府虽然不在恰克图设关收税，只在运输途中征收重税。华商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减少，自然清政府的税收受到影响。华商茶叶由产地运到恰克图，每担纳税银 5 两，还有票税、厘金等其它杂税。而俄商在中国产茶区采购、贩运的茶叶所纳出口税大大低于华商。1860 年天津开埠初期规定，俄商贩运到天津的茶叶每担要在汉口交纳出口税 2.5 两，到天津后，每担还要纳 1.25 两的子口税，合计 3.75 两，已经明显低于华商。可是，俄国政府仍不满足，在俄国政府的一再要求之下，1866 清政府取消了子口税。这样，同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华商的税金是俄商的 2 倍以上。如果以七十年代恰克图每年出口的十几万担茶叶计算，仅此一项中国政府就损失了关税 30 余万两白银。《海关报告》也曾明确记载道：“在这项贸易上中国人不能和俄国人竞争，因为转运恰克图的过程中，俄国人

持有的茶叶上税少，中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多”。^①这种怪现象只有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才能出现。

恰恰相反，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衰落却给俄国政府和俄国商人带来了巨大利益。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出口茶叶的国家，而十九世纪以后，饮茶之风不仅在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盛行，同时在全俄国得到普及，俄国对茶叶的消费量与日剧增。俄商离开恰克图直接深入到中国内地产茶区后为打破英国对中国茶市及国际茶市的垄断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原属于英商的一部分利润流入到俄国人腰包。俄商直接深入内地产茶区从中国茶农手中收购茶叶，也使原属于华人茶商的大部分利润流入了俄国商人之手。不仅俄商在华所获利润成倍地增长，而且由于俄国政府在恰克图征收人口关税，虽然华商运到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大为减少，俄商经恰克图运回俄国的茶叶却有增无减，所以俄国的关税收入不是减少，而是大大地增加了。

恰克图边关互市的衰落是历史的产物，它对中俄经济和贸易的交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恰克图转口茶叶贸易的增长

恰克图茶叶贸易衰落之际，直接进入中国内地产茶区的俄商即开始自行将茶叶经恰克图运回俄国。发展速度极快，数量之大，很快达到并超过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时的最高水平。苏联学者认为：“《彼得堡条约》（即1881年2月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引者）签订后，恰克图贸易大大扩张，并在以后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300页。

的全部岁月中始终相当稳定”。^①从表面上看，俄国通过恰克图进口的中国茶叶不但未减少，而且不断地增加。然而，这与十九世纪中叶前的恰克图边关互市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昔日繁华的市场和热烈的交易场面早已不见了，大部分华商撤离了恰克图。对于俄国来说，恰克图的主要作用是进口中国茶叶的海关，而且这些茶叶大部分是俄商由中国内地产茶区自行采购、加工、贩运回俄国的。运输路线也不同以前。天津开埠前，华商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一直使用传统的汉口——樊城——太原——恰克图陆路一线。俄商深入中国内地产茶区，特别是天津开埠后，俄商将茶叶由汉口装船，下长江，过吴淞口，海路运至天津，然后再陆路经张家口运往恰克图，即汉口——天津——张家口——恰克图水陆联运一线。后者不仅比传统的陆路节省了大量时间，而且运费也低廉。七十年代以后，经天津一线进入恰克图的茶叶逐渐赶上，并很快超过樊城一线进入恰克图的茶叶，完全占据了主要地位。

1871-1894年经上述两线进入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分别为(担)^②：

年份	经恰克图陆路(天津)	经樊城陆路
1871年	100221	202184
1872年	132907	148964
1873年	148028	192311
1874年	101717	60246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69页。

② 姚贤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283-1284页。

1875年	197796	147019
1876年	198563	183363
1877年	214229	128520
1878年	275400	55148
1879年	400004	92246
1880年	296869	107636
1881年	294985	127295
1882年	274600	42182
1883年	290203	34612
1884年	314605	55394
1885年	345391	164363
1886年	445148	169680
1887年	444637	174922
1888年	463325	245433
1889年	360708	59008
1890年	371052	56843
1891年	379902	53788
1892年	367708	35659
1893年	446600	53541
1894年	500561	76877

就其价值而言，俄国每年经恰克图进口的茶叶在 1500 万卢布左右，约占俄国从该地区进口总值的 94%。如，1885 年恰克图的总进口值为 1529.6 万卢布，其中茶叶为 1433.9 万卢布，占 93.9%。^①按中国海关统计的数字算，1881—1894 年经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69页。

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货物价值为（千海关两）：

1881年	3183	1882年	3286
1883年	3665	1884年	3739
1885年	3438	1886年	4948
1887年	5704	1888年	4699
1889年	3961	1890年	4527
1891年	4433	1892年	4062
1893年	5095	1894年	6257
1895年	8369		①

经恰克图进口的中国茶叶中，有3/4左右是俄国商人自行运入的。实际上这部分茶叶只能称之为恰克图的转口贸易。

俄国政府之所以一直保持着进口中国茶叶的地位，主要在于它曾给俄国国库及俄国商人带来巨大利益，并继续给俄国带来巨大好处。早在1862年俄国政府就自行降低了陆路茶叶的进口关税。每俄磅绿茶陆路进口较海路进口少征15戈比，而红茶和砖茶则少征23.5戈比的税。八十年代后，中国政府再次降低了陆路茶叶的出口关税，使由广州至敖得萨的海路运费与由恰克图至莫斯科的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降到14.5戈比。②

客观上为恰克图转口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何况西伯利亚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茶市消费市场，每年仅消耗的砖茶就以数万担计。海路运费固然廉于陆路，然而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潮湿的海洋气候往往使茶叶失去原有的芳香，甚至

① 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版。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69页。

发霉变质。由恰克图进口的大陆茶，不仅在西伯利亚、中亚、欧俄，甚至在整个欧洲大陆受到欢迎，这便是俄国经恰克图大批进口中国茶叶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第三节 俄国茶商在中国内地 产茶区的商业活动

一、俄国茶商对汉口茶市的经营和垄断

十九世纪中叶，正当恰克图茶叶贸易进入鼎盛之际，为利所趋的俄国商人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一起深入到中国内地产茶区。据英国学者威廉·乌克斯记载：“约在1850年，俄商开始在汉口购茶。”^①汉口地区不仅本身是我国著名的产茶区，而且位于我国盛产茶叶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心，与我国盛产茶叶的其它省份，如福建、江苏、安徽、四川有长江水路相通，交通十分便利。早在东汉时期，汉口地区就“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坂，下接江湖，夺财运货，懋迁有无。”^②南宋时期更是“百货所集，商贾云屯，南北两京，无过如此。”^③到了清代，已是“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屋似鳞。”^④

清中叶前，清政府一直不允许俄商深入到中国腹地。初入汉口地区，俄国商人的活动只是小规模，偶然性的，是未被

①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第54页。

② [东汉] 蔡邕：《蔡中郎外集·汉津赋》。

③ [南宋] 孙嘉淦：《南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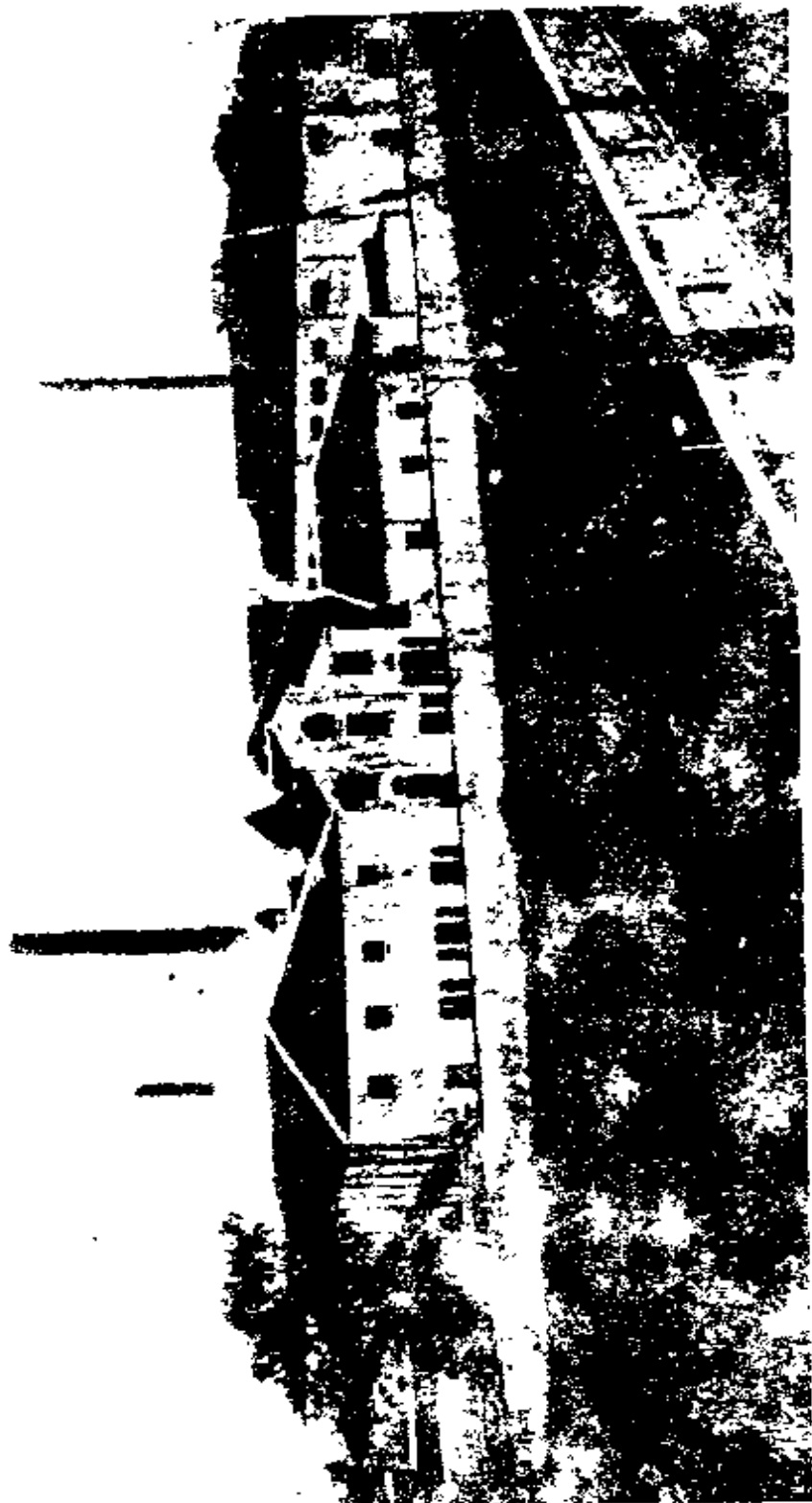
④ [清]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

清政府认可的非法交易。俄商也只在汉口地区的华商手中收购茶叶，谋取较恰克图交易更大的利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政府以中立、调停为名，抢在英、法之前于1858年6月13日诱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获取了在华种种特权。条约第12条规定：“日后大清国若有重待外国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处，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于1860年9月与英、法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开放了长江沿线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个重镇，西方殖民势力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内地。于是，俄国依照中俄《天津条约》的规定，进入了汉口地区。

进入汉口地区的俄国茶商已经不满足于在华商手中收购茶叶，借口“华人采茶，每有搀和之弊”，开始自行深入到湖北的羊楼、咸宁、崇阳等著名茶区，直接从茶农手中收购。致使中国茶商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为获取更大利润，俄商还自行加工制造砖茶。1863年，俄商在汉口开设了资本主义列强在华的第一家茶厂——顺丰砖茶厂。生产的砖茶全部销往俄国西伯利亚区地区。由于获利甚丰，1866年又开设了新泰砖茶厂，1871年再开设了规模更大的阜昌砖茶厂。俄商开设的砖茶厂由于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原料和劳动力价格低廉，再加销路顺畅，发展极快。顺丰、新泰两厂各雇工800——900人，资本金100万两左右，年产砖茶15万篓以上，合3000万磅。而阜昌砖茶厂雇工达2000人，资本金200万两，其规模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① 步平、郭蕴深等：《东北国际约章汇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0页。



十九世纪初，汉口地区的砖茶多是在恰克图经商的山西茶商开设的手工作坊生产的，有 70-80 家不等，雇用当地农民按季节压制砖茶。这类作坊多依附贩卖商业，资金少，手工操作，技术落后，效率低，经营方式也是临时性质的。在俄国茶商的有力竞争下，华商开设的小砖茶厂大半停业。自 1865 年后，汉口的砖茶生产逐渐成了俄商的一统天下。“在 1865 年有半数以上的经由天津发往恰克图的砖茶，是俄国人自己在湖北内地加工制造的。……1866 年以后，所有运来天津以便转往西伯利亚的砖茶，都是俄国人加工的”。①

1863-1881 年间俄商从汉口运出的砖茶数为（箱）：

1863 年	10500	1864 年	14700
1865 年	15700	1866 年	42963
1867 年	53007	1868 年	58150
1869 年	77003	1870 年	58744
1871 年	84120	1872 年	101655
1873 年	107664	1874 年	93386
1875 年	103322	1876 年	69626
1877 年	58115	1878 年	76292
1879 年	103669	1880 年	79923
1881 年	92891②		

这一数字与俄在此间开设的砖茶厂生产的砖茶数基本相等。

1871-1880 年间俄商砖茶厂在汉口地区制造的砖茶数为（箱）：

① 姚贤镐：《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

②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271页。

1871年	84120	1872年	101155
1873年	107664	1874年	39386 ^①
1875年	105953	1876年	70136
1877年	57331	1878年	77132
1879年	104925	1880年	89588 ^②

由此可见，俄国进口的巨额砖茶几乎全部为俄商汉口砖茶厂所生产。汉口茶市上的砖茶已完全由俄国商人所垄断了。

因经营得手，利润丰厚，到“1880年，俄国人在汉口已有6家茶厂，其中两家工厂共有6台蒸气锅炉135马力”。^③西方学者在评论俄商之所以能完全垄断汉口的砖茶贸易时指出：“（一）按同治元年（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俄商贩运复进口土货，由陆路回国，领有该领事官发给执照，沿途不再重征，便利众多。（二）洋商在华经营茶叶，势必雄厚资本，以为建设工厂及开办茶行之用。此外运输华茶销售，亦须长期垫款，方足有济。（三）陆路途程，因须熟悉，所操言语，尤应娴谙，始免债事。查当时中外商民，具有上述必须之资格者，除俄商外，可谓绝无。因之俄商对于此项贸易，遂得独享厚利焉。”^④当然，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俄商在华享有种种特权，这是华商所望尘莫及的。

除砖茶外，俄商在汉口地区采购的另一大宗是白毫茶，即普通的红、绿叶茶。

① 疑为93386之误，原文如此。

②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271页。

③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270页。

④ 姚贤镛：《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编第1313-1314页。

1868-1881 年间俄商在汉口采购的白毫茶数量如下^①：

年 份	数 量 (担)	价 值 (两)
1868 年	19097	430330
1869 年	60534	1274831
1870 年	37459	858354
1871 年	40629	985139
1872 年	70769	2084397
1873 年	79588	2313040
1874 年	无资料	
1875 年	59691	2154566
1876 年	59746	2028963
1877 年	53703	1264182
1878 年	58745	1459456
1879 年	98075	2289470
1880 年	192033	2489913
1881 年	171880	2172409

所有俄商在汉口加工、采购的砖茶、白毫茶，大部分是经汉口——天津——恰克图运回俄国的，但也有一部分经海路运往敖得萨、巴统和俄属太平洋各口岸的。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中国与欧俄间的海路运输由原来的120天缩减到50-60天，从而极大刺激了俄商海路贸易的兴趣。但因种种条件的限制，八十年代以前经海路输往俄国的茶叶只占少数。以砖茶为例，1876-1881年间汉口输往敖得萨和俄属太平洋各岸的数量为（担）^②：

①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258页。

②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274-275页。

年 份	输往敖得萨	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
1876年	-	1233
1877年	-	884
1878年	-	2228
1879年	-	3385
1880年	48	8985
1881年	22	10775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一小部分输往俄属太平洋各口岸外，几乎没有输往欧俄的砖茶。同一时期输往欧俄的白毫茶的比例要大于砖茶，这与欧俄居民的饮茶习惯有密切关系。1875—1881年输往欧俄的白毫茶数量为（担）：

1875年	29567	1876年	18097
1877年	13052	1878年	8033
1879年	13363	1880年	38753
1881年	34228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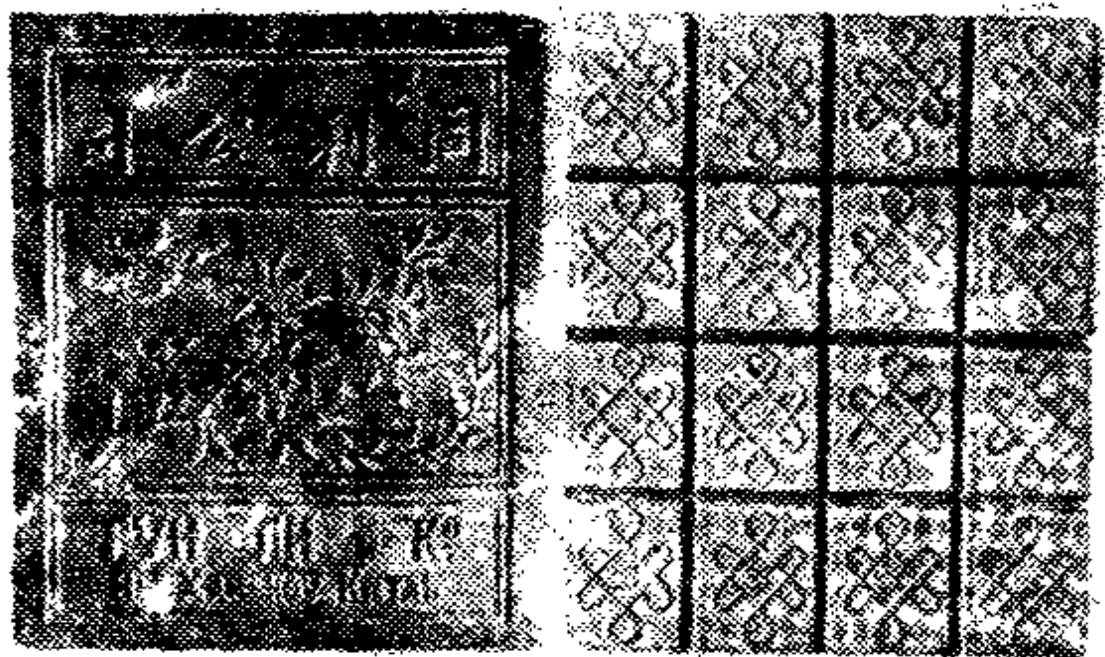
七十年代中期，俄国商人就基本垄断了汉口茶叶市场，汉口出口茶叶的绝大部分均输往俄国，据1877年中国海关公布的《贸易报告》统计：“1875年前，汉口共签发护运茶叶的外运子口税单193张，总值为799235海关两，其中俄商占179张，护运茶叶及砖茶的价值为727592海关两，占总值的91%”。^②

然而，俄商并不是一开始就垄断汉口茶市的。当俄商进入汉口茶市之初，英国人已经垄断了汉口茶市。俄商为了取代英

^①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258页。

^②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贸易报告》，1877年，第40页。

商的垄断地位，与之展开了激烈竞争。七十年代初，俄商开始加入汉口英商俱乐部，购买其股票，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经过 10 余年的活动，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俄国人已经占据了汉口英商俱乐部成员的 1/3，但俱乐部的常任理事俄国人则占了 1/2，其余一半则由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葡萄牙人充任。^①俄国商人不仅取得了与英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并进而控制了西方列强在汉口商务组织的领导权。



汉口的俄商砖茶厂生产的带汉俄两国文字的砖茶

俄国政府为了支持汉口俄商对英商的竞争，首先大大减少了经伦敦中介进口的中国茶叶，与此同时还在关税方面给予俄商以极大优惠。1862 年，俄国政府降低了陆路进口茶叶的关

^①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 255 页。

税。新的进口税规定：“绿花茶每俄磅 40 戈比，红茶 15 戈比。而经海路运来的绿花茶每俄磅课税 55 戈比，红茶、砖茶 38.5 戈比”。^①在俄国销量很大的红茶和砖茶经海路进口的关税要高于陆路关税 2.5 倍以上，再加上地缘之利，这就使汉口经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不仅长期保持很高的数额，而且不断发展。此外，俄商还利用熟悉汉口茶市，并有一套完整的经营体系使竞争处于有利地位。众所周知，汉口地区一直是向俄国出口茶叶的重要产地。从十九世纪初，俄国人开始大量进口中国茶叶的时候起，就逐渐地了解了汉口地区的茶叶产销情况。英国人进入汉口的时间实际上要比俄国晚，之所以英国人能首先垄断汉口茶市，是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逐渐在汉口茶市站稳了脚的俄国商人开始对英国商人采取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以采购花香为例：1877 年，当花香刚刚上市时，英商即以每担 6 两的价格买进。而俄商通过其代理人详细掌握了市场的行情，得知花香存货很多，便联合全体俄商，冻结市场。最后俄商竟以每担 3.6—3.8 两的低价购进了所需的大量花香。^②1878 年，英商又在俄商之前以每担 6.5—9 两的价格采购了 200 万英磅花香。俄商仍用上述方法，下半年中国茶农被迫廉价抛售，结果俄商仅用了 3—6.5 两的价格大量购进。1880 年，英国人的买价为每担 8.5—9.25 两，而俄国人仅为 4.35—6 两。^③俄国商人的采购价如此之低，有时甚至仅及英商的一半，又有稳定而庞大的国内市场，自然大发其财了。而英国商人采购的花香大部分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 268 页。

②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 273 页。

③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 276 页。

要在国际市场上再销售，因采购价高，利润自然转少；更主要的是失去了巨大的俄国市场，使英国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1878年，英商就亏了本。而当英国人“因进口货物遭受重大损失时，几乎所有的俄国人都发了财，在汉口过着与英国人一样的奢侈生活。每个俄国商行都有独立房舍，均从那些英国商人手中以原价1/3的价钱买来的。房舍旁边有石砌的仓库，用来储存茶叶，还有制造砖茶的工厂。”^①

八十年代后，汉口地区的茶叶贸易进入鼎盛时期。1880-1894年间中国陆路输往俄国的茶叶数量为（担）^②：

年 份	经恰克图陆路	经樊城陆路
1880年	296869	107636
1881年	294985	127295
1882年	274600	42182
1883年	290203	34612
1884年	314605	55394
1885年	345391	164363
1886年	445148	169680
1887年	444637	174922
1888年	463325	245433
1889年	360708	59008
1890年	371052	56843
1891年	379902	53788
1892年	367708	35659
1893年	446600	53541
1894年	500561	76877

①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251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3编第1284页。

上列数字中，除少数由福州起运输往恰克图的砖茶外，其余几乎全部是汉口起运的，当然其中也有经汉口转出口的九江茶和湖南茶。在全部出口茶叶中，汉口茶约占80%以上。就价值而言，陆路茶为海路茶的2倍以上。以1894年为例，该年中国向俄国出口的茶叶总值为11023184海关两，其中经放得萨、巴统海路进入俄国的为3369691海关两，陆路进入俄国的为6257452海关两，经俄属太平洋各口岸进入俄国的1369041海关两。^①

实力雄厚的俄国商行左右着汉口茶市。1893年，仅莫尔恰诺夫-佩恰特诺夫商行、波波夫兄弟公司、托尔马克夫公司和奇尔利夫-帕诺夫公司四家就由汉口发往俄国3500万俄磅茶叶，占全部茶叶贸易1/6以上。^②

二、俄商对福州、九江茶市的经营

随着中俄汉口茶叶贸易的发展，俄国茶商开始将其势力伸入到中国内地其他产茶区，以便获取更多更大的利润。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莫斯科商人卡·阿·波波夫就多次建议汉口的俄国经纪人派人到福州作采购茶叶的试验，但由于当时俄商在汉口立足未稳，正与英商展开激烈竞争，无力顾及其他地方。1870年，苏伊士运河正式开通。由于海路运茶，福州更为便捷，1872年汉口俄商伊万诺夫便派波雅特科夫到福州了解行情，借住在美国人设在福州的商行里。波雅特科夫很快弄清楚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320页。

②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年5-7期。

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等在福州茶市采购的大宗货是叶茶，茶末及劣质叶茶价格极其低廉。是年，他与中国商人合作安装了一台笨重的压力机，生产了900箱砖茶，每箱重150俄磅，合61.4公斤。质量虽不及汉口砖茶，但成本只相当于汉口砖茶的1/3。因其价格低廉，极受贫穷的俄国人的欢迎，很快销售一空。第二年波雅特科夫生产了6000箱，仍然供不应求。第三年，即1874年再扩大生产了16000箱，仍不够商人需要。^①三年之中福州俄国人生产的砖茶增长了16倍。由于获利甚丰，波雅特科夫一面扩大生产，一面寻求与实力雄厚的汉口俄国茶商合作。1875年，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波雅特科夫-莫尔恰诺夫商行。与此同时，汉口的其他俄国茶商也纷至沓来，先后有巴纳玛洛夫商行和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商行开业。是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②这些俄国砖茶厂除设立在福州市区者外，亦有附近的建宁、南雅、西芹等产茶区。每年8月底开始生产砖茶，到来年4月底结束。所产砖茶“全部装船运往天津，转陆路运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北部。”^③1872-1881年俄商在福州地区制造的红砖茶数量如下（箱）^④：

①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281页。

② 孙毓棠：《抗戈集》，北京1981年版，第78页。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316页。

④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292页。

年份	数量
1872年	900
1873年	6000
1874年	15810
1875年	36228
1876年	51910
1877年	50662
1878年	68908
1879年	87484
1880年	57405
1881年	45954

福州的俄国茶商除自己加工制造红砖茶运往俄国外，还采购部分华商及英商生产的砖茶，数额不大。1875年，俄国从福州进口的砖茶总数为6820000俄磅，其中俄商制造的占80%；1879年，俄国从福州进口的砖茶为15070000俄磅，俄商自己制造的占87%。

福州俄商在加工制造、贩运红砖茶的同时还收购白毫茶（红茶、花茶）和普通砖茶（绿砖茶等），但与红砖茶相比，数额不大。1875-1881年间的收购数额为（箱）^①：

年份	白毫红茶	白毫花茶	普通砖茶
1875年	13608	185	
1876年	6568	333	--
1877年	14833	84	-
1878年	24030	24	-

^①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287页。

1879年	25955	450	2909
1880年	11676	404	3666
1881年	8579	170	1071

八十年代以后，福州茶市受英商逐步退出的影响，俄商制造红砖茶的廉价原料来源发生困难，不得不改用普通茶叶，使福州砖茶的造价上扬，同时质量有所提高。八十至九十年代，中俄福州地区的茶叶贸易发展缓慢，总额基本与七十年代水平相似，每年在5-10万担之间。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九十年代中期。1895年，福州输出到俄国的砖茶103945担，^①创了历史的最高纪录。从此，中俄福州茶叶贸易便日趋衰落。

俄商在进入福州茶市的同时，也派人伸入到我国另一个著名茶市九江。1870年汉口的俄国茶商派人到江西省的茶市集散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九江茶是传统的输往俄国的茶叶之一，俄商一到这里，立即发现九江东南与福建产茶区毗连，西北有长江水路与汉口相通，不仅交通十分便利，而且茶叶质量高价格低廉，有利可图。1875年，汉口的俄商新泰砖茶厂首先在九江设立分厂，生产砖茶。1877年，九江出口砖茶9236担，1878年出口11285·75担。^②新泰砖茶厂九江分厂获利以后，1882年顺丰砖茶厂也在九江设立了分厂，生产砖茶，年产量1万担左右。每年“两工厂的产量约23000担”。^③另据海关统计，“1872年至1882年共出口86128担”^④砖茶。

①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年5-7期。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第63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第63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第63页。

九江在 1863 年开埠时只有 7-8 家茶行，外商进入后，特别是七十年代末俄商在九江商业活动的迅猛发展，茶行急剧增加。1881 年已有茶行 250 家，1882 年猛增至 344 家。同一时期九江砖茶的出口数也明显增加。

1884 年-1888 年间九江出口的砖茶数量为（担）^①：

年 份	数 量
1884 年	19108
1885 年	19746
1886 年	34393
1887 年	35821
1888 年	49231

1882 年至 1891 年的 10 年间累计出口砖茶 259268 担^②，是前一个 10 年的 3 倍。

九江俄商发挥地方优势生产一种小京砖茶。这是一种用优质茶末精制而成的一种砖茶，比普通砖茶轻、体积小、不仅携带方便，而且其味甚佳，被誉为“旅行家、边疆地区的居民和战地的军队的最好的和最便于饮用的茶叶。”^③俄商在九江制造的这种小京砖茶不仅供应俄国，而后再出口到德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谋取利润。1891 年，九江地区输往俄国的小京砖茶超过 100 万磅。^④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上第 63 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上第 63 页。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 2 册第 1322 页。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 2 册第 1322 页。

除普通红砖茶和小京砖茶而外，俄国人还在九江生产一种方茶。这种茶是从 1891 年开始生产的，是年生产了 3700 担。最初几年生产量不断增加，1895 年达到 6547 担^①的最高峰。但与普通砖茶相比，数量还是不大的。

九十年代初，俄国茶商在九江的活动进入黄金时期，砖茶生产继续增长。与同一时期俄商在福州的商业活动处于停滞状态不同，这是因为俄商在该地区生产的砖茶原料与福州不同，且与汉口相距甚近运输方便等因素所决定的。

三、天津开埠与俄国人经天津转口的中国茶叶

1860 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增开了天津等地为通商口岸。翌年，俄国人要求到北京贸易，被清政府以没有前例为由加以拒绝，并建议援引英、法之例，改在天津。1862 年，俄国人正式通过天津进行转口贸易。从此，经天津转出口到恰克图的陆路茶叶迅速增加，在中俄茶叶贸易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指出，天津转口茶叶贸易的兴衰是与中俄汉口茶叶贸易的兴衰密切相关的。

1862-1865 年间，俄商由汉口径上海运到天津的茶叶数量分别为：1485027 磅、1626337 磅、1604725 磅和 1647888 磅。^②开埠初期，俄商由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交纳每担 2.5 两的出口关税外，还要在天津交纳子口税，相当于出口半税，即每担 1.25 两。在俄国政府的一再要求下，清政府于

①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 年 5-7 期。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 2 册第 1301 页。

1866年被迫同意免征子口税，条件是这类茶叶不允许在天津地区销售，必须全部转运到恰克图。减掉子口税后，天津的转运额明显增长。1866年为2399291磅，比上年增长了21%，1867年猛增到8679501磅，比1865年增长了4倍。^①俄商转运到天津的除大宗砖茶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红茶。1866-1868年间分别为1427321磅、1114047磅和1766756磅。1868还有5096磅的绿茶。^②1869年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签订后，天津免纳复出口半税的规定以条约的形式被确定下来。1870年1月，俄国天津领事馆格升为总领事馆，俄国在天津的转口茶叶额又有新的增长。

1871-1874年天津转口茶叶的价值为（海关两）：

1871年	1087667
1872年	1913731
1873年	2197323
1874年	1588365 ^③

应该指出，1874年较前两年有所下降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即这一年有一个庞大的蒙古喇嘛教代表团去拉萨朝圣，骆驼数量大量减少，造成运输能力不足，许多待运的茶叶只好放在天津的仓库里。第二年天津转口的茶叶数量比上年增长了将近1倍，即由上年的13745165俄磅增至26921360俄磅。1876-1880年间俄商经天津转出口的茶叶分别为（俄磅）^④：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301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303页。

③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贸易报告》，1874年天津，第62页。

④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308页。

年份 品种	1876年	1877年	1878年	1879年	1880年
红 茶	6138479	7484772	9101280	14142616	9170853
绿 茶	38085	148		65415	237746
花 香				10501	
红砖茶	14269590	14592571	17125280	25039297	16665280
绿砖茶	155061	7437	180560	29835	88966
普通砖茶	2646578	1022473	2124000	4234138	2423217
块 茶					
条 茶				62644	210224
砖茶总数	17071229	15622481	19429840	25385914	19399687
总 计	23247793	23107401	28531120	43605416	28807286

七十年代后5年比前5年增长了近1倍，与六十年代初开
关时期相比，增长了20倍。到七十年代末，俄商已在天津设
立了7个贸易商行办事处。1877年有25名俄国人长期驻守天
津，到187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42人。^①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经天津转口到恰克图的茶叶继
续增长，每年在30-50万担之间。

1881-1894年间天津转口到恰克图的茶叶数（担）^②：

年 份	数 量
1881年	294985
1882年	274600
1883年	290203

①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301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
1316页。

1884年	314605
1885年	345391
1886年	445148
1887年	444637
1888年	463325
1889年	360708
1890年	371052
1891年	379902
1892年	367708
1893年	446600
1894年	500561

天津转口到恰克图的茶叶以砖茶为主，其次是红茶。1887年砖茶为271007担，而1888年为340091担，约占全部茶叶的2/3。^①毫无疑问，凡是俄商经海路转运到天津的茶叶绝大部分是通过陆路再出口到恰克图的，但其中也有一小部分运往俄属太平洋各口岸的。据统计，1874—1894年间华茶输往俄属远东地区的总数为（担）^②：

年份	数量
1874年	3659
1875年	6053
1876年	7193
1877年	4385
1878年	5440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316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83—1284页。

1879年	10964
1880年	19238
1881年	29472
1882年	32585
1883年	28857
1884年	45050
1885年	38955
1886年	63603
1887年	69272
1888年	79026
1889年	38300
1890年	40168
1891年	67480
1892年	50855
1893年	73115
1894年	87518

上列数字中有的是由汉口径上海或由福州直接运抵俄属远东各口岸的，而且包括丝绸、棉纺织品等商品，但大部分还是经天津中转的茶叶。天津作为俄国进口中国茶叶的最大转运站，有其明显的优势。这条路线比传统的由湖北樊城经山西至恰克图的商路耗时少、运费低。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国政府规定，陆路进口的中国茶叶征收卢布，海路征收黄金，卢布对黄金的比价一再贬值，使经天津转口到恰克图的陆路茶叶特别受欢迎。以至于在俄国国内经营中国茶叶的商人点名要经天津—恰克图一线进口的中国茶叶。更何况这些陆路运进的中国茶“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指欧洲）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

的所谓商队茶，不同于海上进口的次等货。”^①

四、张家口开埠之争及中俄张家口茶叶贸易

早在十七世纪末，张家口就是俄国商队进京的必由之路。十八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俄恰克图贸易的飞快发展，张家口的作用日趋重要。因此，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俄国一再试图直接到张家口贸易。1860年11月14日签订的《北京议定条约》第5款规定：“俄国商人，除在恰克图贸易外，其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经过之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②翌年，俄国公使正式提出在“张家口设立行栈”的要求。清政府考虑到“张家口为五方杂处之地，距京不及四百里，若准俄商在彼设立行栈，势必致俄人日聚日多，历久恐或酿成心腹之患”^③，遂加以拒绝。但俄国政府不肯罢休，经反复争论，清政府作了一些让步。1862年3月14日订立了《陆路通商章程》21款，其中第4款规定：“俄商路经张家口，按照运津之货总数，酌留十分之二于口销售。……该国不得设立行栈”。^④俄国虽在经济上得到一些好处，但仍不满足。1865年，俄方依据《陆路通商章程》第20款“此次新定章程试行三年为限”条文，再次提出“张家口任便通商”的要求。清政府在拒绝后答应两年后再行商办。1867年夏，俄国再次提出在张家口设立行栈和领事馆。恭亲王奕訢认为：“若任其立领事官，开设行栈，则密迩畿封之地又添一口岸，其碍于华商生计者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66年北京版，第2卷第122页。

②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50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35-36页。

④ 《同治条约》，卷2，第7-14页。

犹浅，其关于内地边防者思实深”。^①经过两年交涉，清政府在作出新的让步以后，1869年签订了《改定陆路通商章程》。改定章程第4款规定：“俄商由恰运俄国货物，路经张家口，按照运津之货总数，听任酌留若干于口销售，限三日内禀明监督，验发准单，准酌留之货交纳税项后，方准销售。惟该口无庸设立领事官以及行栈”。^②这一次俄国虽仍未达到“设立行栈”和“领事”的目的，但取消了俄货在张家口只准留十分之二的限制。只要有利，俄商可以任意留多少。1881年2月24日俄国终于通过中俄《改订条约》（又称《彼得堡条约——引者》）获取在张家口建造铺房行栈的权利，但最终未能设立领事官，也未能使张家口象中国其他通商口岸一样成为一个开放的商埠。

从六十年代开始，俄商就在张家口设立了商号。据《摩利斯的1869年香港行名簿》记载：“在张家口至少有两家俄国商号，这些商号和上海的任何一家商号一样，都有正式的中国行名”。^③1860—1880年间，汉口——天津——张家口——恰克图陆路商道达到鼎盛时期，俄商用这条路将大量茶叶运往恰克图。一位到过此地的西方商人写道：“在通过晋北的大道上，我几乎每天都遇见伴随着经张家口赴恰克图的长列砖茶驼运队的华商，用俄国话向我招呼”。^④

俄国商号在张家口地区收购的茶叶享受只相当于普通税则一半的优惠的出口关税。原来有些俄国中小茶商由恰克图来张家口，从华商手中采购茶叶，现被在张家口的俄国商号所夺，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7，第23页。

② 《同治条约》，卷14，第5—10页。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306页。

④ 冯·里奇瑟芬：《拜伦·里奇瑟芬来信》，第13页。

致使华商处境日蹙。为此，奕訢上书皇帝指出：“从前张家口赴恰克图华商颇获利益，自与俄国订立陆路通商章程以来，俄人自行由津贩运土货赴恰克图贸易，华商利为所夺，大半歇业”。^①张家口的华商歇业后，该地出售的俄国货大多由俄商贩运而来。

中俄两国商人在张家口的直接茶叶贸易数额不大。如，1878年，俄国商人在张家口售出价值10446卢布的商品，购买了9152卢布的660箱普通砖茶。然而，同一年张家口却销售了从恰克图进口的俄国呢绒、棉绒、油性革、毛皮等商品高达1500000卢布，1879年销售了1463363卢布。^②不难看出，作为对俄茶叶出口的转运站，张家口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无怪乎英国人称张家口为“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和俄国对华贸易的锁钥”。^③

第四节 中国边疆地区与 俄国的茶叶贸易

一、《伊塔通商章程》签订后新疆对俄国出口茶叶之激增

前已述及，俄国通过1851年《伊塔通商章程》获取了在中国西部地区免税贸易等的极大特权。对于这一点，长期在俄国驻新疆领事馆供职的俄国官员鲍戈亚夫连斯基曾直言不讳地指出：“1851年的伊犁条约（即《伊塔通商章程》——引者）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7，第2页

②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313页。

③ 冯·里奇瑟芬：《拜伦·里奇瑟芬通信录》，第13页。

是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侨居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俄国臣民，开始改善了自己的地位。”^①另一位俄国官员巴布科夫也认为，章程对于俄国来说“不仅是在商务上，而且在政治关系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②章程甫经签订，俄国政府就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设立了领事馆，并建立了规模较大的贸易圈。咸丰二年（1852年）八月，贸易圈基本竣工。据新疆将军奕山奏称，伊犁贸易圈“共有房四十八间，内匡苏勒住房八间，额哲库住房五间，其余群房系夷商居住并存放货物。”^③塔尔巴哈台贸易圈的情况“与伊犁大概相同。”^④两年之后，塔尔巴哈台贸易圈的房屋由原来的50间增至70间。^⑤

《伊塔通商章程》签订后，交易十分活跃，贸易额有明显增长。1854年与1850年相比，进出口额均增长2倍以上，其中尤以输往俄国的茶叶增长最快。这是因为俄商不仅在新疆有免税贸易的特权，而且该地距俄国茶叶消费量很大的俄国中亚和伏尔加河沿岸地区近，并“可以更迅速地运到俄国中心地区”。^⑥另一方面，从1853年起，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已呈衰落之势。一些茶商为利润趋使，又被西部地区的优势条件吸引，纷纷到新疆来寻求发展。这对新疆地区对俄茶叶输出的增加也

①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1980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236页。

②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1973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142页。

③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上册，第84页。

④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上册，第84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

⑥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17页。

起了促进作用。1850年，茶叶在新疆输往俄国的商品总额中已占到了94.6%；1854年再增至97.8%。

1850——1854年新疆对俄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及价值为(千卢布)①：

年份	1850年	1851年	1853年	1854年
总 额	530.3	605.8	688.6	1601.4
其中： 茶叶	502.1	579.8	671.1	1569.3
棉织品	6.6	5.9	4.5	15.5
丝绸品	14.3	11.6	4.1	2.8
毛织品	0.6	1.5	1.2	1.3
毛 皮	—	0.4	1.1	3.8
其 它	7.0	6.7	6.6	8.7

新疆出口的茶叶都是通过什么途径输入到俄国去的呢？柯尔萨克在《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中有明确记载②：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71—272页。

②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1857年喀山版，第440—441页。

年 份		1851 年	1853 年	1854 年
茶 类				
海 关				
经塞米巴拉 金斯克海关	白毫茶	8716 普特 18 俄磅	12224 普特	21926 普特
	砖茶	6343 普特 37 俄磅	4361 普特	7232 普特
经彼得罗巴甫 洛夫斯克海关	白毫茶	617 普特 24 俄磅	2442 普特	4911 普特
	砖茶	158 普特 27 俄磅	377 普特	753 普特
经鄂木斯 克海关	白毫茶	232 普特 27 俄磅	-	-
	砖茶	17 普特 10 俄磅	-	-
经西伯利亚 各关卡	白毫茶	30 普特 3 俄磅	20 普特	234 普特
	砖茶	83 普特 35 俄磅	158 普特	74 普特
经奥伦堡 海关	白毫茶	3 普特 15 俄磅	-	-
	砖茶	-	-	-
经特罗伊茨 克海关	白毫茶	2848 普特 1 俄磅	1614 普特	832 普特
	砖茶	1940 普特 31 俄磅	195 普特	374 普特
总计	白毫茶	12448 普特 8 俄磅	16300 普特	37903 普特
	砖茶	8564 普特	5091 普特	8433 普特

显而易见，新疆出口到俄国的茶叶主要通过塔城和伊犁输往塞米巴拉金斯克海关，而输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海关和特罗伊茨克海关的茶叶主要是供应俄属中亚的居民，其数量远不及前者。另据刘选民考证：“1852年（咸丰二年），中国（这里指新疆）输入俄境之货物值 552000 英镑，至 1854 年（咸丰四年）则增至 780000 英镑，至 1856 年（咸丰六年），复增至

1016692 英镑”。^①这说明，直至 1856 年中俄西部地区的贸易额是逐年增加的。茶叶交易量的增长不仅给俄商带来巨大利益，而且也为俄国国库增加了收入。据统计“仅 1855 年，由伊、塔输入俄国的茶叶，就为俄国国库提供了 10 万卢布的关税收入”。^②

然而，正当俄商踌躇满志，欲在新疆大干一场之际，发生了愤怒的中国淘金工人焚烧俄国贸易圈事件。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连连得手，领土面积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俄国也对中国西部边疆推行领土蚕食政策，致使该地区形势趋于紧张。位于塔城西南的雅尔图拉盛产黄金，当地回、汉居民早在此地采挖金沙。1853 年夏，清政府决定在雅尔图拉开设金厂，以解决百姓衣食，并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早对此地有领土要求，又为金苗所吸引的俄国政府，公然派人前往金矿阻拦，并由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出面照会伊犁将军，声称该矿属于俄国。威胁中国应将金夫“即速撤回，勿令复入，不然，日后不和之事，起与不起，我们不保”。^③1855 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派大批俄军由阿亚西斯侵入雅尔噶图，强行驱赶中国淘金工人。据被逐的淘金工人讲：“俄罗斯来七、八百名扎踞沿海一带，伤毙民命十一名，将死尸均被移弃海中”。^④同年 6 月中旬，淘金工人曾前往塔城俄国贸易圈集会抗议；8 月 26 日复有五、六百人集会抗议，并点燃贸易圈。事情发生后，俄

① 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载《燕京学报》第 25 期，1939 年，第 200 页。

② 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1868 年彼得堡俄文版，第 323—324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11 卷第 24 页。

④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 3 编上册，第 178 页。

国驻塔城及伊犁领事馆并贸易圈俄国商人全部撤回，中俄新疆地区的贸易因此受到极大影响。此后几年，该地区的贸易处于停滞状态。经过三年交涉，1858年10月16日签订了中俄《塔尔巴哈台议定赔偿条约》9款。主要内容如下：

一、俄罗斯国贸易圈子、房间，原系俄罗斯国公中修盖，中国念两国和好之道，亦由公中按旧式数目即行补葺，至明年六、七月间工竣时，由俄罗斯国苏勒官出具收领文凭，咨行塔尔巴哈台存照，以敦和好。

一、此次被烧丢失俄罗斯商货等物，接中国合算，计银一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二两，接俄罗斯国合算，洋钱三十万零二千五百个。彼此公平会议，合抵中国武彝茶五千五百箱。……以昭公平。

一、中国贴补之茶，定期三年交清。于中国咸丰八年十月间，给茶二千五百箱，明年十月间给茶一千五百箱，后年十月间给茶一千五百箱。查中国十年即俄罗斯国一千八百六十年，按时交清，以完前案。

一、此次公同会议后，俄罗斯即将商旗立起，并各自晓谕两国商人，遵照前在伊犁议定章程，仍在两处通商。俄罗斯国即遣苏勒官各赴各所，照旧通商，以归和好。^①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恢复后的中俄西部贸易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并未见起色，贸易额也远不及五十年代中期。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起义定都南京后，两湖、两江产茶区在太平天国的管辖之下。由于战事频仍，商人运茶不能不受到影响。俄商亦因贸易圈事件的影响而裹足不前，更主要的是1860年俄国政府通过《北京续增条约》把喀尔巴什湖以东44

^①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中册，第584—585页。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已有。俄国正忙于在这片新开拓的土地上划界立标，巩固统治，无心经营商业。

二、阿古柏入侵对中俄西部地区茶叶贸易的影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64年，中亚浩罕汗国的首领阿古柏借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起义及上层农奴主叛乱之机侵入南疆。1865年1月攻占了喀什噶尔，接着又先后占领了疏勒、莎车、和田、阿克苏等地。1867年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七城之国）。阿古柏伪政权为了站稳脚跟，急需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和承认。因此，不惜出卖主权。然而，此时中亚的浩罕汗国已为俄国吞并，担心阿古柏政权的存在会危及其在中亚的统治；同时又担心阿古柏政权立不住脚，从而影响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未予承认。阿古柏政权转而请求英国支持。英国为了与俄国争夺南疆，公然不顾中国利益，与之建立了联系。这样，俄国与阿古柏政权之间的关系前几年一直较为紧张。与此同时，塔城和伊犁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与上层农奴主的叛乱交织在一起。俄国人认为“在这一动乱时期，俄国臣民虽然人身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但物质上遭受了巨大损失。在这样的条件下，贸易活动自然就暂时中止了”。^①由于“茶叶贸易的中断，导致俄国中心地区出产的各种俄国棉织品、呢绒及其他各种工业品输出额的缩减”。^②

七十年代初，阿古柏的势力已经膨胀到了顶点。在攻占了乌鲁木齐后，进而要攻打伊犁。俄国政府害怕阿古柏占据伊犁

①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177页。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74页。

影响自己战略上和商业上的利益。1871年5月15日借口安定边疆秩序，保护俄国侨民的人身安全，武装出兵占领了伊犁。按其传统习惯，俄国商人紧随俄国军队之后进入了伊犁地区，并与伊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1872年6月，俄国政府与阿古柏伪政权订立了俄国与喀什噶尔自由通商条款五条，规定俄国有权在南疆各地自由通商，设立货栈，派驻商务代表（商头），俄国商品按价格征收百分之二点五的关税，并可以自由通过南疆运往其他地区。^①俄国通过该条款，获取了在南疆的大量权益。作为回报，俄国不顾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公然承认了阿古柏的“哲德尔沙国”为“合法政权”。至此，俄国与阿古柏政权的关系有所改善。然而，英国人在南疆的活动给俄国人带来许多困难。英国人在南疆的势力远远大于俄国，为进一步控制阿古柏政权，英国不仅怂恿土耳其供应阿古柏大量武器，而且以英国女王的名誉赠送一批武器。阿古柏政权早与俄国有隙，便企图利用英国的保护摆脱俄国的控制。这样，在《自由贸易条款》签订后的最初几年，由于战乱和英俄之间的激烈竞争等原因，俄国与阿古柏控制的南疆之间的贸易并未尽人意。库罗帕特金甚至抱怨道：“俄国商人受到冷淡的接待，比亚洲商人遭到更多的限制。喀什噶尔统治者阿古柏伯克把贸易看作是他个人的垄断事业。他擅自估价商品，并按他所指定的价格不定期的赊购大部分商品。此外，一部分商品照例作为礼物归他所有。赊购商品的付款甚为拖沓，有时整整几年。”^②

随着阿古柏伪政权统治的动摇，俄国的影响日益扩大，俄

①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第52页。

②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第51页。

商与南疆的贸易额有所增加。1876年，喀什噶尔输往俄国的中国商品总额为1101222卢布，而出口的俄国商品只有248068卢布，出口为进口的4倍。值得一提的是，喀什噶尔输往俄国的中国商品中只的70普特茶叶，价值3071卢布，仅占贸易额的0.3%弱，而土布一项就占了81%。恰恰在进口的俄国商品中有价值30908.5卢布的中国茶叶，占进口额的12.5%。^①不言而喻，茶叶是倒灌入境的。据库罗帕特金记载，有“两条向喀什噶尔输入茶叶道路：1)从谢米烈奇耶省(最近还从固尔扎)^②经过纳伦堡和察克玛克堡到喀什城。2)从印度经过拉达克到叶尔羌，再到喀什。^③从俄国倒灌入境的茶叶大部分是经苏伊士运河—敖得萨一线进口的中国海路茶。中国茶从敖得萨到塔什干，然后转运到伊犁和喀什噶尔。也有少量是经恰克图进口的中国陆路茶，再通过俄国境内转送到南疆的。此时印度茶已开始出现在国际市场上，尽管其质量次于中国茶，但英国殖民当局为支持其竞争，免征关税。倒灌的茶叶在俄国境内交纳了关税后，又经过长途转运，再到中国时自然不如不交关税，路途又近的印度茶叶价格低。因此，倒灌茶叶的俄国商人在这里感到了印度茶叶对他们的竞争。库罗帕特金甚至亲自考察了喀什噶尔的茶叶市场及居民的消费量。他在喀什噶尔的各集市上看到有从俄国纳尔内依倒灌的中国茶叶品种有：克尔玛茶、库梅什茶、库梅什绿茶、阿克茶、绿茶、阿特巴什茶。从中国伊犁倒灌的茶叶有贾伊纳克茶、阿克库留克茶、舒维伊茶、古喇绿茶、阿尔玛茶、塔赫塔砖茶。他预测俄

①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第59—72页。

② 即中国之伊犁

③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第61页。

国可以向喀什噶尔地区倒灌 15000 普特中国茶，价值为 50 万卢布，即比经过俄国边界倒灌的中国茶多 16 倍。^①茶叶倒灌入境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原来南疆的茶叶均是中国商人由内地贩运而来，阿古柏统治时期，清政府禁止向南疆运茶。又由于长年战乱，即使是走私茶也很难进入，而南疆各族人民又是离不开茶叶的。只要有利可图，俄商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无怪俄国人将其占领伊犁时期视其为：“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贸易的黄金时代”。^②

阿古柏伪政权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中俄茶叶贸易。

三、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西部地区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阿古柏政权的倒行逆施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1878 年，左宗棠率领的政府军全歼阿古柏军队，新疆全境收复。14 年的战乱使西北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业待举。和平的环境为西部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俄国商人纷纷涌入新疆。此时伊犁仍在俄军占领之下，清政府坚持先收回伊犁，再议贸易事项。光绪四年底（1878 年），清政府在致俄国驻华公使的信函里明确指出：“现在各城虽已克复，善后一切尚未就绪，并未承贵国将伊犁交还，而西路贸易章程因此尚未议及。今俄商等不待议有定章，贸然前往，侥幸无事，自不致徒绕口舌，万一有意外之虞，谁任其咎？且向无人之路行走，彼处既无人烟，又何能任保护之责？再四思维，此事殊多窒碍，仍望贵署大臣行知贵国

①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第 62 页。

②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 177 页。

边界各官，转饬俄商暂勿前往贸易，是为至幸”。^①1878年12月31日清政府任命的出使俄国的头等钦差大臣崇厚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俄都圣彼得堡，经过9个月的谈判，1879年10月2日崇厚在未经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条约除割地、赔款的内容外，亦在通商贸易方面给予俄国极大的好处。条约规定：“俄商得在中国蒙古地方和新疆全境进行贸易，得在张家口、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地建造铺房行栈；增辟中俄陆路通商新线，西路由嘉峪关经汉中、西安至汉口，北路由科布多经归化（呼和浩特—引者）、张家口、通州至天津；俄商在中国贩运茶叶减税”等。条约签订后，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为此，恭亲王奕訢上奏说：“运货、设官、免税、设栈各条，扩充既广，流弊易滋，且亦有碍华商生计”。^②左宗棠也明确指出，俄国“欲籍通商，使其深入腹地，纵横自恣，我无以禁制耳”。^③在全国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拒绝批准《里瓦吉亚条约》。1880年夏，清政府改派曾纪泽再赴俄国谈判，7月30日曾纪泽带领随员抵达彼得堡。经过半年的交涉，1881年2月24日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该约虽然收回了一些利权，但在商务上仍作出了很大让步。其中规定俄国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及允许俄商前往肃州（嘉峪关）贸易等条款。

《改订条约》给了俄商诸多优惠，“相当大地扩大了俄国贸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总署为西路贸易原定伊犁交收后开办致俄使信函》（密启簿）。

② 《清季交外史料》，光绪朝第17卷第26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5卷第35页。

易和企业家在中国关外地区的活动范围，……给了俄国将其政治、经济影响扩充到中国西北内地的很好机会”。^①从而“在中国西部地区，从中俄边界直到长城，俄国臣民都享有免税贸易权，这种权利却是中国人自己都享受不到的”。^②《改订条约》签订后中俄西部地区的贸易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八十年代中期，贸易额已恢复到五十年代的水平，1884年交易额为210万卢布，1893年增至582.86万卢布，占中俄贸易总额的15%。^③其中出口额2792190卢布，略低于进口额。出口商品以毛、皮、牲畜为主，茶叶已不占重要地位，仅有3143普特，价值55720卢布，占全部出口商品的2%强一点。其中输往塞米巴拉金斯克海关辖区2609普特，价值44767卢布，占大多数；输往土尔克斯坦海关辖区534普特，价值12953卢布。^④自十九世纪以来，塞米巴拉金斯克在中俄西部贸易中一直占有重要作用。

战乱期间，中俄在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受到很大影响。然而，在新疆和中国内地获了利的俄商又不肯于返回恰克图采购茶叶，于是他们便极力寻求恰克图和新疆之外的新的采购与运茶路线。光绪元年（1875年）夏，俄国人索思诺福斯齐等人擅自考察了中国内地湖此、四川产茶区及兰州等地，对此一路线运送茶叶十分满意。左宗棠在其奏折里曾对此事有明确记载：“询其来意，均称俄国日用需茶，向由上海分销，水运天

① 维辛斯基：《外交辞典》，1950年莫斯科版，第379页。

②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50页。

③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75页。

④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75页。

津，转张家口，至恰克图分运其国，各处路程迂折。若招湖商由楚达陇，径抵其国边界，可省程途五、六千里，俄商运销其国内各处，又甚便捷，中国与俄均收榷税充国用，可为久远相安之计。此行之由楚、蜀来甘、盖专为探访茶路也”。^①其实，天津—张家口—恰克图商路一直是极繁荣的，说其“路程迂折”不过是为其开辟更多的中国市场，获取更大的利润的借口而已。在俄国政府的一再要求之下，清政府同意开辟第二条通往俄国的陆路运茶之路。新开辟的嘉峪关至俄国西伯利亚的商路虽不及恰克图传统的商路作用大，但也推动了西部茶叶贸易的发展。从光绪五年（1879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俄国商人经此路运茶叶的数量如下（担）^②：

年份	叶茶	砖茶	合计
1879年	1453	90793	92246
1880年	80571	27065	107636
1881年	84739.74	42555.70	127295.44
1882年	41353	828.33	42181.33
1883年	33843	769	34612
1884年	29397	25997	55394
1885年	157458	6905	164363
1886年	150916	18764	169680
1887年	167438	7484	174922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钦差大臣左宗棠奏俄官过境呈出所绘地图并请往销茶货折》（朱折）。

② 根据钱恂制《光绪通商综核表》，俄商运茶另数表第126—129页整理。

1885年后每年运茶叶在15万担以上，相当于输俄茶叶总数的1/5。十九世纪末，俄商在中国西部地区的贸易进入黄金时期，俄国人在该地区的势力也急剧膨胀。

四、十九世纪下半叶黑龙江运茶路线的兴衰

五十年代初，恰克图互市贸易出现了衰败迹象。为了获取更大利润，俄国政府及其商人一面极力扩充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势力，一面大力开拓黑龙江地区的贸易。他们认为要想摆脱东西伯利亚的经济矛盾，出路只有一条，即“从贝加尔经水路—阿穆尔河向东，向太平洋沿岸进发”。^①1857年，俄国在尚未正式割占我国辽阔的黑龙江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成立了“阿穆尔公司”。该公司的业务范围极其广泛，开办了许多商店和货栈，声称可“向阿穆尔居民廉价提供粮食和优质货物”。但由于该公司徇私舞弊，出售变质的商品等而声名狼藉，一直入不敷出。

1858年5月，俄国通过《璦琿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取得了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贸易的权利。条约签订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要求援《伊塔通商章程》之例，免税贸易。此时已由新疆将军迁任黑龙江将军的奕山害怕“若不应允，诚恐因此不睦，致启衅端，是以勉从其议”。^②奕山根据《璦琿条约》第2条之规定，拟定了黑龙江通商条规14条。俄国势力在黑龙江地区的发展及其俄商享有的优惠待遇，促使该地区的贸易有所发展。到1859年俄国“从事阿穆尔地区贸易的共有14个人和公司，

^①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82页。

^②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中册第659页。

其中比较知名的有：П.И.库兹涅佐夫，季明和谢烈布连尼科夫公司、阿穆尔公司、库尔巴托夫和拉宁公司、康定斯基和纳列托夫公司、尤金等。经商的哥萨克有60人左右，拨给他们的资金很多，让他们从事小股贸易，利润相当可观”。^①这些商人和公司经营的范围广泛，他们从茶叶贸易中获取高额利润，甚至每磅茶叶卖到5卢布的高价。当时他们预言全部的进口贸易都要走东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托木斯克这条路。“连茶叶都可能要走这条新路。这条道路将有能力同恰克图道路竞争”。^②穆拉维约夫自信地声言用不了多久黑龙江河口处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即庙街—引者）就会成为美国旧金山那样的城市。

然而，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并不具备迅速发展贸易的条件。首先，俄国从黑龙江口通往东西伯利亚内地的交通十分不便，海湾处河口结冰期长达7个月；又因港湾处水的深度不够，大型船舶只能到迭卡斯特里，必须将货物转卸到小船上，才能进入黑龙江。这样，不仅费时，而且增加了运费。“一磅茶叶从中国到恰克图运费为22.5戈比，从恰克图到莫斯科17.5戈比；从上海经阿穆尔河，仅运到外贝加尔就需27戈比；而海路从上海到彼得堡才3—5戈比”。^③正因为如此，在黑龙江沿岸贸易的最初十几年里，经黑龙江转口的茶叶贸易，同黑龙江地区的边境贸易一样难以发展起来。

1873年，俄国成立了“黑龙江航运公司”，该公司不仅有20余艘行驶于黑龙江内河的轮船，而且有两艘海船。此时，

①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283页。

②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285页。

③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287页。

东西伯利亚地区人口已明显增加，每年的茶叶消费量在 80000 箱左右。交通状况亦较前有所改善。这条航线茶叶自汉口起运，经吴淞口海路直达黑龙江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全长 6000 里水路，再从这里改用黑龙江航运公司的内河轮船，分送到东西伯利亚各地，路程是十分便捷的。而茶叶经汉口—天津—恰克图陆路运到东西伯利亚各地，特别是俄属黑龙江地区的时间平均超过 12 个月。“如果使用轮船，即可缩减为 70 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箱茶叶省去 6 个卢布的运费”。^①同年 8 月，“黑龙江航运公司”的《尼古拉号》驶入汉口，年底满载茶叶由汉口出发，出吴淞口，直达尼古拉耶夫斯克。不久，该公司的另一艘海轮也开进汉口。在汉口地区经营茶叶的托克马托夫和舍韦廖夫公司也参加了向俄国远东运茶的行列。“公司向符拉迪沃斯托克、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及其附近的居民运送茶叶”。^②“黑龙江航运公司”最初几年每年“经阿穆尔河运到俄国的茶叶大约是 15 万普特，但不到 5 年，就减到 1.5 万普特以下了”。^③这一次之所以又失败了，其原因就在于如前所述的黑龙江及尼古拉耶夫斯克海湾的封冻期过长，均在半年以上。有时汉口装好的茶叶因江海封冻无法运送，自然影响效益。另一方面，茶叶经黑龙江运到俄国西伯利亚人口较稠密，茶叶消耗量大的中心城市伊尔库茨克等地十分不便，不如经恰克图入境的中国茶叶来得及时。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公司经营上的原因。萧条了几年之

① 《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节。

② 加·尼·罗曼诺娃：《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远东经济关系》，中译本第71页。

③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第7页。

后，由于俄国茶叶消耗量与日剧增，八十年代以后，沿黑龙江向俄国转运的中国茶叶数量再次上升，并且超过了七十年代。“1887年为20万普特以上”。^①

除了俄国商人经黑龙江向俄国境内转运的中国茶叶外，当地的华商也向俄国出口少量中国茶叶，主要供沿边境一带的俄国人消费。八十年代初，俄国远东地区的人口增加，工业也有了明显发展，使得沿黑龙江两岸的贸易日趋活跃起来。形成了以瑷珲，黑河屯和北岸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引者）为中心的贸易点。这一时期，中国黑龙江地区向俄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粮食和牲畜，茶叶比重不大。由瑷珲和黑河屯起沿黑龙江向下，两岸人烟稀少，除免税的民间贸易外，数额不大。“1893年，价值102000卢布的各类食品（主要是茶叶和面粉）及4600卢布的各种工业品由黑龙江地区运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港口”。^②1895年运往哈巴罗夫斯克的153520.07卢布的中国商品中，茶叶亦占有一定比重，但是与俄国经由黑龙江转运的中国茶叶数量毕竟是不能相比的。

八十年代以前，乌苏里江沿岸的贸易远不如黑龙江沿岸。九十年代初，随着俄属乌苏里地区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成为远东经济和军事重镇，该地区的贸易额也有明显增长。据记载，1891—1895年间每年的贸易额平均超过200万卢布，双方各半。以货易货。出口商品主要是粮食和牲畜，此外还有中国布和日用生活品，包括中国茶叶。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85页。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85页。

黑龙江上游及额尔古纳河沿岸相对人口稀少，工业落后，交易额不大。但中国茶叶，特别是砖茶已成了这一地区的俄国哥萨克、当地蒙古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在为数不多的贸易额中茶叶占有重要比重。据《满洲概况》记载，1894年额尔古纳河俄属查干—奥鲁伊、杜罗伊、卓尔果尔三个哥萨克村屯共进口了价值12261卢布的砖茶，占全部进口中国货87454卢布的15%以上。^①该地区的贸易中心是中国境内的呼伦贝尔地区的甘珠尔庙（即寿宁寺）和海拉尔。据《黑龙江衙门档案》记载：光绪三年（1876年）有俄商10起，共计俄国人50名前往海拉尔贸易，又有俄人7起，共计30人前往寿宁寺地方贸易。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分别增至俄商81起，俄国人643名及俄商22起，俄国人173名。光绪十二年（1887年）再增至俄商105起，俄国人995名及俄商28起，俄国人176名。^②从入境的俄商人数逐年增加看，当地的小额贸易有所发展，俄商也是获利的。俄商在集市上出售牲畜和少量俄国厚布，主要采购中国土布，粮食和茶叶。

① 波兹德涅耶夫：《满洲概况》，彼得堡1897年版，第1卷第552页。

②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卡伦处本年办过事件折》，（光绪三年、十一年、十三年）。

第五章 十九世纪末至十月革命 茶叶贸易的消长

第一节 中国茶叶出口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一、印度、锡兰等地茶叶对中国茶叶市场的冲击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出口茶叶的国家，中国茶叶或者直接，或者通过西方茶商输往世界五大洲。为了获取茶叶利润，西方殖民者开始把中国茶叶引进其殖民地。最早将中国茶种引到国外的当属荷兰。据记载，172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茶籽到爪哇试种，由于种种原因先后失败。后经反复试种，终于在1826年左右获得成功。英国在取代了荷兰垄断了东印度公司以后，1780年从广州引进少量中国茶籽在印度加尔各答地区试种。1788年，英国科学家班克斯提议大量引进中国茶籽在印度种植，并为此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种茶情况的小册子。指出印度的比哈尔、兰格普尔、可茨比哈尔等地区很适宜种茶。但因他的计划与当时东印度公司统制华茶贸易专利的政策有抵触，未能实现。1834年，印度总督本廷克组织茶叶委员会，并派该会秘书戈登来中国调查栽茶制茶方法。他到中国后乔装打扮混入中国内地。1835年购得大批武夷茶籽，分三批运回加尔各答，并同时聘用中国茶师到印度传授栽茶制茶方法。“戈登第一次从中国运回的茶籽在加尔各答植物园中育成42000株茶苗。这批茶苗于1835-1836年分别移栽于上阿萨姆省20000株，喜马拉雅山的

古门和台拉屯 20000 株，剩下 2000 株移植于南印度的尼尔吉利山。除这 42000 株分配给各国营茶园外，还有 9000 余株分配给 170 个私人植茶者”。^①1836 年，中国茶工在阿萨姆勃鲁士茶叶工厂仿照中国方法，试制样茶成功，在英国引起轰动。1839 年，英国在阿萨姆创办了茶叶公司。1841 年，锡兰首次从中国引进茶籽，并聘请中国茶工试种获得成功。1854 年成立了茶叶种植者协会。到 1867 年锡兰已有茶园 20 英亩。与此同时，锡兰还从印度引进阿萨姆种茶叶进行试种。1861 年明治维新后，军事封建主义的日本也开始大量种茶。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锡兰岛和爪哇岛的采茶季节几乎延续一年，印度也在九个月以上。更主要的是，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使用先进的机器加工制造各类茶叶。殖民者利用廉价的劳动力，采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迫使种植园里的茶叶工人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只给予极其微薄的工资。资本家用获取的高额利润扩大再生产，改进技术，生产出的茶叶自然要廉于经过层层封建盘剥而生产出的中国茶叶。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同中国竞争，英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英国政府大大提高了中国茶叶的进口关税，迫使英商缩减了在中国采购茶叶的数量。八十年代以前，每年华茶运销到英国（不包括香港，销往香港的茶叶占华茶出口数量的 20% 左右。）的数量均在华茶出口量的 60% 以上，1880 年开始下降。从 1883 年起更呈逐年递减的态势。

1883—1911 年间运销到英国的茶叶占中国茶叶出口的百

^① 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0 页。

分比为①：

年 份	百分比
1883 年	58.68
1884 年	54.60
1885 年	55.96
1886 年	49.85
1887 年	46.09
1888 年	40.03
1889 年	40.61
1890 年	33.92
1891 年	31.11
1892 年	31.83
1893 年	27.53
1894 年	23.00
1895 年	18.54
1896 年	18.20
1897 年	20.76
1898 年	18.03
1899 年	18.83
1900 年	15.33
1901 年	17.11
1902 年	13.04
1903 年	19.56
1904 年	33.24

① 刘廷冕：《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及百分数》，载《统计月报》。

1905年	32.17
1906年	12.72
1907年	15.93
1908年	13.19
1909年	12.71
1910年	15.38
1911年	18.07

其中1904年和1905年有较大回升，是因为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在华采购量减少的缘故。与此同时，受英国政府的影响和限制，澳大利亚进口的华茶数量也锐减。如，1888年占8.78%，1898年占2.94%，到1908年就仅占0.39%了。

1911—1917年间华茶运销到各国的百分比如下^①：

年份	国别					
	英国	香港	澳大利亚	美国	俄国	其它
1911年	10.10	7.97	0.55	8.96	56.53	15.89
1912年	6.61	6.47	0.73	10.63	56.67	18.89
1913年	5.28	7.17	0.77	9.97	62.83	13.98
1914年	9.41	5.81	0.52	11.40	60.35	12.51
1915年	9.54	6.66	0.86	7.73	65.24	9.98
1916年	7.79	8.40	0.16	9.44	68.06	6.15
1917年	3.11	6.97	0.05	15.25	65.18	9.44

其次，英国政府准予其殖民地印度出口的茶叶免征税银。“锡兰不特免税，每磅并津贴银三分五厘，约合每担津银四两

^① 《华茶对外贸易之回顾与前瞻》，第18页。

之多”。^①这样，尽管印度、锡兰茶叶的质量不如中国茶叶，但由于价格低廉，一经在国际市场上出现，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出口量不断增加。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印度和锡兰出口茶叶合起来已超过中国出口的茶叶。到二十世纪初，仅印度出口的茶叶就超过了中国出口的茶叶。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甚至连小小的锡兰岛供出口的茶叶都超过了中国。显而易见，中国茶叶的出口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1896—1917年间中国、印度、锡兰茶叶出口数量如下(磅)^②：

年份	中国	印度	锡兰
1896年	228321705	236090328	171558110
1897年	212879467	150421245	110095194
1898年	215984267	152344905	114460318
1899年	224874134	158539488	122395518
1900年	196461600	177163999	129661908
1901年	162130533	192300658	149264603
1902年	206739333	182594356	144275608
1903年	224421467	183710931	150829707
1904年	193860666	209551150	149227236
1905年	182936800	214300325	157929333
1906年	187170262	216770366	171256703

① 《商约大臣盛宣怀奏请减茶税》，载《光绪政要抄本·实业三》。

② 《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2号，第4—5页。

1907年	214962266	228187826	181126198
1908年	210151466	235089126	181436718
1909年	199792400	150521064	189585924
1910年	208106677	256438839	186925117
1911年	195040400	263515774	184720534
1912年	197560000	281815329	186632380
1913年	191534133	291715041	197419430
1914年	198463200	302556697	191838946
1915年	237438667	340433163	214900383
1916年	205520533	292593938	208090279
1917年	150051999	360631933	195231592

再从中国本身来看。如前所述，清政府实行的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政府垄断规模巨大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专供封建官僚贵族享受的产品，并不鼓励开拓国内外市场。仅仅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鸦片战争后，虽然清朝政府被迫开放了沿海几个口岸，但大部分对外贸易还是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仍然禁止中国商人到海外贸易，这就与资本主义国家奖励和支持商人开辟国内外市场的作法相去甚远。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闭国家。受沉重剥削的广大劳苦大众生活在贫困线上，被摒弃于市场之外，造成了国内市场的狭小，反过来又束缚了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沉重压榨下的中国茶农的景况更是江河日下。“中国产茶之处，系在荒山参差之地，又皆山户贫苦之民，无力培修”。^①自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第103页。

然也就无力改进技术，有效地扩大再生产。此外，清政府在内地茶区设立层层关卡，对运销过程中的茶叶征收重税。据九江关税务司辛盛申呈总税务司的《访察茶叶情形文件》记载：“中国茶叶，自出产之地至出口之时，其厘金关税过重。查得内地之茶，运至本口〔九江〕，其江西宁武茶，则先在宁武完厘金，每百斤捐银壹两肆钱，姑塘每百斤捐银肆钱，出口关税银每百斤贰两五钱，是宁武茶每百斤共征厘税银肆两三钱。河口茶则先在河口完厘金，每百斤捐银壹两贰钱五分，姑塘每百斤捐银肆钱，出口关税银每百斤贰两五钱，是河口茶每百斤共征厘税银肆两壹钱五分。今比较其厘税两项，与茶叶所售之价值，每百两约抽二十五两矣”。^①再以汉口茶叶的税率为例，商人每贩运一担茶叶需交山厘银六钱五分，纳运厘银一两二钱五分，地方公事善举等抽银一钱余，总计合银三两以上。此外，伕脚、船力及箱罐、制造人工饭食等每担还须银五两之多。而下等茶叶售价每担不过四、五两，结果竟出现了“纵其茶不用价买来，尚差二、三两方足弥缝厘金缴用之数”^②的怪现象。结果“贩运商人，血本全糜，多难再举”。^③

十九世纪末，茶叶作为世界第一大饮料日益普及。然而，在世界茶叶消耗量大大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的茶叶出口却在连年递减。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在达到了2217200担的最高纪录后，开始逐年下降。从1889年降至200万担以下之后就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第307页。

②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第308页。

③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第102页。

一直在 100 多万担徘徊。

1886—1918 年间华茶出口数量(担)①:

年 份	数 量
1886 年	2217200
1890 年	1665396
1895 年	1865680
1896 年	1712841
1897 年	1552158
1898 年	1538600
1899 年	1630795
1900 年	1384324
1901 年	1157993
1902 年	1519211
1903 年	1677530
1904 年	1451249
1905 年	1369298
1906 年	1404128
1907 年	1610125
1908 年	1576136
1909 年	1498443
1910 年	1560800
1911 年	1462803
1912 年	1481700
1913 年	1442109
1914 年	1495798

① 刘廷冕：《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及百分数》，载《统计月报》。

1914年	1782353
1915年	1542633
1916年	1125535
1917年	404217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茶叶出口状况恶化了。但由于俄国采购的中国茶叶一直呈增长趋势，使中国茶叶的出口仍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从而延缓了中国茶叶出口的衰落速度，同时也为俄国全面控制中国茶市创造了便利条件。十月革命后，一俟俄国停止采茶，中国茶叶出口立即跌入了新的低谷。

二、俄国对中国茶市的全面控制

正当印度、锡兰、爪哇等地的茶叶大量抛向国际市场，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逐步退出中国茶市的时候，俄国不仅仍然保持着巨大的采购量，而且加紧了对中国茶市的全面控制。之所以如此，是有其原因的：

1.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生产和出口砖茶的国家。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砖茶消费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每年平均的消费量就在30万担以上，进入二十世纪更高达到40—60万担。据统计，二十世纪初仅汉口的俄商砖茶厂每年生产的砖茶就高达40—50万担，这些砖茶几乎全部是销往俄国的。

据不完全统计，1901—1905年间汉口地区的俄国砖茶厂每年生产的砖茶数为（箱）^①：

^① 根据武汉市档案馆藏：《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工商改造类》，第117宗130目第1183页整理。

洋行名	年 份				
	1901 年	1902 年	1903 年	1904 年	1905 年
新 泰	54788	57172	110541	78364	106378
阜 昌	122110	76135	96200	108731	97760
顺 丰	98449	85979	69505	73889	80322
百 昌	5220	51507	52279	57839	16483
源 泰	8188	15064	20474	15810	3504
天 裕	26700	35129	34381	33196	21916
宝顺慎昌	45398	36793	37907	37303	20204
吕 泰	6300	7681	40864	57110	12126
怡 和	14290	19504	13815	29661	10676
祥 泰	7522	8412	8955	5323	5358
美 昌	—	—	—	—	3815
巨 昌	14424	18270	10495	—	—
合 计	403390	411686	495416	497226	377552

俄国商人在中国加工制造、贩运回国的砖茶约占俄国每年进口华茶的 40% 左右，最高年份甚至超过 50%。中国出口砖茶的 90% 以上销往俄国，其中十九世纪最后十年运往俄国的砖茶占中国出口砖茶的 95.9%，1901—1917 年间占 94.8%^①。俄国进口的砖茶除在华的俄商砖茶厂自己生产的而外，也有少部分是华商或英商茶厂生产的砖茶。砖茶在俄国茶叶总消耗量中占如此之大的比重，一是与俄国人的饮茶习惯分不开的；同

① 刘廷冕：《近五十年来华茶出洋之指数及百分数》，载《统计月报》第 30—31 页。

时也与俄国政府对进口砖茶的优惠政策有关。

2.俄国海运极不发达。虽然印度、锡兰等地的茶叶在一定程度上比中国茶叶便宜一些，海路运费又十分低廉，但是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俄国并未在印度和锡兰采购茶叶，主要原因之一是俄国海运极不发达。俄国本身拥有的商船数量少，吨位有限，常常不得不雇用外国的商船，或在伦敦的茶市购买英国人的转口茶，利润被其所夺，从而影响了俄国茶商的兴趣。从八十年代起，一些富有的俄国茶商开始在加尔各答开设俄国茶叶商行分行，而大部分无能为力的中小茶商仍然只能在中国采茶，或者通过在加尔各答的英国代理人购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中国通往欧洲的海路遭到破坏，俄国才转而大量向印度和锡兰购茶。

3.熟悉中国情况，垄断着中国茶市。印度、锡兰等地茶叶出现在国际市场之时，俄国已在中国大量采购茶叶一个多世纪，对中国内地产茶区的情况十分熟悉，有一整套的机构控制着中国茶市，同时又享受着减免税的优惠待遇。

4.俄国人独占着一条令西方商人羡慕不已的陆路商道。如前所述，汉口—天津—张家口—恰克图的这条运茶之路对俄国是一条十分便捷而有利可图的路。这条路既无外国竞争者，又可享有关税的优惠。通过该路运到俄国的茶叶不仅满足了广阔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大市场对中国茶叶的需要，使俄国政府及其商人获取了极为可观的利益；而且通过这条路线运到欧俄乃至欧洲大陆的中国茶是质量极优的陆路茶，不同于经海路运去的茶叶，因此有特别的市场。如果从印、锡将茶叶运到欧俄，再经陆路转运到西伯利亚，不仅难以获取所需的大量砖茶，即便是叶茶也因时间长，商人资金难以周转，费用并不比陆路低，而且其味道亦不如陆路茶。

上述种种原因使得在印度、锡兰茶叶的冲击下，中国茶叶出口日渐衰落的情况下，俄国进口的中国茶叶从数量上说不仅未降低，反而有所增加。

1880-1917年的40余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几乎增加了两倍（担）^①：

年 份	担 数	每五年的年平均输出量
1880年	357325	
1881年	380714	
1882年	386914	
1883年	404478	
1884年	448334	
1885年	432315	410551
1886年	599177	
1887年	607376	
1888年	675177	
1889年	536494	
1890年	585349	600715
1891年	636407	
1892年	541519	
1893年	683744	
1894年	757293	
1895年	919760	707745
1896年	922003	
1897年	876251	

^①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年5-7期。

1898年	941167	
1899年	931110	
1900年	665686	867243
1901年	593734	
1902年	882893	
1903年	787274	
1904年	424156	
1905年	600599	657731
1906年	939181	
1907年	988711	
1908年	965032	
1909年	917317	
1910年	974295	956907
1911年	826841	
1912年	839689	
1913年	905967	
1914年	902716	
1915年	1162842	927611
1916年	1049933	
1917年	733653	

1901-1905年这五年比前一个五年的年平均数降低了20多万担，是因受义和团起义和日俄战争的影响。而下一个五年，即1906-1910年又增加了30万担。1915年和1916年这两年，每年超过了100万担。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出口到俄国的茶叶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二十世纪初至十月革命除日俄战争期间而外，所占比例增至60%以上。

与此同时，当更为廉价的印度、锡兰和爪哇等地的茶叶抛

向国际市场时，为利所趋的俄国茶商也在极力设法打入印、锡茶叶市场，试图找到比中国更为有利可图的茶叶。从九十年代起俄商开始采购锡兰和印度茶，并逐渐增加了采购量。

1900—1912年间俄国在锡兰采购的红茶数如下（英磅）^①：

年 份	数 量
1900年	10769000
1901年	13474000
1902年	19299000
1903年	19950000
1904年	15924000
1905年	19624000
1906年	25810000
1907年	30580000
1908年	29342000
1909年	27742000
1910年	32231000
1911年	28111000
1912年	25839000

同一时期俄国从印度采购的红茶数如下（英磅）^②：

- ①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年5-7期。
- ②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年5-7期。

年 份	数 量
1900 年	2070000
1901 年	2719000
1902 年	7233000
1903 年	13329000
1904 年	14111000
1905 年	14575000
1906 年	25430000
1907 年	30322000
1908 年	28204000
1909 年	36716000
1910 年	44767000
1911 年	35504000
1912 年	47569000

而 1903-1914 年间从爪哇岛采购的叶茶数量为 (英磅)①:

年 份	数 量
1903 年	61000
1904 年	1440000
1905 年	4140000
1906 年	4392000
1907 年	4140000
1908 年	3276000

①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年5-7期。

1909年	1656000
1910年	792000
1911年	2005000
1912年	1467000
1913年	4839000
1914年	3573000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即1904-1913年期间，俄国每年平均从中国进口67.4%的茶叶，而从其他茶叶市场进口32.6%。具体分配如下（英磅）^①：

市场	每年进入俄国的茶叶	所占百分比
中国	118104000	67.4
印度	29053000	16.6
锡兰	25515000	14.3
爪哇岛	3028000	1.7
总计	175700000	100

然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五年及大战期间，即1908-1917年间，俄国大大加快了在其他国家的采购量，从锡兰、印度、爪哇进口的茶叶在总和上已经超过了中国茶叶。^②

①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年5-7期。

②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年5-7期。

市场	俄国平均每年的采购量		所占百分比
	英 磅	俄 磅	
中 国	47054000	51759000	40.2
印 度	38552000	42407000	33.0
锡 兰	28653000	31518000	25.3
爪 哇	1839000	2022000	1.5
总 计	116098000	127706000	100

虽然俄国在中国采购的茶叶数量仍在增加，但其国内茶叶消耗量增长更快。二十世纪初，俄国每年需进口 2 亿俄磅茶叶，到了大战期间增至 3 亿俄磅。不难看出，世界茶市的茶叶正在排挤着中国茶叶的出口。

值得说明的是，俄国曾在印度、锡兰采购大量廉价红叶茶运到中国，加入到中国茶中混合制造砖茶，这给中国红茶的销量带来巨大损失。外国茶参与国际茶市的激烈竞争，给中国茶叶出口带来了严重危害。一俟俄商停止在中国采购茶叶，就给中国茶叶的出口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917 年中国出口茶叶尚有 1125535 担，翌年就立即降到 404217 担了。

三、俄国引种中国茶籽及其对中俄茶叶贸易的影响

十九世纪初，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数量急剧增长。饮茶之风不仅在辽阔的西伯利亚迅速普及，而且扩展到欧俄，特别受到黑海沿岸居民的喜爱。俄国政府及其茶商均在茶叶贸易中获取了可观的收入。为获取更大的利润，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当局开始在温暖的黑海沿岸试种中国茶叶。据记载，1847 年高加索总督乌热特佐夫下令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城市赫尔松的植物园里试种茶叶，开了欧洲大陆种茶之先河。然而，由于受气

候、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最初的几十年里累累失败，效果一直不佳。

“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我国汉口运去12000株茶苗和成箱茶籽，在查克瓦——巴统附近开辟了一个小茶园，从事茶叶栽培。制成的茶叶品质良好。这时候在苏呼米也有两所规模不大的茶场采制茶叶”。^①1888年，波波夫茶叶贸易公司总经理波波夫来中国考察茶叶种植技术，几年后回国时采购了数百普特茶籽和几万株茶苗，并聘请了以刘峻周为首的10名技师赴俄国传授种茶技术。^②1893年11月，刘峻周等人开始在巴统的茶园里工作。三年期间，他们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完全按照中国的形式建立了俄国的第一座小型制茶厂，配置了揉捻机、碎叶机、干燥机、分筛装箱机等制茶机器，生产茶叶，大获成功。

波波夫来中国的第二年，即1889年，吉洪米罗夫教授又率考察团来中国，并雇用13名中国茶工，到俄国传授种茶制茶之法。回国后，吉洪米罗夫“在巴统附近的查克瓦、沙里巴乌尔、凯普烈素等地开辟茶园15公顷，后来扩充到115公顷。”^③与此同时，吉洪米罗夫在沙里巴乌尔建立一座小型茶厂，在查克瓦也建立了茶厂。由于当时中国技工尚未到来，生产的茶叶质量不佳。这使俄国人进一步认识到聘请华人茶师的重要性。

从1893年起，在中国茶师的指导之下黑海沿岸的种茶业有了长足进展，并开始较大规模地种植茶叶。是年，仅波波夫

① 陈椽：《茶业通史》，第92页。

② 陈椽：《茶业通史》，第92页

③ 陈椽：《茶业通史》，第92页。

茶叶公司就种茶 385 亩。

1896 年，刘峻周等 10 名茶师合同期满，由于他们的出色工作，波波夫一再挽留，并嘱其回国后再为之招聘中国茶师来俄国。翌年，刘峻周及其招聘的中国茶师计 12 人携带家眷来到巴统。在中国茶师的指导之下，到 1900 年，仅阿扎里亚就有茶园 150 公顷。^①“巴统北部内地之高塔斯设立试验茶区 25 所”。^②二十世纪初，黑海地区的茶园面积继续增加，“至 1905 年，已有茶园 40 余所，栽培面积增至近 1125 亩。1913 年，茶园总计达 147 所，栽培面积达 2400 亩”。^③刘峻周因帮助俄国发展茶叶生产功劳卓著，不仅受到俄国人民的爱戴，也受到俄国政府的嘉奖。1909 年，俄国政府授予他三级勋章，1912 年又获“俄罗斯亚热带植物展览会”奖。

显而易见，俄国的茶叶生产是依靠中国的种籽和技术发展起来的。到二十世纪初，种植茶树之风在该地区蔓延开来，巴统等地的一些地主多数自家种植 1-2 亩茶树，大茶园也很快发展起来。茶园面积累计可达数千亩之巨。据威廉·乌克斯统计，每亩可产茶 170-200 磅。^④年产茶叶可达 4-5 万担，约占当地进口中国茶叶的 1/5—1/3 左右，这不能不说对中俄海路茶叶贸易是一个不小的影响。但如果与俄国每年进口中国茶叶 60-70 万担之数相比，俄国自己生产的茶叶仍占极少数。因此可以说，俄国茶叶生产的发生和发展，并未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巨大威胁。相反，黑海沿岸茶叶生产的发展，进一步刺

① 陈椽：《茶业通史》，第 93 页。

②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第 102 页。

③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第 102 页。

④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第 102 页。

激了当地居民的消费量。从长远的观点看，俄国茶叶生产的发展，又不能不给中国茶叶的出口带来潜在的危机。

第二节 恰克图边关互市的全面萎缩

一、俄国单方面陡起增税对买卖城华商的打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恰克图边关互市的总额已经十分微小，并且仍呈下降趋势。十九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西方列强加紧了对殖民地市场的争夺。英、德、日、美、法等国早对俄国独占着对中国的陆路贸易十分眼红，便纷纷涌入内陆的恰克图及其附近市场。因其商品在质量、包装上优于俄国商品，而价格又较之俄国低，尤其是日本商品，虽然质量不高，但适合当地人口味，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遂使“俄国所苦心开拓之市场，多被彼等外商所夺”。^①而俄国商品，渐被驱逐出恰克图市场。不仅如此，西方商品乘机打入俄国西伯利亚市场。俄国政府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维护其在恰克图市场的地位及西伯利亚的国内市场，乘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之机，对恰克图等地进入俄国的中国货及其他外国货征收重税。以中国茶叶为例，“红茶以分合税1分，重华秤11两2钱，每分收俄洋62.5文。计茶1箱，原本不过42-43两，税银约需45-46两。……砖茶并按每分6文1.5厘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②俄国政府对华商入境茶叶陡起高税，无疑使原已萧条的恰克图交易雪上加霜，“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

① 《俄蒙贸易最近之情况》，载《民国经世文编》第2719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为华商运送茶糖俄收税款共重应照章免税事给俄使照稿》（外务部档）。

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①为此，库伦办事大臣多次会晤俄国驻恰克图领事，清政府外务部也照会俄国驻华公使，要求俄国立即停止征收高税，“否则两国货物均应有税，方昭公允”。^②

一波三折，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俄国政府又借口改订税则，再次“陡起苛税”。根据新订税则，对华商贩运入俄境的商品征收的税银超过成本数倍，并且大大高于前次。恰克图华商贩运到俄国的中国商品，一向在贝加尔湖一带销售。贝加尔湖西北地区人口较密，工业亦较发达。华商贩运到该地的中国茶叶及丝水等货虽须纳税，因税率不高，华商仍有利可图。陡起苛税之后，税率大大超过成本，销路断绝。贝加尔湖东南地区，虽则“地瘠民贫，不能多销”，^③但“尚能求觅蝇头之路，可以支持，不至于废业失所”。^④俄国擅自更定新税章后，贝加尔湖东南地区凡超过百里之处均须交纳高税，甚至百里之内亦有收税者。库伦办事大臣在致清政府外务部的奏折里明确指出：“似此该国重征其税，致使商民等何能运贩，俨然致无营幹。将见不需数年，皆得歇业西归。可怜将众商等借以养贍身家之路，一旦断绝”。^⑤1909年夏，俄方又单方面取消中俄边境百里之内免税的规定，一概从重征收，结果严重影响了恰克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为俄商运送茶糖俄收税款其重应照章免税事给俄使照稿》（外务部档）。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为俄商运送茶糖俄收税款其重应照章免税事给俄使照稿》（外务部档）。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库伦办事大臣致外务部：俄人征税致恰克图商困情况由》（外务部档）。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库伦办事大臣致外务部：俄人征税致恰克图商困情况由》（外务部档）。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库伦办事大臣致外务部：俄人征税致恰克图商困情况由》（外务部档）。

图地方与俄国相邻地区的贸易关系，造成了“半载以来，华商销数已减至十之八九”^①的局面。

由于清政府未在恰克图设关抽税，中国茶商在恰克图出售给俄商，或直接运往俄境的中国茶叶数量无据可考。据俄国驻库伦领事报告，1910年华商经恰克图输往俄国的中国商品价值为93万卢布，“内计有各色茶50万卢布”。^②这一数字大体反映了当时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的情况。与此同时，在免税的情况下俄国经恰克图输入到中国的商品数量陡增。这便是俄国货行销中国无税，中国货行销彼处重税加之所造成的结果。

1896-1917年间俄国经恰克图输入到中国的商品价值为(海关两)^③：

年 份	价 值
1896 年	3368
1897 年	1160
1898 年	665
1901 年	8885
1903 年	2716
1906 年	654
1908 年	3033454
1909 年	6121316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农工部致外务部：张家口商务总会禀恳转商俄使减税事请查核办由》。

② 德俄股股员范绪良译：《库伦领事报告：去岁蒙俄商务情况》。

③ 杨端六、侯培厚：《六十五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统计》，第103页。

1910年	8888509
1911年	9345982
1912年	11787535
1913年	12258180
1914年	11298529
1915年	6790294
1916年	6735186
1917年	2933515

显而易见，恰克图输往中国的俄国商品是在1908年俄国“陡起苛税”之后开始猛增的。进出口货值的极端不平衡，反映了双方贸易交往的不平等性。

处在极端困境之中的恰克图华商，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将中国茶叶及其他土货赊给俄商，俄商却常常以各种借口拖延不还，造成许多纠纷，华商为此大伤脑筋。为了讨回欠款，有时不得不求助于地方官帮助。据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库伦办事大臣奏折称：宣统二年十一月（1910年）有“俄商米得尔样夫等5家欠华商银62万余两，延抗不还，请按约追索”。^①实际这笔欠款是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899-1901年）间俄商欠华商的红茶、砖茶、丝绸等款。虽经华商反复催要，收效甚微。库伦办事大臣为此感叹道：“知我华商在恰与俄贸易，曾受俄人坑骗银60余万两之数也。实不悉尚能追偿与否”？^②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库伦办事大臣咨送商民贾济昌等原禀并俄商噶尔约克等所欠华商账项清册由》（附原禀）。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库伦办事大臣咨送商民贾济昌等原禀并俄商噶尔约克等所欠华商账项清册由》（附原禀）。

这一时期，被俄商欠账不还的华商不下几十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政府从西伯利亚地区抽调大批人力赴欧洲参战，并调去大批物资，致使西伯利亚工商业衰落，可供出口到恰克图的俄国商品极为有限。从1915年起，俄方通过恰克图输往中国的商品开始减少，1917年已不及1913年的四分之一。又由于俄国陡起高税，恰克图的华商已无利可图，纷纷倒闭歇业。至此，恰克图除作为俄国向中国出口商品和进口中国茶叶的陆路口岸外，作为中俄双方二百余年，并曾极大兴旺过的恰克图边关互市至此已不复存在了。

二、天津—恰克图转口陆路茶叶贸易的继续增长

中日甲午战争前，经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数量最多的两年是1887年和1888年。1887年经汉口—天津—恰克图陆路输往俄国的茶叶为444637担，经樊城—太原—恰克图传统陆路输往俄国的茶叶为174922担，合计619559担；而1888年经上述两路输往俄国的茶叶分别为463325担和245433担，合计708758担。^①就价值而言，这两年分别为5704000海关两和4699000海关两。^②1887年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少于1888年，价值却高于后者，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1887年中国茶叶的出口价高于1888年；其二、1887年经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中除大宗茶叶外，其他商品多于后者。甲午战争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继续大幅度增加。1896—1899年的价值为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年）》，第2册第1283页。

② 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版。

(海关两)①：

年 份	价 值
1896 年	8315583
1897 年	9469847
1898 年	9795790
1899 年	9987706

苏联学者斯拉德科夫斯基据此认为：“彼得堡条约签订后，恰克图贸易大大扩展，并在以后的全部岁月中相当稳定”。②但这里必须说明一点。所谓“大大扩展”和“相当稳定”是指俄国商人由中国内地贩运来的茶叶经恰克图转运回俄国，并非华商在恰克图出售给俄商的中国茶叶。俄国政府一向在恰克图设关抽税，统计由此进入俄国的中国茶叶。而这种统计并不分别俄国在恰克图华商手中采购的，还是俄商在中国内地采购、加工制造、贩运经恰克图转运回俄国的。正因为这条传统的陆路运茶路线有极大优势，俄国国内的茶叶消耗量又逐年增加，恰克图这条二百多年的黄金通道一直占最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即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一直在向前发展着，直到俄国十月革命。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影响了天津-恰克图对俄国转口的茶叶贸易。接着俄国又爆发了1905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内的动荡也影响了中俄间的

① 杨端六、侯培厚：《六十五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统计》，第103页。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269页。

茶叶贸易，直至 1908 年后才有所恢复。这期间虽较十九世纪末叶有明显下降，但仍能保持在每年数百万海关两的高水平上。

1900—1917 年间经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货物价值如下（海关两）^①：

年 份	价 值	占输入俄国商品总数百分比
1900 年	832461	6.7
1901 年	1701814	18.3
1902 年	4267090	39.1
1903 年	6383793	49.9
1904 年	2203129	43.5
1905 年	2923478	30.9
1906 年	2565250	13.7
1907 年	1249371	7.3
1908 年	3214995	10.9
1909 年	4786311	10.5
1910 年	5019746	10.9
1911 年	3114124	6.1
1912 年	3639877	8.5
1913 年	3095826	7.1
1914 年	3965980	9.2
1915 年	6246169	10.5
1916 年	20444813	31.2
1917 年	13438274	29.0

^① 根据杨端六、侯培厚：《六十五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统计》整理。

如果我们拿天津输往恰克图的货物总值、天津输往恰克图的茶叶总值与中国经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货物总值相比较，就会清楚地发现，中国经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货物几乎全部是经天津输往恰克图的中国茶叶。以权威的海关统计为例，1896年-1904年分别为（海关两）^①：

年 份	天津输往恰克图的茶叶总值	天津出口到恰克图的商品总值	中国经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货物总值
1896年	8291052	8315356	8315583
1897年	9439649	9469847	9469847
1898年	7754640	7788583	9795570
1899年	9960426	9987706	9987706
1900年	636820	636820	832461
1901年	1554473	1557473	1701814
1902年	4027828	4031230	4267090
1904年	2189874	2189874	220312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需要大量茶叶供应军队，1915-1917年间经恰克图输入到俄国的茶叶再度大幅度增加。1916年创下了恰克图有史以来茶叶转口贸易的最高纪录，突破了2000万海关两，1917年仍有1300多万海关两。然而，十月革命之后，由于俄国骤然停止了采购，恰克图对俄国转口的茶叶急剧缩减。至此，恰克图不论是作为中俄边关互市之地，还是作为俄国进口中国茶叶的陆路口岸都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兴旺了二百多年的恰克图遂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边境小镇。

^① 根据海关总税务司历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整理。

第三节 西北与东北边疆省份 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一、新疆出口茶叶的减少

经过清政府的精心治理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到十九世纪末，新疆政局稳定，经济恢复并有所发展，人口增加，商品流通额成倍增长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商人纷纷携带内地商品涌入新疆，其中尤其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南、湖北、四川最多，号称八大帮。新疆商务的繁荣给当地的中俄贸易带来新的契机。据长期驻新疆领事馆的俄国官员鲍戈亚夫连斯基统计，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经俄商之手每年进出口的商品价值为 1500 万卢布，经华商之手每年进出口的商品价值为 500 万卢布，贸易总额可达到 2000 万卢布^①，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 4 倍。中国略有出超。1896 年，俄国在乌鲁木齐设立总领事馆，并建立贸易圈，十几年内俄国商号由最初的几家增至 30 余家。^②十九世纪末，俄国政府又先后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和乌鲁木齐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分行。该银行大量发行纸币，垄断了新疆的金融大权，市面交易非卢布不通。西北地区的俄国商人迅速增加。据统计，仅伊犁地区就有俄国商民 3300 多人，塔城地区有 3800 多人。^③从 1905 年起中国出现入超。

①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 203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新疆候补同知李晋年说帖五条》。

③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民国 25 年版，第 469 页。

1905-1909 年的贸易额 (两):

年 份	贸易总额	人 超
1905 年	4260773	473405
1906 年	6462504	700368
1908 年	6997985	
1909 年	7547007	

到二十世纪初，中俄新疆地区的贸易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民元间，百物荟萃，莫不咸备。起居服用，几渐俄化，俄商亦林林总总，漫布天山南北。”^①由于西北地区对俄全面开放，俄商在该地区享有免税贸易等一系列优惠待遇，而俄国并未开放其相邻地区，使得中国西北地区的贸易一直掌握在俄国人手中。俄国人自己对此也承认不讳。鲍戈亚夫连斯基说：“从中国西部地区向俄国境内的进出口贸易主要掌握在俄国人手中。中国商人在这一贸易中起的作用比较说来不大。因此，当谈到中国西部地区同俄国的贸易时，自然指的就是参加贸易的俄国人及他们的贸易资金”。^②

这一时期新疆向俄国出口的茶叶已不占重要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俄商已经独占了汉口——天津——恰克图和汉口——兰州——嘉峪关两条运茶的最佳陆路通道。俄商深入到中国内地产茶区自行采购、加工制造、贩运茶叶回国，不必再大量从中国新疆的茶商手中购买，又享有减免税的特权，而“我商必由张家口通戈壁，险阻崎岖，时间迟，运费

① 吴绍璜：《新疆概观》，民国22年版，第275页

②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175页。

重，故卖价不得不高”。^①华商自然无法与俄商平等竞争。正如恰克图茶叶贸易的衰落一样，新疆茶叶出口的衰落也是历史的必然。此外，新疆平定后，清政府禁止山西商人贩茶入疆，只许湖南商人领票前往。湖商不熟悉俄国人的生活习惯，也没有与俄国商人交易的经验，所带入新疆的茶叶多是红、绿叶茶，销售甚滞，无不赔累，影响了对俄茶叶贸易的兴趣。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牲畜、畜产品和棉花。据俄国人统计，1903年从乌鲁木齐输往俄国的茶叶价值为39305卢布，1904年伊犁地区输往俄国的茶叶价值为56480卢布，^②1910年伊犁地区输往到俄国的茶叶价值为45000卢布^③。大体上反映了当时茶叶出口的水平。另据斯拉德科夫斯基统计，1914年新疆共向俄国出口了3800普特茶叶，同年俄国却倒灌10242普特的中国茶回境。

1914年进出口的产品结构为^④：

进口：商品名称	数 量
棉织品	15564 千俄尺
毛织品	155 千俄尺
金属制品	544 千卢布
金 属	65831 普特
黑色软革	2009 普特
毛 皮	4442 普特

① 《经营伊犁策》，载1911年4月22日《民立报》。

②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00-202页。

③ 驻扎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商务报告》，宣统三年秋季。

④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341-342页。

糖	80437 普特
烟	8171 普特
茶	10242 普特
鱼	1369 普特
石油产品	29545 普特
烟 卷	500 万支
总 值	1105.6 万卢布
出口：商品名称	
土 布	4790 千俄尺
丝织品	2540 千俄尺
牲 畜	1697 千头
各种皮毛	373.3 千普特
毛 皮	151.2 千普特
皮 革	54.2 千普特
生 丝	1830 千普特
茶 叶	3.8 千普特
肉	6.4 千普特
鱼	1 千普特
粮 食	62.2 千普特
总 值	1420.2 万卢布

清朝末年，新疆对俄国的进出口额由二十世纪初的入超变为出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全力应付战争，工厂生产的产品不敷本国使用，致使中俄新疆地区的贸易额急剧缩减。1915年俄国输往新疆的商品为500万卢布，1916年降至160万卢布，1917年再锐减至不足100万卢布，几乎下降了十分之九。同一时期，由于俄国拿不出与中国交换的商品，硬货币又十分匮乏，自然也无能力进口新疆地区的中国商品，致使中俄

西北地区的贸易再度滑入谷底。

二、俄商在西北地区沿途洒卖和倒灌中国茶叶

俄商在我国西北地区沿途洒卖和非法倒灌中国茶叶由来已久。据记载，1880年到塔城、古城和科布多等地贸易的41个俄国商队，倒灌了价值为11760卢布的中国茶叶。^①以后则逐年有所增加。

1881年的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里明文规定，俄商在中国内地贩运土货回国，必须由条约指定的三条路线行走，即由张家口——恰克图，张家口——尼布楚，张家口——科布多——俄国。并清楚规定俄商贩运中国土货回国，沿途不得私售，若沿途私售，一经查出，其货全行人官。^②茶叶是辽阔的中国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蒙、哈以乳茶养命，不啻资谷食以为生”^③，茶叶的销量很大。俄商由于拥有在新疆免税贸易特权，在内地缴纳的关税又较华商低，经俄商之手运到西北地区的茶叶在价格上自然较华商运入之内地茶低廉。在这种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俄商可获取较大利润。故此俄商“由恰克图贩运华茶回国，在中国沿边附近处所售卖者有之；华茶运俄境，夹杂俄货中混入中境洒卖者有之；中国奸商冒领俄票，倚恃护符，影射潜售者亦有之。”^④当然沿途洒卖和倒灌入境的茶叶决不止由恰克图贩运回俄国的华茶，而是通过各种

① 斯卡利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第156页。

②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86—389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伊犁将军长庚奏设茶务公司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伊犁将军长庚致外务部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六日。

途径。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商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非法茶叶贸易中获取了很大利益。俄国官员鲍戈亚夫连斯基直言不讳地说：“一直到目前，我国商人经营茶叶的条件却很不错，因为中国当局怕引起俄国领事的误会，不敢对俄商太严。所以，俄国臣民在这方面有较多的自由，他们既可以在中国西部地区就地作茶叶生意，也可以把茶叶运到俄国境内。除了这一宗可称为非法的贸易之外，我国的商人还可以在其他一些地方，例如在塔城，完全合法地做茶叶生意。为此，他们经常在政府没有实行专营的科布多，甚至在张家口收购茶叶，然后经蒙古运到离边界五十俄里以内地带的塔城和其它地方”。^①清政府一贯禁止俄商贩运中国土货回国沿途洒卖，作为俄国政府驻新疆领事馆官员的鲍戈亚夫连斯基应该是十分清楚的。这里鲍氏有意将在塔城等地洒卖和倒灌中国茶叶说成是合法的，其目的是为其非法的交易造舆论。从中也不难看出，俄商对沿途洒卖和倒灌中国茶叶是十分感兴趣的。据鲍氏统计的数字，1904年，俄商向伊犁地区倒灌了价值4268卢布的中国茶叶。^②另据俄国官方的材料，1910年俄国倒灌到伊犁地区的中国茶叶价值为54000卢布。^③然而俄国官方公布的数量远远不如俄商走私进入西北地区的中国茶叶数量多，恰恰是这部分茶叶无法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但可以肯定地说，数量是很大的。

俄商非法走私中国茶叶的活动，严重损害了清政府和中国商人的利益，引起清政府和中国商人的极大不满。“中俄商务交

①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194页。

②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194页。

③ 驻扎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商务报告》，宣统三年秋季。

涉最纠纷者，莫如茶叶一端”。^①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塔城参赞就曾针对山西商入了解蒙、哈人民生活习惯，又善经商的特点，请示允许普商人新疆贩茶，既可收税，又可禁俄商洒卖中国内地茶叶。但未被清政府户部批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新疆巡抚潘效苏再次致外务部，痛陈俄商“借贸易天山南北暂不纳税约章，竟至千箱万箱，希图垄断。夫以中国之茶，华民不敢触，而俄商得以犯之，华民有利，官为阻抑，而俄商得以攘之。且贩自华商，本能收税，而限于引地不能开禁；贩自俄商，竟影射约章而不纳税。揆之情理，固未得其平，论之榷征，亦稳多亏折”。^②建议引东南盐引为倒，征收俄人茶税。他说：“愚昧之见，窃以东南盐引，外人既不得侵，则茶引因事同一律。……尚乞大部婉为磋磨，能以阻止不运固为上策，倘必难于峻拒，或援俄商贩土货回国不准在沿途销售之例，阻其毋在中界开封发卖，俟出境再为销售，庶可保我自主之权，免致华商借口。倘即此亦难于应允，务乞转咨户部，妥筹办理。否则此禁一开，官茶商万难缄默，甘督与户部以保引裕课为言，效苏亦似难任咎。……总之，此事无论彼之允否纳税，能否停运，似必以不在华境销售为要着。统俟来示商定办法后，均可一体遵行也”。^③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外务部曾就俄商由古城运茶到伊犁销售一事照会俄国公使，提出抗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伊犁将军长庚奏请设立新疆茶务公司，“以杜俄商倒

① 钟毓：《西疆交涉志要》，卷5第13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疆巡抚潘效苏为俄商在新疆贩茶不纳税课致外务部电》（外务部档）。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疆巡抚潘效苏为俄商在新疆贩茶不纳税课致外务部电》（外务部档）。

灌，冀可裕课便民。”^①与此同时，新疆地方官员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处罚从事非法茶叶贸易的俄国商人。1906年10月，塔城地方官缉获了从俄境倒灌入塔城的六车砖茶，并以1/3充公了结此案。地方官拒绝发给新疆俄商运茶回国的执照。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俄商沿途洒卖和倒灌中国茶叶的走私活动。对此，俄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并建议“俄商可暂出押款于塔城地方官，俟霍尔果斯税关电知经伊犁之茶斤照数放行后，再将押款交还俄商”。^②也就是说，俄商如在塔城至伊犁沿途洒卖中国茶叶，在霍尔果斯口岸发现茶叶数量与塔城报关时不符，所押款项即归中国所有。同年十月，塔城参赞大臣札拉丰阿与俄国驻塔城领事签订了《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条约规定，俄商借道运茶经伊犁、塔城回国，应预交押款于地方官，俟霍尔果斯税关查验照数放行，然后由霍尔果斯卡官呈报将军、参赞大臣，并由塔城俄领事电讯俄国税关，证明茶叶已如数运回，再将押款归还俄商。俄国茶商如有沿途私卖情事，除将茶叶充公外，并将押款归中国公收。俄商在中国内地贩运茶叶回国，不得倒灌塔城等中国地面售卖，倘有沿途销卖及绕道越行等弊，货色包件数目与执照不符，应将该商货物全行人官。看起来这些规定好似禁止俄商沿途洒卖和倒灌中国茶叶，实际上使俄商由中国内地运茶经塔城和伊犁回国合法化了。与1881年所订条约相悖。为此，伊犁将军长庚指出：“俄私（茶）每由塔城之苇塘子、额米尔河两处，托名假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伊犁将军长庚请设茶务公司以杜俄商倒灌利权外溢致军机处电》（宫电档）。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交部致署伊犁将军广福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

道，实则偷运各游牧洒卖。”^①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伊犁将军广福奏称：“从前甘肃湖商运茶，行销蒙古、哈萨克各部落及俄国沿边一带，销场尚旺。嗣光绪三十二年，订有俄商运茶假道伊塔回国新章，不独俄境不能运销华茶，且有俄商贩运华茶在伊、塔境内洒卖。此外，影射偷运者，更不知凡几。私茶充斥，销场疲滞。”^②由此看来，《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并未能制止俄商沿途洒卖和倒灌中国内地茶叶。

条约签订后，俄国认为伊塔茶务有限公司是对俄国茶商沿途洒卖和倒灌中国内地茶叶的一大障碍。1910年，俄国驻华公使公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清政府在给俄国的回函中再次重申俄商“购运中国茶叶回国，不得沿途洒卖”的规定，但同时又给俄商倒灌中国茶叶找了借口。清政府明明知道俄国并不产茶，却声明“俄国运来之茶，行销新省，如确系俄境所产，并非以华茶倒灌入境者，亦难禁阻。”^③实质上这是清政府又一次对俄国的重大让步。从此，俄商公开将“俄茶”运来新疆，而这些茶又“多采自汉口，运回俄国后，另加制造，印有俄字”。^④清政府地方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纠查了。直至十月革命，俄商的倒灌活动从未停止。

至于沿途洒卖，更是禁而不止。1912年，俄国茶商由汉口贩运一批茶叶到塔城售卖，被塔城地方官禁止，俄国驻新疆领事公然声称“塔城华官禁阻华民购置俄商由汉运塔之茶，与

① 长庚等：《新疆茶案》，《茶务利弊说明书》。

② 《清实录·宣统政纪》，卷47第1-2页。

③ 王树枏等：《新疆图志》，卷57第10页。

④ 中华民国外交部：《外交部交涉节要》，民国二年十一月，第27页。

约不符。”^①1914年又有俄商将中国内地茶叶运往伊犁销售。是年，俄国经新疆边界倒灌的华茶达10242普特之巨。^②在俄国政府的庇护之下，沿途洒卖不仅未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民国初年，新疆省长杨增新针对俄商沿途洒卖、倒灌中国茶叶难以禁止的事实，准许俄商采购中国茶叶在新疆境内洒卖。他 also 知道这样做“是侵夺华商生计，本为条约所不许”^③，不过是为了增加地方税收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罢了。

三、东北地区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十九世纪末至十月革命的二十余年间，帝俄与中国东北地区的茶叶贸易有了新的特点。这一时期，俄国除继续利用黑龙江转运中国茶叶外，还通过中东铁路大量转运中国茶叶。义和团运动期间，天津——恰克图一线受阻，沿海路经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运往俄国的茶叶数量增加了。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中俄贸易的地理方向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即陆路以新疆和恰克图为重点的进出口贸易变为以外贝加尔和黑龙江边界为主的贸易。至此，兴旺了近半个世纪的天津——恰克图商队茶叶贸易完全绝迹。俄商通过海路将汉口、福州等地的茶叶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者大连港，再从那里通过中东铁路运往俄国。据《远东报》记载，1910年由大连运到哈尔滨的茶叶为54000普特。^④1912-1914年间每年经中东铁

① 中华民国外交部：《外交部交涉节要》，民国二年一月。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年前）》，第342页。

③ 《补过斋文集》，庚集2第52页。

④ 《远东报》，1911年9月26日。

路出口的茶叶为 300-400 万普特。^①中东铁路局所属的黑龙江航运公司的船只，经常往来于上海、天津一带转运茶叶。俄罗斯学者罗曼诺娃说：“每年输入俄国的茶叶中，有 65% 是经中东铁路进口的”。^②

清朝末年，满洲里开辟了通往西伯利亚的汽车运茶路线，汽车所到之处皆为俄国不通火车的远东内地。茶叶成为满洲里对俄出口的主要商品。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满洲里“出口货以茶为大宗，计每月汽车往西伯利亚 9 次，每次有汽车 10-40 辆，每辆实茶 200 斤以外”。^③运出的茶叶大部分是砖茶和红茶。

海拉尔西南 150 公里处的甘珠尔蒙古集市是黑龙江地区中俄传统的贸易点，这里早有少量的茶叶交易。这一时期仍有俄国商人前来购买茶叶，属边境地区的小额贸易。

必须提到一点，中东铁路通车后，俄国商人开始非法向东北地区倒灌内地茶叶，斯拉德科夫斯基说得明白，俄国向“满洲边境地区再出口中国茶叶，因为沿俄国铁路从华中向这些地区运送茶叶要比沿传统路线运输便宜得多”。^④这就是说，东北地区与西北地区一样，俄国借助于手中减免税的特权和先进的运输工具大量倒灌内地茶叶在东北地区销售，其数量远远超过

① 加·尼·罗曼诺娃：《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远东俄中经济关系》，中译本，第 98 页。

② 加·尼·罗曼诺娃：《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远东俄中经济关系》，中译本，第 99 页。

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宗室戴震等奏呈考查黑龙江省情形清单》（原折）。

④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 年前）》，第 344 页。

西北地区。以 1914 年为倒，这一年俄国通过中东铁路运来东北销售的茶叶为 54638 普特，而向新疆倒灌的茶叶仅 10242 普特，前者为后者的 5 倍多。在东北地区贩卖内地茶叶是这一时期的新特点。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如西北地区那样，采取应有的措施加以制止，也就是说未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

第四节 危机四伏的中国内地产 茶区对俄国的茶叶贸易

一、福州茶市的衰落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福州地区与俄国的茶叶贸易达到了鼎盛时期。“1895 年福州出口的砖茶为 103945 担，1896 年 98000 担（1440 万俄磅），从这一年起开始急剧下降，经过 5 年，即 1901 年仅为 34000 担”^①，比最高年份的 1895 年减少了 2/3。并且继续大幅度下降，1913 年为 13686 担^②，1915 年再减至 5106 担^③，只相当于 1895 年的 1/20。这类砖茶除极少数经海路运往俄属太平洋各口岸及敖得萨外，绝大部分都是由福州起运，经海路至天津，再由陆路运往恰克图。除砖茶而外，俄商还收购白茶，数量也极为有限。

1896-1904 年间福州输往敖得萨的各类茶叶如下^④：

①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 年 5-7 期

② 海关总税务司：《海关贸易报告》，民国二年第 1080 页。

③ 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四年，第 986 页。

④ 根据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整理

年份	数量	数量 (担)				价值 (海关两)
	种类	砖茶	绿茶	转出	红茶	
1896年		20383	—	—	781	148356
1897年		—	2	—	204	7999
1898年		—	—	—	622	34273
1899年		—	—	—	281	21507
1900年		—	—	—	409	31254
1901年		—	—	—	217	17927
1902年		—	—	—	175	7919
1903年		—	2382	—	293	112848
1904年		310	10	118	453	46293

从表中不难看出，福州运往敖得萨的茶叶主要是红茶，每年只有几百担，在整个中俄茶叶贸易中根本不占重要位置。既然福州有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茶叶资源和相对方便的地利，为什么十九世纪末叶之后中俄福州茶叶贸易日趋衰落下去了呢？客观上说主要是英美等国商人缩减甚至停止采购中国茶叶，使俄商用来制造砖茶的廉价原料短缺而造成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英商采购的华茶占华茶总出口的70%，到1895年便降至10%。^①俄商在福州制造的砖茶在七十年代所以发展很快，主要是使用叶茶的下角料，即茶末和劣等叶茶。由于英商采购量大大减少，俄商用以制造砖茶的下角料发生困难，如果用其它原料制造，砖茶成本便会高于汉口地区，从而影响了俄商在福建加工制造砖茶的兴趣。其次，俄国海路运输能力低下也是迫使其退出福州茶市的重要原因之一。1896年，俄国出入中国各港口的船只仅有66艘，总吨位为113656

^① 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

吨，只及当年北欧小国挪威运力的 1/8。而这些船只大部分要运销汉口茶叶，运销福州茶叶需大量雇用外国商船。如果采购红、绿叶茶运往黑海口岸放得萨或巴统，路途遥远，运费高昂，不如就近在印度、锡兰采购。

当英商退出福州茶市的时候，俄商也曾试图取而代之垄断福州茶市，为此与华商展开了激烈竞争。但俄商的实力远不如在汉口那样强大。当时，“福州中国茶商有许多派别，有名的公益堂者专营出口贸易，……此外有专营内销之三大团体，即北京帮、天津帮及广东帮。”^①他们熟悉情况，经营灵活，俄商无力象在汉口一样控制住福州茶市。综上所述，俄商只好逐渐地放弃福州茶市，去寻找更为有利可图的茶市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印度洋海路受阻，俄国再次转而向福州购买红、绿叶茶供给军队。1915年采购了 25360 担，1916年迅速增加到 52505 担。但这仅仅是为了应付战争之需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随着俄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及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俄国在福州采购茶叶的活动便受到了极大影响。到 1917 年就仅采购了红叶茶 3900 担。福州，作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一个重要市场便一蹶不振了。

二、九江砖茶贸易的继续发展

如前所述，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为维护其殖民地利益计，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印度、锡兰茶叶抛向国际市场之日起，英商就大大缩减了在中国采购茶叶的数量。1895 年与八十年代初相比，中国对英国出口的茶叶减少了 80% 以上。英商的退出造成了九江茶市的急剧衰落。“九江城厢内外，往年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尔来仅存十余家。今年各茶

①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第 14 页。

商来客，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利源日绌，可为慨然也”。^①然而，九江茶市与福州茶市不同的是俄商未因英商的退出而放弃该地。原因是因为此处离汉口近，交通极为方便，且不用英商采购叶茶后剩下的下角料。

九十年代初，俄商在九江的商业活动进入繁荣期后，砖茶生产一直在大幅度增长。据海关总税务司统计，1892-1901年的十年间，九江对俄出口的砖茶总数量为342760担^②，每年平均3-4万担，超过1882-1891年间每年平均2-3万担的水平。二十世纪初，九江对俄出口的砖茶每年增至10万担左右，仅次于汉口，居全国第二位。以1913年为例，这一年中国输往俄国的砖茶总数为598319担，其中九江砖茶为130706担，占21.84%，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③以后几年之内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数量。

1912-1917年九江砖茶对俄国出口情况如下（担）^④：

年 份	砖茶类别			总数
	红砖茶	绿砖茶	小京砖茶	
1912年	37124	34047	—	71171
1913年	94357	34532	1788	130677
1914年	32850	68953	1196	102999
1915年	39186	45929	6052	91167
1916年	44195	25666	3118	72979
1917年	35606	17814	1161	54581

- ① 《茶事近闻》，载《农学报》第29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中。
 ② 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第332页。
 ③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
 ④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俄商在九江生产的砖茶，均采用当地丰富的廉价原料，生产质量上乘的砖茶，造价与汉口砖茶大致相同。自从较为廉价的印度、锡兰等地的茶叶抛向国际市场以后，九十年代初俄商开始采购锡兰茶叶，并从1897年起将锡兰红茶末引进九江，混合在中国茶叶里生产砖茶，质量虽有所下降，但造价亦有降低，俄商利润更加可观，使中国政府和茶商蒙受重大损失。对此，英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也承认不讳。《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写道：“这一点上，中国人又吃亏了。锡兰茶末输入时，只要画押保证一年转口，便不纳入口税；更特别是的，虽然再输出时是砖茶而不是末茶，转口时也不纳税”。^①正因为如此锡兰茶末的输入量不断增加。

1905-1917年俄商输入到九江的锡兰茶末数量为（担）^②：

年 份	数 量
1905年	1116
1906年	1971
1907年	18411
1908年	3590
1909年	5808
1910年	8040
1911年	1896
1912年	7784

① 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第331-332页。

②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8-209页。

1914年	6514
1915年	9162
1916年	8493
1917年	6862

毋庸置疑，俄商除在九江制造砖茶（包括小京砖茶）外，同时也采购白毫茶，即普通红、绿叶茶。1863-1907年间，江西每年出口茶叶在10-30万担间不等。即便是八十年代后英商大量减少了采购，江西出口茶仍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俄商保持着相当高数量的采购量，从而延缓了九江茶市的衰落。中俄九江地区的茶叶贸易与汉口、福州等地一样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一俟俄商停止采购，九江茶市就立刻衰落下去。

三、俄国商人对汉口茶叶市场的全面控制

俄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俄商完全取代了英商，全面垄断了汉口市场。俄国人自己也不无自豪地声称：“近几十年来汉口的全部茶叶贸易只掌握在俄国人手中。如果俄国停止在汉口采购茶叶，那么，作为茶叶市场的汉口便不复存在了”。^①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商在汉口地区的商业活动进入了鼎盛后，尽管英国极大地缩减了中国茶叶的采购量，但由于俄国茶商采购、加工制造、贩运的茶叶有增无减，1900-1917年间汉口地区的茶叶出口仍呈上升趋势，这与全国茶叶出口逐年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贸易额为例，1880年，中国输往英国的茶

①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年5-7期。

叶达到了 145 万担的最高纪录，占当年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 69%^①；而输往俄国的茶叶为 46.4 万担，仅占中国当年出口茶叶总量的 23%。也就是说，输往英国的茶叶是输往俄国的三倍。然而，二十年后形势却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以 1900 年为例，这一年中国输往英国的茶叶降至 35 万担，而输往俄国的茶叶却增至 90 万担，其中 2/3 以上来自汉口。中国茶叶的出口数从 1880 年的 200 多万担降至 1900 年的 138 万担。

这一时期汉口地区输往俄国的茶叶种类变化不大，仍以红茶和砖茶为主。其中汉口地区生产红茶的 70-80%，砖茶的全部均销往俄国。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汉口地区每年约有 20 万担砖茶，其中有少数片茶经过海路输往俄国欧洲部分，20 多万担砖茶经陆路输往俄国西伯利亚地区，总计输往俄国的砖茶每年平均在 40 万担以上。^②另有 30-40 万担的红茶通过各种途径输往俄国。二十世纪前十年，汉口输往俄国的砖茶数量继续增长，平均每年可达 50 万担以上。其中 1903 年、1906 年、1908、1909 年超过了 50 万担，1907 年和 1910 年甚至突破了 60 万担大关。1910 年达 620639 担。^③

1900-1917 年间汉口茶叶的出口状况如下（担）^④：

-
- ① 朱美予：《中国茶叶》，民国 26 年版第 148 页。
 - ②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上篇，第 302 页。
 - ③ 刘廷冕：《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及百分数》，载《统计月报》第 27 页。
 - ④ 根据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湖北茶叶贸易志》，第 24-25 页整理。

年 份	汉口茶出口总数	红茶	砖茶	其它
1900年	858749	468549	390200	—
1903年	1009394	424620	584774	—
1908年	983633	422989	560644	—
1909年	924738	345479	579259	—
1910年	943942	281939	620639	41364
1911年	715235	334172	347861	33202
1912年	859287	327475	448091	83721
1913年	788250	239325	451454	97471
1914年	844873	311275	453025	80273
1915年	958357	346225	557932	54200
1916年	845000	228239	551263	65498
1917年	640861	202876	401770	36215

从红茶、砖茶销往俄国的数量占汉口地区全部出口茶叶的比重看，每年可在70-80担左右。为获取更大利润，象九江地区一样，俄商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将印度、锡兰茶末大量引入汉口，混合在中国茶叶里制造砖茶。由于俄商在汉口地区生产的砖茶数量多于九江，因此外茶输入汉口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九江。

1899-1917年间，汉口进口的印度、锡兰茶末数量如下(担)①：

① 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2辑第47页。

年 份	数 量
1899 年	103
1903 年	22427
1905 年	约 20000
1908 年	109280
1912 年	约 100000
1913 年	约 150000
1914 年	170564
1915 年	199298
1916 年	231774
1917 年	136407

1910年后每年有10万担以上的外国茶要掺和到中国茶里制造砖茶。1915-1916年两年竟高达20万担。这两年汉口出口到俄国的砖茶为55万担，这就是说其中有2/5的原料来自国外，而这些茶既不纳进口税，又不纳出口税，这就使中国政府的关税收入减少了，同时也给中国茶农茶商造成了巨大损失。

汉口茶叶输往到俄国的途径主要有4条，其中有一条陆路线，一条水陆联运线，两条水路线。

1. 陆路线，即汉口——樊城——太原——恰克图一线。即商人们将集中在汉口的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茶叶溯长江而上运至樊城，再由那里北上经河南赊旗镇，入山西，过潞安府、沁州和太原府运至张家口，转往恰克图。这是一条传统的运茶路线，有二百余年的悠久历史。在天津1862年开埠前的一百多年间，它几乎是唯一向俄国出口茶叶的路线。该路线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始终在中俄茶叶贸易上占有重要地位。二十世

纪初，仍有为数不算少的茶叶通过这里运往俄国，只是在日俄战争期间（1904—1905年），受战争的影响俄国在华采购茶叶总数明显下降，该路的运茶量也明显减少。1906年又稍有恢复。1910年，京汉铁路通车，商队运输已完全失去作用。从1911年起，此线停止运茶。

1896—1910年间汉口——樊城——恰克图陆路一线运往俄国的茶叶数量如下表所示（担）^①：

年份 \ 类别	叶茶	砖茶	茶梗	茶末	合计
1896年	78297	5590	3829	240	87956
1897年	56385	9103	5764	686	71938
1898年	74040	3927	3275	40	81242
1899年	1874	52619	1268	—	55761
1900年	17893	70905	340	—	89138
1901年	38888	16803	1653	687	58035
1902年	16791	9526	3866	1151	31334
1903年	136	1808	3687	—	5631
1904年	2524	102	80	—	2706
1905年	1803	757	168	—	2728
1906年	8296	—	356	—	8652
1907年	1823	—	269	—	2092
1908年	1717	—	—	—	1717
1909年	2002	—	330	—	2332
1910年	6	—	9	—	15

这条线路不仅是一条传统的运茶线路，而且是华商运茶数

^① 根据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整理。

最多的线路。

2. 水陆联运线，即汉口——上海——天津——恰克图一线。茶叶由汉口装船，顺长江而下，经上海，海路运至天津，再改为陆路车队运往恰克图。这条线路比较樊城陆路既省时又省运费，所以自1862年天津正式开埠通商后便立即成为俄国茶商贩运汉口茶叶回国的主要路线。十九世纪末，经俄商之手采购、加工制造的茶叶，由该路贩运至恰克图的每年有数十万担。1899年，仅天津运往恰克图茶叶的陆路运费就高达275万两^①，足见其数量之大。

1896-1904年间经此路运往俄国的茶叶价值为（海关两）^②：

年 份	价 值
1896 年	8291052
1897 年	9439469
1898 年	9754640
1899 年	9960426
1901 年	636820
1902 年	4027828
1903 年	1932102
1904 年	2189874

1900-1901年因受河北、山东及京津一带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影响，茶叶贸易额减少了。1902年稍有恢复，随即又受到日俄战争影响。日俄战争后，中东铁路全线通车营运，汉

① 《天津历史资料》，每4期第49页。

② 《天津历史资料》，第4期第49页。

口茶经上海运抵符拉迪沃斯托克或尼古拉耶夫斯克，或中国大连，再经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或中东铁路运往俄国，要比陆路商队由天津运往恰克图便利得多了，陆路车队与铁路运费更是无法比拟的。至此，发达了 40 余年的汉口——上海——天津——恰克图一线便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3. 汉口——上海——敖得萨（或巴统）海路，即汉口直接运销欧俄的海路。自 1871 年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乞哈耶夫号》首次驶入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运回敖得萨起，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该线的海路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九十年代初该线输往欧俄的华茶已占中国全部输往俄国茶叶的 1/3。据海关统计，1896-1903 年间该线出口到俄国的红茶数量及价值为①：

年 份	数 量 (担)	价值 (海关两)
1896 年	169086	3782391
1897 年	114537	2082142
1898 年	151551	2933742
1899 年	185218	4519511
1900 年	249264	5537254
1901 年	178253	3063820
1902 年	126889	1942588
1903 年	98531	1630786

如果再加上绿茶和少量砖茶，每年出口到欧俄茶叶的价值尚需增加 100 万海关两左右。

1896-1917 年间海路出口到欧俄的中国商品中，除一小部

① 根据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整理。

分是上海、福州和广州起运而外，绝大多数仍是汉口起运的中国茶叶，因此下列统计数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①

年 份	价值（海关两）
1896 年	4265820
1897 年	3926988
1898 年	5004991
1899 年	5343480
1900 年	6390272
1901 年	4830632
1902 年	3793905
1903 年	4138653
1904 年	2812261
1905 年	3555978
1906 年	5724996
1907 年	5181658
1908 年	5214301
1909 年	4854235
1910 年	6501485
1911 年	8187577
1912 年	4653053
1913 年	4987725
1914 年	4238966
1915 年	4550878
1916 年	4222617
1917 年	477813

^① 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第397-408页。

4. 汉口——上海——俄属太平洋各口岸。汉口茶运往俄属太平洋各口岸要略早于运往欧俄的黑海口岸，大约六十年代初即已开始。

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特别是日俄战争结束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再海路到大连的线路。大量茶叶经过大连装上中东铁路的火车运往俄国。

1896-1903年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各口岸，主要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茶叶数量和价值为①：

年 份	数 量 (担)	价值 (海关两)
1896年	17776	359645
1900年	39839	485750
1902年	42568	590809
1903年	68434	1095702

1916年汉口全年共出口茶叶 55971897 磅，其中输往俄国的数量为 40750033 磅，占汉口出口茶叶总额的 73%，而这其中经上海转口运往俄属太平洋各口岸茶叶（包括大连）为 8977596 磅，占汉口输俄茶叶数的 22%以上。②

除以上四条路线，，还有少量中国汉口茶通过其他途径输往俄国，如湖北——兰州——嘉峪关及汉口——新疆等路线，但与前者相比数量不大。

在汉口的俄国商行中，除顺丰、新泰、阜昌等实力雄厚，影响极大的而外，另据俄国人记载还有如下十余家洋行，他们

① 根据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整理。

② 根据《农商公报》第33期（1917）整理。

共同垄断着汉口茶叶市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仍在汉口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俄国商行有以下各家：

1) C·B·利特维诺夫商行。有制造加工各类茶叶的私人工厂；

2) 莫尔恰诺夫、佩特恰诺夫商行；

3) B·维索茨基公司。在莫斯科、车里亚宾斯克和放得萨设有经营茶叶的分装店；

4) A·古布金、A·库兹涅佐夫公司。该公司一年的交易额达 3800 万卢布以上。在汉口拥有装备精良的工厂，并在全世界的茶叶市场上拥有办事处；

5) 沃高商行。该商行同莫尔恰诺夫和佩恰特诺夫商行订有加工制造砖茶的协议；

6) 波波夫兄弟茶叶贸易和贮藏公司，该公司在印度加尔各答和锡兰科伦坡设有分公司；

7) 纳克瓦辛商行；

8) 托克马科夫、帕诺夫商行；

9) 奇尔科夫、帕诺夫商行。^①

中俄汉口茶市是在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的形势下畸形发展起来的，它体现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交往中的一切特点。当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俄商享有种种特权，华商在与俄商不平等的竞争中一直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因此俄国人敢于夸下海口说，如果俄国人停止在汉口采购茶叶，汉口茶市便不会存在了。

1909 年，俄国借口改订征税章程，对进口商品陡起高

^① 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茶叶的供应者》，载《满洲公报》，1925 年 5-7 期。

税，不仅严重威胁了恰克图华商的生计，汉口地区对俄国的茶叶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对此，清政府外务部曾致函俄国驻华公使明确指出：“查汉口茶市向以俄商为大宗销路，今俄政府加重茶税，销场自必顿减，于茶叶前途甚有关系。……加税重过本价数倍之多，实属罕闻，能否向俄政府议商减轻，以纾商艰而维茶业，尚祈台端审度情形，酌核办理，并希见复”。^①新征税额超过以往数倍，规定“红茶每普（特）加税钱 2 串 550 文，盖每普为 40 磅，共重 448 两，折江汉关秤不过 28 斤，照俄钞票计，1000 合华银 8 两 5 钱，是红茶 1 斤进口须加完税银 7 钱 7 百，100 斤则 77 两”。^②毋庸置疑。这一加税措施，对于直接由汉口向俄国贩运茶叶的华商不啻又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汉口茶的大部分是经俄商之手运往俄国的，因此总的对汉口输俄茶叶的影响不是很大。直至十月革命，汉口茶输往俄国的数量仍十分可观，这也在客观上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

四、上海港与俄国的茶叶贸易

自从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逐渐成为西方列强掠夺中国财富的桥头堡，也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然而，对于俄国来说，它既不是盛产茶叶的地区，也没有俄国商人开设的加工制造茶叶的工厂。因此，上海在整个中俄茶叶贸易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

上海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

-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农工商部致外务部文《俄政府加重入口茶税，汉口茶商受困，稟请挽救，可否与俄使设法磋议》。
-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农工商部致外务部文《俄政府加重入口茶税，汉口茶商受困，稟请挽救，可否与俄使设法磋议》。

始向俄国转出口中国内地茶叶。七十至八十年代其数量有明显增加。与此同时，一些中外商人将内地茶叶运往上海，出口到俄国。据海关记载，上海最早向俄国出口茶叶是1867年。这一年向俄属太平洋口岸出口茶叶604.19担，价值16313海关两。^①整个六七十年代出口的数额不大，每年几千担左右；八十年代有明显增长。每年输往俄国黑海口岸和太平洋口岸的茶叶在1万担左右。1888年创了历史最高纪录，达31418.03担，其中输往敖得萨19140.78担，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12277.25担。^②

进入九十年代，上海输往俄国的茶叶，特别是俄属太平洋各口岸的茶叶数量又有较大增长。据海关统计，1896-1904年间输往俄国太平洋各口岸的中国茶叶数量如下（担）^③：

年 份	红 茶	绿 茶	红砖茶	绿砖茶
1896年	1484.13	27.21	8841.54	—
1897年	25027.88	8.44	63862.26	23915.83
1898年	35494.15	—	64094.36	—
1899年	27241.58	3743.36	67141.69	—
1900年	14316.26	4473.88	203101.96	26681.57
1901年	42549.79	—	134365.94	23502.16
1902年	15844.86	—	57544.41	8480.12
1903年	92088.14	—	152514.24	18952.20
1904年	—	—	2520	—

① 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1868年。

② 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1889年。

③ 根据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整理。

而同一时期,除绿茶外上海输往俄国黑海各口岸的茶叶数量远远低于输往太平洋各口岸的,其数量为(担)①:

年 份	红 茶	绿 茶	茶 叶
1896 年	192.63	4581.02	—
1897 年	2026.26	21189.69	—
1898 年	8962.85	—	—
1899 年	6209.05	—	—
1900 年	18633.81	—	—
1901 年	敖得萨 2406.17	293.98	—
	巴统 220.70	49823.61	4963.08
1902 年	敖得萨 3468.37	491.35	—
	巴统 324.05	63884.71	6339.43
1903 年	1753.74	—	22687.40
1904 年	5716	141187.42	6826

但同一时期,经上海转出口的内地茶叶要大大高于上海直接出口到俄国的茶叶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的主要作用是转口茶叶,但又不同于天津。后者的茶叶是汉口装船,顺长江水路途径上海运到的,到天津后再改用陆路驼马车队运往恰克图,这部分茶叶在天津再出口时海关有详细的记载,算是天津转出口的。上海转出口的茶叶大部分在汉口装船后经上海直接运往俄国太平洋各口岸和黑海口岸,但也有部分是九江或福州等地的茶叶经上海转出口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需要大量的红叶茶供应军队,

① 根据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整理。

而在汉口发运往往因运输条件等限制，时间过长，于是汉口的俄国茶行纷纷将茶叶率先运往上海。由于十分获利，华商和其他国家的茶商也纷纷效尤，将茶叶大量发往上海，向俄国军队推销。一时间，中俄上海茶市出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多数茶叶是输往俄国在远东的军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显而易见，这种虚假的繁荣是纯军事性质的，也是临时的。

1915-1917年间上海关输往俄国的茶叶数量统计如下(担)①：

年份	运往何处	红茶	绿茶	各种砖茶		叶茶	香茶	小京砖茶	茶末
				红砖茶	绿砖茶				
1915年	欧洲各口	123	2391	—	—	—	495	—	—
	太平洋各口	135617	37156	314667	118028	770	10466	27085	—
1916年	欧洲各口	4373	5007	—	—	—	6	—	—
	太平洋各口	112005	67493	323483	79686	712	5530	24800	6
1917年	欧洲各口	84	306	—	—	—	—	—	—
	太平洋各口	63892	17369	87422	121736	4	2428	5554	—

上表所列的砖茶绝大部分来自汉口和九江，而且多数为俄商开设的砖茶厂所生产。在制造砖茶过程中掺和了许多进口洋茶。如，1915年上海输往俄属太平洋各口岸的314667担红砖茶中，有印度、锡兰茶56256担，爪哇茶317担，印度和锡兰茶末57306担，合计113879担，占全部出口红砖茶的1/3以上。②1916年上海输往俄属太平洋各口岸的323483担红砖茶中，有印度和锡兰茶38339担，茶末104203担，合计142542

① 根据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4 6年份整理。

② 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4年。

担，占全部出口红砖茶的 2/5 以上。^①再如，1917 年出口的 5554 担小京砖茶中掺和外茶 1879 担，更有甚者有 1254 担小京砖茶完全以外茶末制成，几乎占了全部出口小京砖茶的 2/3。^②前已述及，这些外茶既不纳进口税，又不交出口税，受损失的当然是中国政府和中國茶农、茶商。

随着俄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和十月革命的爆发，上海的中俄茶叶贸易也同整个中俄茶叶贸易一样迅速衰落下去。

① 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5年。

② 海关总税务司：《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6年。

主要参考书目

一、中文部分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
2. 黑龙江将军衙门全宗黑龙江地方档案。
3.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黑龙江地方档案。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1981年中华书局。
5.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1979年中华书局。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合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元年—十五年）》，1986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7.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十五年—二十年）》，1987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8. 马齐等编：《清圣祖实录》。
9. 鄂尔泰等编：《清世宗实录》。
10. 庆桂等编：《清高宗实录》。
11. 曹振鏞等编：《清仁宗实录》。
12. 文庆等编：《清宣宗实录》。
13. 贾桢等编：《清文宗实录》。
14. 宝鋈等编：《清穆宗实录》。
15. 世续等编：《清德宗实录》。

16. 托津等撰：《大清会典事例》。
17.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
18. 张伯英等撰：《黑龙江志稿》。
19. 文庆等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20. 贾桢等编：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
21. 宝崧等编：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22. 王彦威编：光绪朝《清季外交史料》。
23. 方式济撰：《龙沙纪略》。
24. 西清撰：《黑龙江外纪》。
25. 徐宗亮撰：《瀛环志略》。
26. 松筠撰：《绥服纪略》。
27. 王之春撰：《国朝通商始末》。
28. 魏源撰：《海国图志》。
29. 王树枏等撰：《新疆图志》。
30. 何秋涛撰：《朔方备乘》。
31. 陈侠君撰：《筹鄂龟鉴》。
32. 陈篆撰：《蒙古随笔》。
33. 赵翼撰：《檐曝杂记》。
34.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35. 杨端六、侯培厚：《六十五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统计》，1931年上海。
36. (民国)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最近三十四年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1900-1933)》，1935年上海。
37.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编：《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1912-1931)》，1931年。
38.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

第1-3册，1962年中华书局。

39. 钱恂编：《光绪通商综核表》，光绪十四年刻本。

40.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年科学出版社。

4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1962年中华书局。

42.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61年三联书店。

43. 海关总税务司编：《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

44. 海关总税务司编：《海关十年报告》。

45. 中华民国海关总署编：《中国海关贸易报告》。

46. 北洋外交部条约司编：《中外约章汇编》，1927年。

47.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957年三联书店。

48. 步平、郭蕴深等编：《东北国际约章汇释》，1987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49.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1947年云南崇文印书馆。

50. 王之湘：《中俄陆路通商关系之历史上变迁》，《文献论丛（沈兼士先生纪念刊）》，1947年北平。

51.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1936年商务印书馆。

52. 陈博文：《中俄外交史》，1929年商务印书馆。

53. 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1937年商务印书馆。

54. 吴绍璜：《新疆概论》，1933年。

55. 张念之：《东北的贸易》，1948年上海东方书店。

56.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8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中译本。

57. 孙毓棠：《抗戈集》，1981年北京。
58. 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新疆经济概述》，198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59. 中东铁路局：《远东报》，1906-1917年。
60. 《农学报》。
61. 《东方杂志》。
62. 《国际贸易导报》。
63. 《汉口商业月刊》。
64. 《中东经济月刊》。
65. 《内蒙古文史资料》。
66. 《天津历史资料》。
67.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68. 《张家口文史资料》。
69. 陈椽：《茶业通史》，1984年农业出版社。
7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66年人民出版社4卷本。
71. 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年。
72. 刘廷冕：《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及百分数》，载《统计月报》。
73. 武汉市档案馆藏：《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工商改造类》，第117宗。
74. 《民国经世文编》。
75.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76. 朱美予：《中国茶叶》，民国26年版。
77. 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湖北茶叶贸易志》，1985年武汉。

78. 新疆对外开放战略研究课题组编：《新疆对苏经贸问题研究》，1987年新疆大学出版社。

二、外文中译部分

1. 〔苏〕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

2. 〔俄〕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黑龙江大学外语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1973年商务印书馆。

3. 〔苏〕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贝璋衡译，1973年商务印书馆。

4. 〔苏〕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翻译组译，1974年三联书店。

5. 〔俄〕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国人民大学译，1982年商务印书馆。

6. 〔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1-3卷，徐滨等译，1977-1979年商务印书馆。

7. 〔俄〕岗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1978年商务印书馆。

8. 〔俄〕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室译，1976年商务印书馆。

9.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厦门大学外语系译，1978年商务印书馆。

10.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等译，1975年商务印书馆。

11.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姜延祚译，1983年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

12. 〔俄〕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郝建恒等译，1978年商务印书馆。

13. 〔俄〕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王之相译，1973年商务印书馆。

14. 〔俄〕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1982年商务印书馆。

15. 〔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译，1980年商务印书馆。

16. 〔俄〕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大学外语系译，1980年商务印书馆。

17. 〔苏〕奥孔：《俄美公司》，俞启骧等译，1982年商务印书馆。

18. 〔苏〕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1977年商务印书馆。

19. 〔苏〕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陶文钊等译，1980年商务印书馆。

20. 〔苏〕罗曼诺娃：《远东俄中经济关系(19世纪-20世纪初)》，宿丰林、厉声译，1991年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1. 〔美〕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1977年商务印书馆。

22.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1985年社会科学出版社。

23. 〔美〕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蒋学楷等译，1959年商务印书馆。

24.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

文等译，1957年三联书店。

25. [英] 菲·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1959年商务印书馆。

26. [英]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中国茶叶研究社译，1949年上海。

27. [英] 奎斯特德：《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陈霞飞译，1979年商务印书馆。

28. [法] 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江载华、郑永泰译，1980年商务印书馆。

29. [德] 米勒和帕拉斯：《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李雨时译，1979年商务印书馆。

30. [荷] 伊·伊台斯和[德] 亚·勃兰德：《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692—1695)》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翻译组，1980年商务印书馆。

三、外文部分

1.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перед Нерчинским миром 1689 г.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5, 1957.

2.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и нерчинский орг в конце X VII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м наколении в России (X VII—X VIII вв) М.1958.

3.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Русское население Сибири X VII -начала X VIII в. М. 1964.

4. Бунаков Е. В.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 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 IX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2 1956.

5. Боголепов М. И. и Соболев М. Н.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Моголию 1910 года. Томск. 1911.

6. «Вестник Азии» .

7. Вилков О. Н.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ы на тобольском рынке в XVII в.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 №1, 1958.

8. Гальперин А.Л. Русско китай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XVIII -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5.1959.

9.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ии» , №8, 1928.

10. Силин Е.П. Кяхта в XVIII в. Иркутское област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47.

11. Корсак А.Ф. 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торговы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Казань. 1857.

12. Курц Б.Т. Из истории торговы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в XVII ст.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23-24, 1928.

13. Кречетова М.Н. Из истории торг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XVII - XVIII веках «Труд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т.2, Л-М. 1958.

14. Грузооборот и финансов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КВЖД.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ии» №8, 1928.

15. Гурьев Б.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с 1880 года по 1905 год. «Вестник Азии» №5, 1910.

16. Дигама. Торговля с Китаем. Томск. 1899.

17. Рожкова М.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России с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ей .М. 1963.

18. Скальковский • К • Рус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Тихом океане.СПБ.1882.
19.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1917г.) Москва 1974.
20. Торгашев Б.П. Китай, как поставщик чая для России •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ии» №7, 1925.
21.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с Монголией и Китаем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25 лет. «Вестник Азии» №7, 1910.
22. Трусевич Х •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XIX века, М, 1882.
23. Хохлов А.Н.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Китая с 90-х годов XVIII до 40-х годов XIX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78.
24. Хохлов А.Н.Кяхти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и её место в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20-е годы XVIIIв.—50-е годы XIX в.) «Документы опровергают против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1982.
25. Яковлева П.Т.Русско китай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через Нерчинск накануне и после заключения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1689)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связи России вXVII—XVIII вв.» М.1966.
26. Fisher,R.H.The Russian Fur Trade (1550–1700).Berkeley and 10S Angeies,1943.
27. The Russian Trade at Kiachta—(Chiness Repository,V.14,1845).

